

# 广东省社科界热烈庆祝 《学术研究》四十华诞

本刊讯：

由广东省社科联和《学术研究》杂志社主持召开的“庆祝《学术研究》创刊四十周年座谈会”，于4月15日在广州市湖滨宾馆举行。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于幼军，老同志陈越平、张汉青、张江明，杂志社前辈王致远、林文山、俞仲达、张绰、王干和历届编委，广东省社会科学界专家学者和新闻出版界同行近100人共聚一堂，热烈庆祝《学术研究》四十华诞。

座谈会由省社科联副主席、社长梁渭雄主持，省社科联主席、编委会主任张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主编刘斯翰代表编辑部全体同仁向与会者致辞，陈越平、张江明等老领导回忆了《学术研究》创办的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围绕“我与《学术研究》”的话题，对杂志表达了衷心的祝贺，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于幼军同志，向《学术研究》创刊四十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他指出，《学术研究》创办特别是复刊以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广东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实践，团结广东社科理论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繁荣广东的社会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说，在当前省委落实江泽民同志的指示的省情调查研究中，希望学术理论界勤奋思考，献计献策，为广东迈向21世纪“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作出新的贡献。《学术研究》也要继往开来，把好传统好作风发扬光大，为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事业，为我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 目

## •学苑聚焦•

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创新性研究 ——《精神文明建设哲学论丛》座谈纪要 ..... 本刊记者 冯生	(5)
《精神文明建设哲学论丛》简介 .....	(12)

## •经济•

试论利率杠杆在当前经济运行中的调节作用 ..... 许经勇	(14)
“优化资产结构”的局限性..... 栢 林	(18)
从市场趋势谈企业文化力开发 .....	贾春峰 (21)
市场交易与合约安排 .....	易宪容 (25)

## •精神文明建设研究•

世纪之交精神文明发展战略研究 ..... 梁世红 杨 松	(29)
学习邓小平理论 推进广东精神文明建设 ..... 冯达才 冯永宁 陈家义	(34)
广东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要矛盾 .....	吴灿新 (40)

## •教育•

广东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教育现代化问题研究 ..... 江海燕	(45)
----------------------------------	------

## •历史•

璀璨的“双子星座” ——《孙中山与宋庆龄》图录序言 ..... 张 磊 盛永华 萧润君	(53)
美国西部土地立法与农业的资本主义化 .....	何黎萍 (59)

## •岭南文化研究•

试论海洋文化优势与广东滨海城市建设 .....	林炳熙 (64)
清前期的岭南建筑 .....	陈泽泓 (68)
粤诗论粤学 ——翁山述白沙之学与诗 .....	刘付靖 (73)

郭沫若题)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冯达才

总校对

黄荣显

1998年第4期



# 录

## ·文学·语言·

- “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  
——评晚年曹聚仁的鲁迅研究 …………… 古远清 76)
- 媚后之痴  
——《聊斋志异》中的男性研究 …………… 罗书华 80)
- “也”“亦”兴亡探析 …………… 陈宝勤 85)

## ·我与《学术研究》·

- 学术研究的良知与平等 (马洪林) 祝愿《学术研究》  
更创辉煌 (邓国伟) 《学术研究》——我的良师益友  
(冯增俊) 《学术研究》是解放思想的先锋 (吴启文)  
庆贺与期望 (余少波) 解放思想,精心办刊 (李恒  
瑞) 南国学术界的一块绿地 (苏新春) 我对《学术  
研究》的认识 (黄德鸿) 益友,诤友 (程杰) 推  
动百家争鸣,促进学术繁荣 (马中柱) 四十不惑  
“四性”鲜明 (刘伟林) 南粤改革开放的理论号角 (李  
辛生) 祝贺与期待 (宋德华) 不能忘记的回忆 (何  
国文) 情深学子的编辑理念 (杨海文) 倡导清新学  
风,促进学术进步 (张凤林) 尊重作者 立场公正  
(赖伯疆) 《学术研究》与学术上的敢为天下先 (萧君  
和) 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 (韩湖初) 《学术研  
究》——我的良师益友 (雷健坤) …………… 89)

## ·书海酌蠡·

- “策”“筒”辨…………… 张觉 104)
- 解诗二题…………… 李德辉 105)

## ·书评·动态·

- 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如何硬起来  
——评《精神文明建设机制论》…………… 杜新山 106)
- 视阔论精  
——读《康有为大同思想研究》…………… 何业光 107)
- 广东社科界连续举办“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  
座谈会…………… 冯生 13)

##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 83815300—283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 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Main Points from the Symposium Held for the Issue of 'An Essay Colle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eng Sheng (5)
A Guide to 'An Essay Colle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12)
The Adjustment Function of Interest Rate in Present Economy	Xu Jingyong (14)
Limitation of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Capital Properties'	Heng Lin (18)
A Talk about Exploring the Force of Enterprise's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Market Tendency	Jia Chunfeng (21)
Trade in Market and Arrangement of Contract in It	Yi Xianrong (25)
On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Ideological Civilization between Two the Centuries	Liang Shihong and Yang Song (29)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Guangdong by Studying Deng Xiaoping's Theory	Feng Dacai, Feng Yongning and Chen Jiayi (34)
Critic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Guangdong	Wu Canxin (40)
About the Strategic Choice for the Educational of Guangdong du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Jiang Haiyan (45)
Preface of 'An Atlas of Sun Zhongshan and Song Qingning'	Zhang Lei, Sheng Yonghua and Xiao Runjun (53)
The Law of the Western Land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gricultural Capitalization	He Liping (59)
The Advantage of Ocean Culture and the City Construction Near the Seaside in Guangdong	Lin Bingxi (64)
Ancien Buildings in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Chen Zehong (68)
Mr. Weng Shan's Narration of Chen Baisha's Learning and Poems	Liu Fuqing (73)
A Comment on Mr. Cao Juren's Study of Lu Xun	Gu Yuanqing (76)
An Approach to the Male Figures of 'Liao Zhai Zhi Yi' (《聊斋志异》)	Luo Shuhua (80)
A Textual Study of Two Chinese Adverbs 'Ye' (也) and 'Yi' (亦)	Chen Baoqin (85)
A Group of Essays on the Nexus between the Journal and Me'	Ma Honglin, Deng Guowei, Feng Zengjun, Wu Qiwen, Yu Shaobo, Li Herui, Su Xinchun, Huang Dehong and Cheng Jie, Ma Zhongzhu, Liu Weilin, Li Xinsheng, Song Dehua, He Guowen, Yang Haiwen, Zhang Fenglin, Nai Bojiang, Xiao Junhe, Han Huchu, Lei Jiankun (89)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Ancient Chinese Words 'Che' (策) and 'Jian' (简)	Zhang Jue (104)
Inquiry to Mr. Ai Zhiping about His Explanation of Two Poems	Li Dehui (105)
A Comment on a New Work 'On the Mechan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Modernization'	Du Xinshan (106)
Book Review on 'A Study of Kang Youwei's Thought of Great Harmony'	He Yeguang (107)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on Criterion for Verifying a Truth' Held in Guangdong	Feng Sheng (13)

# 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创新性研究

——《精神文明建设哲学论丛》座谈纪要

本刊记者：冯生

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近些年在广东乃至全国,均成为热门话题,出版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和研究成果,然而把精神文明建设和哲学研究结合起来,从哲学的高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进行全面、深刻的理论总结和理性升华,从而探索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却很少见。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精心策划、组织广州地区各高校、研究机构和实际部门的专家学者近40人参与编著的《精神文明建设哲学论丛》(7卷本,共110万字)近日已正式由广州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从精神文明建设基础论、主体论、过程论、机制论、方法论、系统论、价值论等七个方面,立足于哲学的层面,拓展了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的新思路,它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的空白,是一次值得肯定的大胆的新尝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特别邀请了广东哲学界部分专家学者,举办了丛书出版理论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对这套丛书的总体印象、鲜明特色以及留给人们的深刻启示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各著作甚至各章节的更加完善、更为科学准确,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会议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素勤同志主持,倡议并为论丛撰写序言

的广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长朱小丹同志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现将专家学者们的精彩发言摘登于后。

张江明(广东省社科联教授):这套丛书有许多优点和特点,主要是:

第一,哲理色彩浓,意境高。贯穿该丛书和各本著作的一条红线是以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指导精神文明建设,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还吸取新兴的哲学学科和观点,例如主体论、价值论、系统论等到精神文明建设中来,使之内内容更丰富,境界更高。精神文明建设实质上是主体建设,是“四有”新人的建设,是主体的世界观和人的素质建设。世界观对精神文明建设是起着指导作用的。该丛书还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中各种辩证关系和矛盾分析,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的表现和内容,要求正确处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部和外部以及各个方面的辩证关系,使之协调,成为合力,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在方法论上,该丛书既强调应用辩证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又主张广泛地吸取各种方法到精神文明建设的不研究中来,使之更加灵活,丰富多彩。

第二,形成系统工程,建构有序系列。该丛书不仅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个宏大

的系统工程来研究,而且丛书本身也形成一个系统工程,从有序与无序的角度研究精神文明的系统工程和两个文明的关系及其历史进程。该丛书从精神文明建设基础论起步,进而论述精神文明的主体论、价值论、系统论、过程论、机制论、方法论等七个问题,成为一个系统。又从各个侧面阐明地理环境是孕育和催发精神文明的自然前提;社会经济状况是精神文明的决定力量,社会政治要素是精神文明前进的驱动杠杆,人民群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力量,教育是精神文明发展的智力支持,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提升的加速器,文化是塑造精神文明的强大力量,道德是精神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和行为规范。这又是大系统中的系统,综合成为有序系列。

第三,时代感鲜明,立论新颖。该丛书紧紧扣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从哲学角度阐述在改革开放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各本著作不仅充满着鲜明的时代气息,而且富有新意,在吸纳现代科学成果基础上,提出新颖观点。例如,对精神文明建设基础论进行新的探索;把可持续性发展吸纳到精神文明建设中来;拓展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论、价值论、系统论的研究,从哲学上推进了一步;用层层递进的方法分析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过程,这都使人有清新的感觉。

第四,可操作性强,虚功实做。该丛书既把哲学和精神文明融为一体进行系统论述,又密切联系实际,尤其是联系广东省和广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典型,使该丛书具有精神文明建设的共性和理论性,同时带有地域特点的个性和实践性,并使该丛书洋溢着“实体化”、“可操作化”的内涵,认真做到虚功实做,求真务实,切实可行。这在《精神文明建设机制论》中最为鲜明和突出。

张磊(广东省社科联主席、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这套“丛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和视角出发,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关重大课题作了深入的探究,并就一系列基本范畴加以阐发,揭示出不同层次的

规律性,从而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理论和实践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该书的优长之处,首先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并运用了诸如系统论等方法,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基础”的内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即是全面提高人——主体的素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多元的价值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过程及规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工程”的诸多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涵义和作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法,作出了哲理性的思考和论述,从而,深化和提高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

其次,丛书密切地联系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广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尽管丛书着重从哲学的高度审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关重大课题,但这些课题都是源于实践,而作者的论述,也是为了促进实践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方法论》一书,就在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后,论述了矛盾分析方法、知行结合方法、物质利益和思想政治工作相统一的方法、法制方法、实验示范与推广相结合方法、扬弃方法和控制论方法。这些论述,显然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

李权时(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这套丛书最大的特点是创新性。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命题新。丛书着力于把哲学研究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研究结合起来,这是哲学研究的新探索,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因此,丛书的出版本身就具有开创性意义。就从书中的每一本书而言,分别从基础论、主体论、过程论、机制论、方法论、系统论、价值论等角度出发,探索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这就直接抓住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表现了丛书策划者和作者们敏锐的理论眼光。

二是体系新。丛书中的每本书都有各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各书之间又



有紧密的逻辑联系,从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精神文明建设哲学研究体系,从基础论、主体论、过程论、机制论、方法论、系统论、价值论七个新的视角,对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实践前沿和理论前沿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研究,拓展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性研究,是近年来我国社科理论界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哲学研究的“系统工程”,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and 基础。

三是观点新。丛书第一次从哲学的高度来概括和剖析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让人耳目一新。丛书各书不囿于成说,立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丰富实践,以敏锐的理性思考对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的难点、重点问题进行了大胆探索,深入论述了精神文明的一些关键的、本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颇具见地的新观点。

四是方法新。丛书作者在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新知识,采用了问卷调查、实证分析和概率统计等各种现代研究方法。对理论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可喜的尝试。

五是材料新。丛书各书立足于广东、广州近年来理论研究的成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引用了很多崭新的素材,借鉴了一些国内外学术界近年的学术观点,许多材料还是国内第一次出现,从而使丛书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

邹永图(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从哲学的视角在广州市出版七本一套的《精神文明建设哲学论丛》,探讨精神文明问题、总结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经验,在国内尚属首次。这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理论升华的可喜成果,极有意义!

首先,丛书从哲学的视角探讨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这一丰富的实践,使它具有的现实性、具体性、丰富性的品格,上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又赋予了普遍性、抽象性和逻辑性的品格,这是理论的飞跃。当这种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哲学论证再回到实践中去指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时,必然使建设者们更加自觉,必然成为净化人们灵魂的有力武

器。事实上,只有真正掌握了精神与物质、系统与过程、主体与客体、真理与价值、机制与规律等等社会的历史的辩证法,才有可能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事业中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矛盾,提出解决的思路 and 办法。可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将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实践、改造社会、提高人的素质之功能。

其次,丛书从哲学的视角总结精神文明建设的丰富经验,有助于人们更为深刻地把握党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总方针和大方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

《决议》明确指出:“我们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开放改革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如此宏伟的社会改造的系统工程,如此远大的时代任务和历史目标,如果没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素养,就无法把握;如果没有作为工人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理论,就不可能理解党中央决策的深远意义并具体指导文明建设活动。这套丛书的出版,十分有助于人们提高哲学素养,取得文明建设的更大成绩,推动社会的进步。

最后,这套丛书的编写与出版,对于更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理论水平,是一个可喜的成果,又是对精神文明问题理论研究的有力推动。众所周知,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理论自身,是多层次的。其中,由具体的实证科学层次上升到哲学理论层次,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正如列宁所说,哲学没有任何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各种不同的部门中间。在我国丰富的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相继产生了有关“精神文明学”等各种论著,这为精神文明建设“哲学论丛”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反过来,“哲学论丛”必将对其他层次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发展起有力的推动作用。所以,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一不可。社会生活是复杂的,相应地产生了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两性文明等类型。其

中,精神文明渗透在其他各种文明类型之中,具导向作用,这是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原因之一。因此,加强各个层次的精神文明理论研究,从具体的精神文明建设实例经验总结,到精神文明学原理和范畴的探讨,再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哲学研究,都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愿广州出版的这套丛书,既是一种可喜的成果,又是一个新的起点,让精神文明理论之花开遍祖国的园地!

李恒瑞(广东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这套丛书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值得称道。第一个特点,是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改革开放前沿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上的再升华,展开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论、主体论、过程论、机制论、方法论、系统论、价值论,各论之间又显现出逻辑的联系,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架构。对社会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必须借助于哲学的方法论,精神文明建设尤其如此。该丛书定名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哲学论丛”,体现了这一特点,使之在理论的开拓上优于其他泛谈精神文明的著作。第二个特点,是理论上的创新精神比较突出。该论丛的七本著作,都有不少颇有新意的理论概括,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例如,该丛书提出了精神文明发展的“大基础”(基础多元)的概念,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主体建设”的论断,对三大机制(动力、调控、保障)的探讨,强调“机制问题就是一个本质问题”,对精神文明发展的过程的新概括,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法论体系的总体描述,对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的论述,最后从社会发展观的高度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与归纳。相信这些新见解必将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刘景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总结广大群众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鲜经验,探索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用正确的思维方法克服错误的思想方法,帮助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向更深、更高层次发展,这是该书的总体构思和突出特色。该书编委会主任朱小丹同志在书序中对此作了详尽阐述,富有开拓性和创造性。

勇于提出问题和探索问题,推动人们思考和研究,是《丛书》一个鲜明的优点。例如,《基础论》一书中提出并探讨了物质与物质文明的关系、精神与精神文明的关系;《过程论》一书分析了两个文明建设失衡的问题;《方法论》一书探究了控制论与系统论的关系及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等等,无疑会给人们予诸多启发和思索。

深入分析,缜密论证,坚持严肃的科学态度,力求推陈出新,提高学术水平,是《丛书》一个宝贵的特色。《主体论》一书从“类”的角度和“个人”角度分析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颇有新意。《机制论》一书翔实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内涵和作用,仔细分析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力机制、调控机制、保障机制等等,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逻辑与历史的有机统一,是《丛书》又一个突出的特色。《系统论》一书,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出发,全面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系统中的思想理论建设、道德建设、科技建设、教育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功能和发展途径。《方法论》一书分析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矛盾和其他矛盾,分析了南华西街和先进人物的典型意义,无疑对实际工作具有指导价值。

如果此书再版,我建议在如下几方面下些功夫进行修改。一是《丛书》中的各本书之间的分工与联系需要加强,切忌不必要的交叉重复。例如,《基础论》、《过程论》、《系统论》都详细论证地理环境、经济、政治等因素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就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二是要增加、补充一些重要内容,例如“实事求是”这个哲学精髓应当在《丛书》中有专章的论述。三是概念、判断、推理要力求准确和合乎逻辑,目前某些章节中的物质与物体的概念、文明与文化的概念的区别与联系,需要进一步明晰与界定。我们深



信：这部《丛书》的作者们日后会更加精益求精。

叶汝贤（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丛书从哲学高度思考、研究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解决了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等问题，这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将对精神文明建设实际问题的解决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

精神文明建设基础理论研究本身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精神文明建设进行哲学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就理论本身来研究理论，不一定能把理论研究透彻。但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往往能解决很多理论问题。基础理论研究必须植根于社会实践。丛书的成功出版，为我们开展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黎克明（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广东近年来在精神文明建设的教科文卫方面，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但是，在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道德方面，尽管作了极大努力，成绩仍然不够理想。今天，广东人敢向全世界夸口“广东经济繁荣”，却不敢夸口“广东道德高尚”。1982年中共“十二大”曾经发出“争取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伟大号召，十多年过去了，谁也不敢说在广东已经“好转”，更不敢说“根本好转”。究其原因，不能简单地责备各级领导“一手硬，一手软”，他们何尝不想两手都硬，事实上也花了大气力。广东“五个一工程”获奖项目在全国名列前茅。派去新加坡参观学习的代表团为数不少。究竟在什么地方“卡壳”呢？我认为是在信仰问题上“卡壳”。邓小平对“四有新人”的提法，第一是有理想，第二是有道德。这是有道理的。有高尚理想的人才能够约束自己的私心，“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们的高尚理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久前的抽样调查表明，领导干部、党员团员中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怀疑，至少是不坚信。

要在领导干部中恢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就必须弄清楚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学说中哪些是至今仍然正确的，哪些是当时正确后来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得不正确，哪些是当时就是错误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中哪些正确的理论，纠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中哪些错误的理论，抛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中哪些不正确的理论，创立了自己的哪些正确的理论。现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如果不弄清楚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代对老师们的理论的取舍，恐怕也只能学到一些皮毛。

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同志们才有可能不再口是心非地而是坚定地心悦诚服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谈得上对市场经济以及绝对权力条件下的腐蚀有抵抗力。我祝愿有一天可以出版这套丛书的第八本《精神文明建设理想（灵魂）论》，使这套可贵的具有开创性的丛书能够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刘嵘（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各个不同领域。因而，各个领域之间有其不同关系，而且和物质文明建设各个领域之间又有其不同的关系。关系是矛盾，没有解决的矛盾，即是问题。怎样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解决其中问题，这就要求学习、阅读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和文献，领会其要旨。这就是“知其然”。但是，又要学习、运用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

《论丛》编委会主任朱小丹同志在《序》中，说清楚了“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实际工作的同志，都应该联系实际学一点哲学。”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哲学研究工作的同志，也应该运用一点哲学，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这不仅仅通过哲学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作贡献的问题；而且，在服务中，提高聪明才智。特别是不但和各单位哲学工作者实行联合，而且和各个单位的实际工作者实行联合，把实际工作的经验教训，上升到哲学高度，可能发表一些新见解，对

哲学思想有所创新。“运用”可以说是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桥梁。学点哲学可以长智慧,主要是表现在运用哲学看问题,可以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深一些。

从我所读到的本子如《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论》,不仅从中可以懂得一些主体论的哲学思想,更重要是分别深入研究主体的世界观、道德、知识、审美、人格等等建设,最后,归结为人的综合素质建设。这不但有助于怎样指导主体的精神文明建设,且有深度、有新意,读来有清新顺畅之感。又如《精神文明建设系统论》对于“系统功能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结合实际,作了具体的、深刻的分析,指明 $2 > 1 + 1$ ,或 $2 = 1 + 1$ ,或 $2 < 1 + 1$ 的原因,有新意,通俗生动,发人深思。如把系统论和矛盾论的关系结合起来作一点分析,就更好了。

总之,现实问题需要哲学研究,哲学研究需要现实问题,把两者结合起来,可起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作用,这是哲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子,坚持走下去,必有所成。

张先贤(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从哲学高度探索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一、这条新思路,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功能。正如《论丛》编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朱小丹同志在《序》中深刻指出:“实践使我们越来越迫切地感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可能找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就不可能有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科学性和预见性,就不能清醒、自觉地把精神文明建设推向前进。”

二、这条新思路,紧紧抓住“主体建设”这个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围绕着主体和客体关系的哲学问题而展开,从而揭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

三、这条新思路,把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显现出它的创新性。这套《论丛》,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结合广东、广州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把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创

造性,使这套《论丛》既有改革开放的时代特色,又有广东、广州的特色。

顾作义(广东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策划组织的《精神文明建设哲学论丛》,从精神文明建设内部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系统、整体运作过程,构建丛书的体系,形成了“七论”。这“七论”把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与哲学理论结合起来,把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主题集中,结构严谨,观点鲜明,是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的一套好书。其中《精神文明建设机制论》是这套丛书的力作之一,具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一是对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强的指导性。精神文明建设为什么会出现“一手硬、一手软”,“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缺乏一个有力的、完善的机制,保证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也“硬”起来。“机制论”,对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内涵、结构、内容都作了透彻的论述,对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落到基层,都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二是遵循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提出了完整的机制体系。作者在机制的结构中,划出了三个基本层次,即动力机制、调控机制、保障机制。在每个机制中又有子机制,形成了一个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这三个机制反映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和运行过程,有较强的科学性。

三是有不少独特的新创见。作者在对“机制论”的研究上,解放思想、勇于求索,在理论上有不少新的见解和突破。如在论述动力机制上,提出了如何建立一种精神文明建设资源的最佳配置机制的问题;提出了要重视利益牵引机制的作用,运用共同利益把人民群众凝聚到创建精神文明建设中来;在调控机制上,强调了领导组织机制、教育教化机制。更指出要注重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机制的作用,这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道德状况、文化状况出来的;在保障机制方面,提出要建立量化指标,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效果加以检验等等。

当然,精神文明建设的机制建设,要随

实践的深化,作进一步的研究。如在动力机制方面,如何建立精神激励机制,与利益牵引机制相结合,在调控机制方面,如何建立更多的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开放的、民主的、平等的渠道;在保障机制方面,如何建立科学的量化指标体系等。希望作者今后在理论研究中,对机制论加以丰富和发展。

曾近义(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精神文明建设方法论》一书,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结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的方法和方法原则,因而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

首先,该书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书的论述较好地体现了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方法,紧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把握“三个有利”的原则,实事求是地总结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法论问题。

其次,该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全书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特别是广东、广州的实践成果,概括总结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分析法、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方法、物质利益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法、法制方法、实践、示范与推广相结合的方法、扬弃方法、控制论方法等。较好地体现了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的精神。

第三,该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全书立足现实,大胆探索,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比如提出了我国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基本矛盾,并在此基础上经过深入分析,认为进步的、适合时代需要的思想文化与保守的、不适合时代需要的思想文化的矛盾是起主导的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抓住这对主要矛盾,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其它矛盾就可迎刃而解。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颂的。

最后,该书行文也力求做到说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如扬弃方法、控制论方法等,使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能从中得到启迪。

范英(广东省社科联研究员):《精神文

明建设过程论》展示了比较严谨的结构,比较清晰的脉络和比较新颖的立意,表现在:

第一,该书重点抓住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出现的新问题、新经验,重点抓住当前理论上急需解决的热点、难点进行研究,其评价标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其论述过程的辩证思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譬如,该书在谈到我国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走向时,引入物理学上“无序与有序”的概念,并赋与它以新的涵义,来揭示我国两个文明的关系以及精神文明形成、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因而具有较新颖的立意和较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第二,该书用较为严密的逻辑,构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哲学味浓烈。第一章以浓缩的笔墨,回顾和总结了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主要规律;第二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继承与超越的关系,并由此转入对我国精神文明发展问题的研究;第三、第四章回顾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的曲折过程,揭示了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第五章进一步总结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无序到有序的实践走向;紧接着的第六章再把研究的笔触集中到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特殊过程;最后的第七章研究了面向未来的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勾画和憧憬了21世纪的情状。可见该书理论框架的一个特色,是把精神文明形成、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贯以“过程”这一主线。无论从标题的逻辑建构还是内容的阐述,都离不开过程分析法这一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可以说全书以人类精神文明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文明的形成、建设和发展为研究对象,用过程分析法构建起自己的理论逻辑的。也从这一整体框架中,使读者感到既开合有序、主次分明、有所侧重,又脉络清楚、主线突出、逻辑严密,因而体现了作者们较为浓厚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功底。

第三,该书贯彻理论为现实服务的原则,因而文风通俗,可读性较强。如在阐述

精神文明发展的矛盾性时,作者用曾经被誉为“文化风景线”的广州市街头的千米报廊的命运作为典例,分析和说明了文明与愚昧冲突的表现及原因,既通俗有趣、生动活泼,又抓住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读后给人以教育和启发;又如作者谈到当前社会上讲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少了,一些人积极进取的热情被一种“混”的咏叹调所取代,所谓“混张文凭”,“混口饭吃”,“混个位子坐坐”等等现象时,指出“哀莫大于心死,情莫大于丧志。”认为当前迫切需要加强理想和信念教育,要尽快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支柱。这种表达和分析方式,既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通俗文风,又使该书具有较强的

可读性。

同时,该书并没有停留在对现实问题和情况的一般表述,而是注意进行必要的理论概括和提升,注意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形成、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带规律性的东西。而这种理论的概括和提升也是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述的。因而更贴近现实,更生动活泼,更不致流于肤浅。如讲到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的规律性时,分别用矛盾性、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阶段性和渐进性这些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概括;讲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走向时,又用从被动到主动、从低级到高级、既治标又治本等习惯的语言来表述,而不是空谈大道理,因而具有吸引力和可读性。

## 《精神文明建设哲学论丛》简介

1. 《精神文明建设基础论》(作者:郭明、谢传仓、曾伟玉),本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出发,较全面地阐述了各种相关的社会要素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作用,提出了精神文明发展的基础多元化的概念,阐述了精神文明的起源以及精神文明“大基础”的内涵。深入论述了地理环境是精神文明孕育的自然前提;经济状况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决定力量;政治要素是精神文明前进的驱动杠杆;人民群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力量;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智力支持;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提升的加速器;文化是塑造精神文明的强大力量;道德传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阐述了改革开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开放是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动力,给人以强烈的时代感。

2. 《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论》(作者:章海山、张建如、罗明星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本质上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也就是主体的素质。在这个意义上说,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主体建设。本书从哲学高度去研究分析精神文明建设和人民群众及每个个人的互相促进的关系,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和建设者的一致,从而更加明确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和实际操作。阐述了主体与精神

文明的辩证关系,主体的世界观建设、道德建设、知识素质建设、审美建设、人格建设、公民意识建设、综合素质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互动关系。

3. 《精神文明建设机制论》(作者:李明华、余少波、叶蓬、周祯祥),本书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涵义和作用,提出了构建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指导思想、目标和要求,具体分析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力机制(包括启动构建机制、资源优化机制、承续创新机制、利益牵引机制和“自建”“共建”机制)、调控机制(包括领导组织机制、控制协调机制、导向激励机制、教育教化机制和评估反馈机制)、保障机制(包括规划投入机制、干部考核机制、法治强制机制和检查监督机制)。

4. 《精神文明建设过程论》(作者:谷文耀、章岳云、马兴煜、李仁武等),本书运用哲学过程论的基本观点,探讨了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发展和不断走向深化的实践过程;回顾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的曲折道路,提出要用发展的观点辩证地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性、阶段性、渐进性;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充满机遇与挑战的特殊过

程;对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希望和设想。

5. 《精神文明建设方法论》(作者:张涛光、杜焕强、余方海等),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概括、提升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较全面地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法。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分析方法、知行结合方法、物质利益和思想政治工作相统一的方法、法制方法、实验示范与推广相结合方法、扬弃方法和控制论方法。

6. 《精神文明建设系统论》(作者:江家齐、黄禧祯等),本书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从精神文明建设系统的整体、要素、结构、功能、环境和优化等诸方面,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宏伟的“系统工程”作了全面的分析和阐述,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系

统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系统优化的标准、环节和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性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7. 《精神文明建设价值论》(作者:丘丽云、叶启绩等),本书的主题是奋力拓展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认识。围绕这一主题,本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出发,较全面地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创造价值、人生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提出精神文明是地球之花的花蕊,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结晶,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必要条件,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要地,是通向理想社会的必由之路。

---

#### ·学术动态·

## 广东社科界连续举办“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座谈会

1978年春,神州大地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申了一个看似平常的哲学命题,但却引发了一场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势如汹涌澎湃的春潮,猛烈地冲击着禁锢多时的沉寂的思想领域,冲击着人们形形色色的精神枷锁,从而为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广东社会科学界在这场大讨论中是走在前列的,其中哲学界的同志更是得风气之先,率先投入了这场大讨论,其成果即在本刊发表。为了纪念

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讨论,在新的形势下推动新的思想解放,广东哲学学会、广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广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学术研究》杂志社于4月间连续多次举办了“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学者怀着激动的心情,结合广东改革开放的实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畅谈了这场讨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详见本刊1998年第5期)。

冯 生)



# 试论利率杠杆

## 在当前经济运行中的调节作用

□许经勇

当前,我们既要对投资和货币供给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又不能完全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手段,这就要求寻找间接调控的政策工具,而利率政策将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资金利率的市场化,不仅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货币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关系,起着价格信号的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调节货币的供给与市场的需求,起着经济杠杆的作用。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产品价格已经市场化,这就为资金价格——利率的市场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提出迫切的要求。如果产品价格市场化而资金价格(即利率)没有市场化,那么,作为最稀缺而又很重要的资源——资金就无法参与改变产业结构失衡和商品总供求结构失衡的资源重组过程。没有资金结构的调整,所谓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调整,不过是纸上谈兵。如果资金配置非市场化,那么,资金以外的其他要素的配置也不可能合乎市场化的要求。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正在逐步引向深入。1996年6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取消对同业拆借利率的限制,放开各期限档次的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利率运行稳定。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对国家重大经济、金融政策的调整及金融市场的变化反应日趋敏感,已成为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中央银行全面放开同业市场拆借利率是成功的,对推动同业拆借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为中国今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民银行在不断改进贷款规模管理的同时,比较好地运用利率这一政策手段来控制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根据物价和经济运行情况,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4月份停办对居民储蓄实行保值的业务,又分别于1996年5月1日、8月23日和1997年10月23日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是改革开放以来利率下调幅度最大的年份之一。前两次累计存款利率下调2.48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下调1.95个百分点;第三次存款利率下调1.1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下调1.5个百分点。以一年期定期储蓄存款和一年期贷款的利率为基准比较,在第三次利率调整中,不但绝对利率降幅达到并超过前两次,而且相对降幅更高达24.09%(存款)和14.28%(贷款),其强度比前两次提高25%和45%。目前的银行利率已降至1987年以来的最低点。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三次调低存贷款利率,较好地调整了国民经济中企业、居民、政府和金融等部门的分配关系,而且对物价大幅度下降可能引起的规律性经济衰退起到了缓解作用,最终保持了币值的稳定,促使经济平稳增长和良好发展。

在三次降息中,中央银行都比较明确地表示,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经济效益都不理想,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过高,虽然高负债



并不是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最主要因素,但沉重的利息负担毕竟压得国有企业喘不过气来。第一次和第三次利率调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存款利率的下降幅度低于贷款利率的下降幅度,存贷利差进一步缩小,这意味着降低利率的收益大部分让给了借款人,特别是负债率较高的国有企业。据测算,仅第三次把贷款利率下调 1.5 个百分点,就减少国有企业 650 亿元左右的利息负担。第一、二、三次的利率下调,对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的降低幅度更大,这对国有企业增强技术改造能力,加快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以及减轻中长期债务负担,都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几降息理解为国家再以特殊的方式补贴国有企业。形成较为宽松的经济金融环境,理应有利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这里有个问题值得引起人们深思,即国家给予国有企业各种名目的“照顾”和各种形式的“补贴”,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改革以来出台的许多政策都包含着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但效果并不理想。这是有目共睹的。从实际运作的效果看,对三次降息受惠最大的国有企业,并没有明显出现增利减亏的局面。有关资料表明,1994 年以后国有企业的利润是逐年滑坡的,亏损是在不断增加的。1997 年 1—9 月的数字表明,这种情况也没有好转,只相当于 1996 年全年利润的 54.6%,而且亏损仍呈上升趋势,这三季度相当于 1996 年全年的 80%。事实告诫人们,对利率杠杆带动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当前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迟缓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治理结构既缺乏激励机制又缺乏约束机制。人们都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股份制改革是重要途径。而股份制的实质在于通过明晰产权界定,使企业受到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但目前我国有不少上市公司,其股权中国家股和法人股占了极大的比例(1997 年底占 72%)。从国家股来看,长期以来,国有资本产权虚置,造成“内部人控制”,这种状况至今仍未转变;从法人股来看,大多数法人股东本身也是国有资本占绝对主导地

位,同样存在产权不明确问题,又如何能有效地监控自己参股的企业呢?至于个人股,由于其高度分散,所占份额小,谈不上能对上市公司形成有效的监督。如不改变这种状况,中央银行降息的初衷将难以实现。

银行存款利率的降低,在一般情况下,是会刺激部分资金由储蓄转化为投资,降低居民的储蓄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增加迅猛,1994 年以来,年均以万亿元的速度递增,大大超过当年的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从 1978 年的 31.2% 下降到 1996 年的 11.8%),银行储蓄存款大幅度上升(从 1978 年的 210 亿元增加到 1996 年的 4 万亿元)的情况下,把城乡居民的储蓄集中于国家银行,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这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城乡居民储蓄采取银行存款单一形式,也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这集中表现在银行信用资金的运用的软预算约束,使得银行因此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对于国家银行来说,由于其资金投向主要集中在目前经济效益欠佳的国有企业,风险是很大的(表现在不良资产比重很高);但对于城乡居民来说,把钱存入国家银行就等于把钱交给国家,是不承担任何风险的。由于国家银行对国有企业缺乏强有力的约束,不良贷款大幅度增加,目前已明显超过国家银行的自有资本金。要避免上述负面影响,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其中应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发展资本市场,把居民在银行中的一部分储蓄逐步分流出来,拓宽直接投资的渠道。三次减息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削弱银行存款对城乡居民的吸引力,促使城乡居民的金融资产从银行转移到国家债券和股票。第三次利率下调后,国库券票面利率高出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 3 个百分点还多,个人投资者减少银行存款量,将资金投向国债市场似乎是个趋势。

三次降息后给股票市场所带来的影响,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尽管经历了连续三次的降息,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仍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这一方面说明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

展,城乡居民收入也在迅速地增长;另一方面说明了,银行储蓄乃是中国百姓最传统和最信任的家庭和个人财产储备方式。也可以这样说,目前城乡居民储蓄的主要出路仍然是银行存款。不可否认,降息后也曾经使部分资金流向金融市场(在第三次降息后的最初十个交易日中,深沪股市的总成交额从40至50亿元迅速扩大到140至200亿元之间),但这并没有给资本市场带来长线投资者,相反的,却会引起市场的不断震荡。在降息的一年半中,中国资本市场的集散地——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都出现连续的震荡。尤其是在每次降息前后都给股票市场带来明显的系统性风险。

这就涉及到当前股票上市公司的经营机制问题。众所周知,当前股票上市公司的质量,从总体上说并不高,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上市公司的机制不合理所造成的。现在我们决定那家公司企业能上市是由行政审批的,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运行机制。到现在为止,中央已定过四次盘子。第一次是上市50亿元;第二次是上市550亿元;第三次是上市150亿元;第四次是上市300亿元。现在第三次的150亿元还没有用完,那么后续的300亿元怎么办?这种由中央向省下达指标的办法,省里拿到配额指标首先考虑的往往是困难较大、效益较差的国有企业,或者是微利企业。而微利企业股票上市,究竟能给股票市场带来什么呢?应当这样看,微利企业之所以不能取得较好的效益,其主要原因往往并不在于缺乏资金,而是在于缺乏应有的市场竞争力。虽然股票上市有利于推动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但在仍然由国家控股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变化毕竟是很有限的。完全可以预料,许多微利企业在用完募股资金之后,仍然会陷入困境,这就有可能把银行风险转移为股市风险。在一个已经发展成熟的股票市场,微利企业是很难在股票市场中进行融资的。但是,由于我国的股票市场还处于发展初期,还很不成熟,存在严重的缺陷,使得股票市场价格和上市公司的业绩(效益)背道而驰。这是许多股民所以热衷于短期性投机,

而不着眼于长期性投资,股票市场震幅很大以及不敢轻易把银行存款大规模分流于股票市场的根本原因。

银行存款利率的降低,从理论上说,必然会刺激消费品,尤其是高档耐用消费品市场的扩大。即必然会促使居民把部分存款分流出来,用于购买消费品,尤其是高档耐用消费品。但实践的结果是降息后居民储蓄增幅的下降,并没有带来消费需求的同步增长,或者说,储蓄下降的幅度并不是很大。1997年的消费市场在1996年相对走软的情况下,有进一步萎缩的迹象。因此靠降息来促进消费市场复苏的效果并不理想。

出现上述态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这三次降息是以不损害存款人的利益为前提的。对存款人来说,三次利率的下调,的确会给新增存款的利息收入大为减少。但以第三次利率下调为例,在这次利率调整前,一年期存款利率比同期零售价格涨幅高出6.17个百分点,比消费物价的涨幅也高出3.47个百分点,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少见的。即使这次利率调整后,居民存款的实际收益率仍分别比零售物价和消费物价涨幅高出4.37个百分点和2.27个百分点。二是我国的消费品市场目前正面临着“断层”危机。当前城市老百姓对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以及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许多家用电器产品的需求已经达到基本饱和,而农村市场的开发需要一定的时间,再加上住房、汽车这类“超级消费品”的消费热潮尚未到来,使得消费品市场难以进一步启动。三是金融资产分布不均匀,80%的金融资产掌握在20%左右的人手中。而随着收入水平向某一部分阶层的集中,使得这部分人的消费支出在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稳定阶段之后,收入的再增加将不再有增加消费支出的需求,而是近乎全部变成了储蓄。四是相当一部分金融资产不是来自持久性收入,而是来自暂时性收入和隐性收入,也就是说,即使现期收入较高,未来收入预期却是很不确定的。因而不敢贸然把这部分收入转化为消费,而是转化为储蓄。五是个人的收支模式正在从局限于眼前日常消费的支出转变

为着眼于个人终身消费的支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在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应付不测等方面的需要都是由企业和政府提供的。个人获取这类资源所作出的努力,主要表现为获取身份的竞争,以及对行政级别的竞争。而其工资收入的支出主要集中于日常生活消费上。即使是存款,也大多是为了购买“大件”日用消费品。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传统福利制所提供的“物品”逐步转移给市场,个人在医疗、住房、教育、失业、养老、应付不测等方面费用将更多地依赖于自己。这就要求个人在收支模式上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即从集中于眼前日常生活消费的支出模式转向兼顾眼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的支出模式。与这一转变相适应,目前很多个人储蓄存款的主要目的,不是持币待购或买“大件的”,而是着眼于应付个人未来消费需要,以及着眼于这类消费的个人资产保值。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个人收入支出未来化的空间还相当大。随着保险、福利制度改革的到位,个人收入支出未来化的趋势还会进一步扩大。

从银行的角度看,三次降息将使储蓄增幅减缓,同时由于贷款利率降幅大于存款利率降幅,银行将因此蒙受一定的损失。而这种损失从一定意义上会给银行予外部压力,迫使银行以此为契机,把注意力从单纯揽储转移到发展中间业务上来,这就有利于增强银行的竞争力。银行要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把自己的经营重心,由数量型转化为效益型,千方百计地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和生产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的存款几乎都变成了投资,因为站在银行后面的是政府,即政府批项目,银行出钱。各届政府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对投资的需求是无限的,这就必然出现投资饥渴症。但是,近一两年来,银行逐渐向商业银行转变,它们的运作开始有了独立性,政府也强调企业要自负盈亏,不能无限制地依赖于银行的钱为企业补亏损窟窿,于是银行的钱开始出现积压,这种存贷差还有进一步扩大的

趋势。对于银行来说,一方面是资金积压,一方面是贷款利率降幅比存款利率大,其所面临的挑战将是相当严峻的。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深化银行体制改革。

三次利率的下调,使得我国的资金价格向国际市场价格靠拢,即缩小了人民币利率与国际市场外币利率的差别,这就有利于防止投机者进行套利交易,从中渔利。同一种货币在国内外市场利率的差别是很微小的,但不同货币在同一市场上的利率差别却是非常明显的。这是由各有关国家的货币实值(购买力)、利率政策、汇价涨跌幅度、投资及再生产的周期性变动等因素形成的。一般说来,强币利率总是处于较低水平,弱币利率总是处于较高水平。低利率的货币(强币)难于同高利率货币(弱币)做套利交易。这是由于后者的汇率下降风险很大,汇率上可能出现的损失会远远超过利率差额上可能得到的利益。我国利率作为借贷资金价格,经过最近三次调整后,已经基本上和国际资金实现了价格接轨,极大地改变了我国资金价格明显高于国际资金价格的局面,这对于国内外资金的合理流动都有重要意义。在三次降息前,中国比美国的基本利率高3.56个百分点,相差达41.8%,中国和韩国的利率水平基本一致。但三次降息后中美利差大幅度缩小到0.14个百分点,仅相差1.64%。中国与美国的存款利率水平在三次降息后已基本接近,这意味着中国如果进一步降息将可能造成中外利差的反向运动,即必然会引起部分外资的回流(外流)。当然,因降息而导致一部分短期国际投机性游资的撤离,会给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带来正面的作用,我们也要合理估计会有多少其他性质的外资回流,以及外资回流中非正常外资的比例有多少,将会给国内市场带来多大的影响。总之,我们必须作综合分析研究。

作者许经勇,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361005)

责任编辑:韦前

## 一、“优化资产结构”就是要降低资产负债率

认识到要从资产结构入手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问题,具有进步意义,需要把国有企业的高资产负债率降下来。看来,这个目标已经是明确化了。这可以说是认识的深化,也是对两权分离、强调内部管理等改革实践的升华。

一般而言,降低企业资产负债不外乎两条途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加减法,即增加自有资本或减少企业负债,或二者并举。但对于如何降低资产负债率,又产生了分歧和争议,主要是基于对现实条件的不同判断。强调从企业内部资产结构着手的优化资产是某种折衷的产物,它从降低资产负债为目标,重点落实在债转股,侧重强调企业内部资产结构的重组。按照这样的逻辑,企业之间的资产重组同样可以进行。实践中降低资产负债率的措施是这样的,将原来“拨改贷”的财政资金重新转化为股本金,

一些财政性的税费也留作资本金,企业一些长期不能兑现的债务转化为股本金(如企业三角债)或部分免除(如银行挂息),当然还有些别的措施,不一一列举。从增量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社会固定资产结构调整和变化规律(表1):

表1 固定资产资金来源结构变化趋势%

年份	财政	自筹及其它	利用外资	银行信贷
1981	28.1	55.4	3.8	12.7
1985	16.0	60.3	3.6	20.1
1992	4.3	62.5	5.8	27.4
1993	3.7	65.5	7.3	23.5
1994	3.0	64.7	9.9	22.4
1995	3.0	65.3	11.2	20.5
1996	2.7	66.1	11.7	19.5

# 『优化资产结构的局限性』

□ 榭 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

但是,继续这样的调整能否起到同样积极的效果呢?从趋势上看,财政的比重不断下降,信贷的比重相应地有所增加,但是二者总和还略呈下降趋势,而企业自筹资金一直在增加。这部分募集的资本介于类优先股和债券之间参与分配,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经营,我们不是太清楚。改革往往被赋予双重任务,即要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不光是涉及结构调整和增量调整,同时还是存量的市场化过程,这种单一的调整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 二、“优化”的局限性

静态地看,用资产结构来说明企业经营效率存在误区。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核心”资本在企业中吸引资本的潜力,如声誉和科技。一般来说,绩效良好的企业更愿意采取发行债券的形式筹集资本而不是股

票。企业发行债券表明企业具有潜力和经营能力,相反,发行股票却是坏信息。当然,发行债券是有限度的,否则债券风险增加,会导致逆向行为(Adverse actions)。

表2 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结构(30年平均)%

国别	资金来源			
	内部资本	其它	资本市场	银行信贷
美国	75	0	13	12
加拿大	54	6	19	21
法国	46	-5	13	46
德国	62	12	3	23
意大利	44	4	13	39
日本	34	0	7	59
英国	75	-7	8	24

资料来源:王国刚(1997)

我们就以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结构为

证来说明不规则性 (见表 2), 其中内部资本主要是指企业折旧和利润留成。从表上看, 债一股比例没有什么定律, 而与本国的市场条件有关。所以, 即使假设表 1 中企业筹集资本 (包括利用外资) 全部都是从资本市场上得到的, 那样的结构和趋势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更何况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资本市场存在)。

动态地看, 资产增长的既有基础越来越小。即使国有经济仍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52%, 除了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资本化外, 调整的余地也是极其有限的。其它如表 3 所示:

表 3 几种经济成分的资本结构 (1996 年) %

资金来源 类别	资金来源			
	财政	自筹及其它	利用外资	银行信贷
全社会	2.69	66.04	11.73	19.54
股份制	0.98	64.89	6.12	28.01
国有经济	4.62	65.11	6.70	23.57

我们看到, 财政和信贷的比重实属正常范围, 自筹资金中折旧又占了 7.8%, 以及从前的财政信贷留给企业的, 因此依靠这部分资金的挖“潜”, 或贷改投, 其增长的余地都是十分有限的, 如果自筹与外资中负债比例仍然很高, 那么企业的负债率当然就高 (60%~80%), 问题是如何改变这部分负债的比重。按照产权和风险的一般理论, 债不可能改股, 那么如何减少负债率? 由于对“负债”的理解不深因而导致单纯考虑从存量减少负债, 而广义的负债是建立在开放的市场化体系上, 不管是股本还是债券都应该是企业的负债。它相对资产而言, 表明资金来源和资本结构, 它包含狭义上的负债, 即债务负担。若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 可以使得问题简单化, 如果负债率太高的话, 就应从资本市场筹集股本扩大分母, 而不是缩小分子。显然, 市场行为与行政行为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除非破产, 否则负债 (无论是债还是股) 都是负担, 其增长潜力十分有限。

### 三、企业资本结构调整与资本市场发展同步

如果说迄今为止, 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是因为承担着经济稳定的需要, 是改革的稳定器, 那么, 随着企业效率和效益下降、亏损扩大以及规模缩小和失业增加, 其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加。

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互为条件、相互制约、有机结合的两个方面: 一是国有产权制度改革, 实现国有资本多元化; 二是允许国有资产进入市场, 促使国有资本运动、流动起来, 进入市场交易, 实现国有资产存量调整和重组, 优化国有资产的资源配置。促进国有企业并购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并购国有企业, 鼓励私有企业并购国有企业。这不但不会使得国有企业的力量削弱, 反而会使得国有经济的力量进一步增强, 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性转移。

1、国有经济具有强大的实力, 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72873 亿元, 占全社会资产 65% 以上; 同时又有许多资源闲置, 在配置上表现为三“多”三“少”: 停工、半停工的多, 资产充分利用的少; 占用的多, 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好的少; 亏损多, 企业横向联系少, 企业组织程度低。从着眼于每一个国有企业到着眼于整个国有经济, 是对国有企业改革作出的重大战略转移。促进国有资产存量的调整重组, 优化国有资产的资源配置。该破产的破产, 能兼并的尽可能兼并, 规范破产, 鼓励兼并, 特别要支持有实力的大企业、优势企业兼并弱小企业、劣势企业; 鼓励国有企业同其它经济成分的联系, 尤其是参股、控股, 实现国有资产的合理组合, 盘活国有资产存量, 优化配置, 实现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这既是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 也是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没有这一结构性的调整、整合过程, 像日前这种严重亏损的局面还会拖延下去, 国有企业难以走上市场经济的正轨; 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也无法充分有效地发挥。

2、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整合, 造就经济新的增长点, 坚持国有大企业集团的发展战略。我国的产业基础虽然不小, 但是与国外的大跨国公司比较起来组织程度较差, 国有



大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从总体上看,够得上等级的少。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速产业整合过程,尽快完成集团核心企业的公司化改造,建立促进产业发展的大型跨国公司。迅速提高自己的实力和竞争能力。转变大企业的经营机制,改变企业内部的治理组织结构,在集团内部建立起母子公司体制,充分发挥市场自组织的集中和并购,通过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国有资产行政划拨、企业兼并等等措施,壮大国有大企业集团发展的实力,增强大企业筹资、融资功能,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之路,有实力的外向型企业集团逐步向跨国公司过渡。(1)集中力量抓好国有大企业集团,采取股票、债券、合资等多种筹融资手段,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资金,结合大企业公司化改造,稳步向多元化经营发展,以适应市场和企业发展的需要;使其在稳定经济、稳定市场、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方面发挥中坚作用。(2)逐步放开小企业。国有85%左右是小企业,分布广、技术装备落后、技术力量薄弱、管理水平低、产品缺乏竞争力、经济效益差,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影响了国有经济的整体效益。进一步规范和明确国有资产的投向、规模和数量。通过改组、改造、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方式,直接推向市场,放活小企业。

改革国有企业资产结构不外乎以下两种途径:一种是静态的或存量的办法,另一种是动态的或增量的办法,优化资产结构的办法很多,如重组、兼并、收购。由于是无法正常经营条件下提出的资产优化,目的性很明确,政府干预性也很强,不可能是一种市场配置,那么这样改变资产结构经济效益不好也就不奇怪了。

产权结构产生的基础及形成的过程都是由资本市场决定的。在整体改革思路中,资本市场决定企业的资本结构,资本结构反映企业的产权关系,最优的融资顺序(pecking order)是这样的,从未分配利润(内部融资)→债券→发行股票。而优化资产结构单一地从产权结构→资本结构不过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和过程。前面我们讲到依靠内部融资以及债券融资的极限,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就要发展股票市场,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实现多元化的一个必要条件。许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企业融资都依赖外部资金和新股发行融资,像印度、土耳其、巴西、马来西亚、台湾、津巴布韦、南韩、约旦、巴基斯坦、墨西哥(Singh, 1995; Singh 和 Hamid1992)。以资本化相对于GDP计算,美国资本化共用了整整85年时间(即1810-1995年),但比重才从7%增加到71%,而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仅用了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可见历史的进程大大地加快了。我有另文(H, 1998)详细分析了股票市场吸收外资组合投资,这里姑且不论,现在就是说发展股票市场可以将部分居民储蓄转化为直接的资本投资,可以相应地减少企业的负债率,提高自有资本比率。这样改革国有经济就不是从单个企业改革出发,而是有了整体的观念和市场的观念,就会更注重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至少应使企业改革和资本市场同步发展,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作者 栢 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教授(100836)

责任编辑:谭湛明



# 从市场趋势谈企业文化力开发

近些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来说,都呈现出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推进的趋势。这个趋势,要求企业高度重视“文化力”的开发,切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大力提高企业的文化品位。

为什么会有这个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出现?为什么现代企业必须大力提高文化品位?显然,这并不是一个主观现象,并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产物,而从根本上来看,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展开来说,至少有以下九个方面。

## 一、现代商品中的文化含量、文化附加值越来越高。

现代商品中的文化含量、文化附加值越来越高,这是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发展趋势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以胡平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商业文化。而在商业文化体系中起着重要载体作用的是商品文化。这个商品文化,所指的是商品的文化内涵、文化附加值与文化特色,其中包括商品的构思、设计、造型、款式、装璜、包装、商标、广告等等。它们凝结着一定的文化素养、文化个性和审美意识,展示着一定的文明水平。放眼市场,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商品,都凝聚着一定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正是由于商品所包含的文化特色、文化个性,能促使这一商品在一定的消费区域和消费层次里增值、走俏。这个文化内涵、文化个性、文化特色,实质上构成了商品流通和商品布局的内在依据。而商品的文化含量越大、文化附加值越高,它的辐射能力便越强。现代商品开拓市场的这一趋势,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因为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发展,人们也必然会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

## 二、文化、科技在投入产出中的贡献率越来越大。

任何一种商品生产出来,都需要有两种投入:有形投入与无形投入。有形投入又称为硬投入,其中包括能源、资源、人力、财力。无形投入又称为软投入,是指文化、科技等。现代市场竞争,促使有远见和有生命力的企业,都在十分注重降低有形投入,而强化无形投入,即提高文化、科技在投入产出中的贡献率。走出高投入、低产出的误区,必须摆脱扩大外延再生产的老路子,走出扩大内涵再生产、降低有形投入、提高无形投入的新路子。这个发展趋势,要求企业决策必须永无休止地吸纳最新科技成果,把开发“文化力”放在重要位置。

### 三、智力优势正在取代传统的自然资源优越。

这就是国际经济学界研究 21 世纪世界经济走势中所分析的,绿色革命与材料科学革命的兴起已经降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拥有自然资源并不一定能够致富,自然资源贫乏也未必是致富的障碍。一场电信——电脑——运输——后勤保障体系的革命使全球资源网得以形成,而且还可以发展出一个世界性的资本市场。这就是说,电脑和电信手段使拥有资本积累不再是优势,今后只有掌握技术和拥有人才才是真正优势。微电子、生物科技、新材料工业、民用航空、电信、机器人加机床以及电脑加软件被认为是未来几十年的关键产业,它们都可以说是脑力产业。这些产业可以设在地球的任何一处。谁能有效地组织调动人的智力从事上述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就在谁那儿落脚。既然科技创造了人为相对优势,那么,争取人为相对优势就必须要求企业从上到下,每一个层次的职工都具备技能。职工的技能将是 21 世纪关键性的竞争武器。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国内生产总值就可以增加 9%。有这样一种说法:10 年前的教育,是今天的经济;今天的教育,是 10 年后的经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对市场

经济这个发展趋势的分析中引出的结论,是必须高度重视智力因素、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

### 四、生产工艺流程对员工整体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市场竞争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推动着生产工艺流程的不断优化。而生产工艺流程的优化,又对员工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莱斯特·索罗在《21 世纪的角逐》一书中曾经分析过这样的事实:已经进入大众消费市场的三种主要新产品——磁带摄影机和录像机、图文传真机和激光唱片机,是由美国人和欧洲人(荷兰人)发明的。但是,若看销售额、就业人数和利润三个方面,上述三种重要产品的市场,大部分被日本的企业所占领。这个引人瞩目的事实说明,谁能降低产品的成本,谁就能从发明者手中夺走产品,占领市场。在今天的市场竞争中,新产品的发明者若不能同时又是成本最低的产品制造者,发明的收益就微乎其微。而要成为成本最低的制造者,保持生产工艺流程的最佳状态,职工的整体素质就很重要。要提高素质,就要有教育的发展和在职培训的配合。现在不少企业都认识到实施名牌战略的极端重要性,但如果没有员工整体素质的提高,怎么能生产出名牌产品呢?这里所讲的员工整体素质,既包括科技文化素质,又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特别是职业技能和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责任的培训,实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绝非外加的可有可无的事情。

### 五、在国际营销中,克服“文化障碍”,实现“文化沟通”,也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商业文化、企业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开始使用“文化障碍”和“文化沟通”这样两个概念,并不是偶然的,而恰恰是市场经济实践的产物。因为在跨国经营中,由于文化

的差异使本企业的产品在品种、造型、款式、外观、包装、服务、广告和推销手段上,同营销地人们的文化素养、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特定的审美需求不一致,而造成产品滞销的状况,常常发生。人们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文化障碍”。而相反,产品若能同营销地人们的文化背景和审美需求相一致,则称之为“文化沟通”。由此,人们提出了重视跨国公司的文化管理,提出了进行“跨文化培训”的计划。因为国际间经贸活动的加强,企业经营跨国化,已成为当今的一个重要趋势。在这个发展趋势中,不能不重视因“文化障碍”妨碍实现营销战略的问题。因此,进行“跨文化培训”就成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中不可缺少的事情。进行“跨文化培训”,当然包括了解国外营销地的语言、人们的生活方式、风土民情及其历史、宗教、社会状况,并且了解营销地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和这种价值观念所源于的悠久文化传统。

#### 六、现代市场发展要求企业更加重视商品消费的心理成分和审美要求。

市场发展趋势是由消费的发展所牵引的,而消费经常处于变化和流动之中。我国学者黄河涛等人近来研究现代市场的美学冲击、生活质量的美学内涵、企业审美文化与审美文化产业、营销的美学革命、市场组合的审美战略、现代企业服务化营销的审美特征、审美生态环境与企业效益等等,就是观察到了消费发展中的审美化趋势。正是这种消费心理吸引着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新服务项目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正是由此出发,学术界提出产品的新的“美的文化标准”的观点。在产品的质量、耐用、经济性、实用性之外,还要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有个“美的文化标准”。这个“美的文化标准”,要求企业研究在产品的构思、造型、款式、风格、包装等方面如何体现出美学价值。要把美学注入产品的开发之中,注入营销活动之中,注入服务之中,这就是消费的审美化趋势对于企业的呼唤。

#### 七、形象力在市场开拓中的地位 and 作用越来越突出。

形象力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企业开拓市场的历史分析。当商品比较匮乏的时期,有商品不愁卖不出去;商品生产得越多,企业赢利就越大。这时,企业力主要取决于商品力。后来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只靠商品力不够了,还要有广告等营销手段,这就是说企业力要靠商品力加上销售力。而再往前发展,就是人们认识到,商品力加上销售力,还需要有企业形象的作用,这就是说,企业力等于商品力加销售力再加上形象力。近年来,在国际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界,提出“形象营销”、“形象制胜”的概念,提出形象力是企业较量的一个焦点,就是因为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推动,技术推广非常之快,生产同一种商品的厂家越来越多,销售同一种商品的商店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去哪家商场购买哪家工厂生产的产品,选择余地很大,而企业形象如何,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企业形象塑造、CI设计,成为今天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由科技进步所推动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自觉地进行形象建设,而企业形象建设又带动着员工素质和企业文明水平的提高。

#### 八、企业信誉正在成为市场中关键性的竞争要素。

企业形象是和企业信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早在1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就论述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时提出了“信誉高于一切”的观点。他说:“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一切企业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守法和守信是一切经济行为的两个基本规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协作经济。而竞争和协作都离不开讲信誉。因为失去信誉,竞争和协作都无

法正常进行。所以,“信誉高于一切”应当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则。200多年以前,富兰克林在提出“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命题时,同时也提出了“信用也是金钱”的命题。今天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就更应该讲信誉。企业信誉,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产品质量差,企业不可能有信誉。而注重产品质量不注重服务质量,企业同样会失去信誉。同样质量的产品而因服务不同会给企业带来不同信誉,因而商业文化讲“服务增值”,是很有道理的。在市场信誉问题很多,而全社会普遍呼唤信誉的今天,企业信誉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会更为突出起来。

九、企业运作中的文化纽带、精神纽带、道德纽带与产权纽带、物质纽带、利益纽带起着相辅相成、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现代商业中连锁店的发展说明,如何能“连”起来,如何能“锁得住”?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不只是连锁店,也包括所有企业、特别是大的企业集团,如仅仅靠产权、物质利益方面的纽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文化、精神、道德方面的纽带。正是由此来看,统一的企业理念、企业精神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渗透到企业内各个分公司、子公司、各种岗位上员工的精神动力。它们是无形的,又是能动的,可以在企业行为的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比如“同仁堂”的企业理念是“济世”、“养生”,“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个理念要渗透到海

内外各地“同仁堂”药店员工的经营行为之中。再如蓝岛大厦推行“情义服务”的企业精神,这个精神要贯彻到全国各地“蓝岛”分店内经营实践之中。同那些产权纽带、物质利益纽带相比,这些企业精神、企业理念属于思想道德上的纽带,可算是在企业经济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个文化、精神、道德上的纽带,起着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粘合力的作用,而这个内部凝聚力、粘合力又势必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开拓力。现在一些企业正在进行CI设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做到企业视觉识别系统与理念识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的统一。如果只注重外形视觉识别的塑造,而忽视内在的企业理念的培育,致使“形”与“神”不能统一起来,甚至重“形”而轻“神”,那么,就不可能达到企业形象塑造的目的。

自觉地认识市场发展的这些趋势,努力提高企业的文化品位,提高产品、经营管理文化含量和员工的整体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技术素质),有助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在统一。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运行,物质生产活动,并不是脱离精神文明制约的孤立的进程;精神文明内在于、渗透于市场经济的运行之中,它提升着物质生产活动的文明程度。企业为了迎接日益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为了提高凝聚力、形象力和信誉度,必须在“科教兴企”、“文化兴企”上进行深入开发,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作者贾春峰,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100000)

责任编辑:谭湛明

# 市场交易与合约安排

□ 易宪容

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里,任何合约安排对资源配置效率没有影响,有效率的结果总是可以通过无成本的市场价格机制或无成本的企业组织运作来达到。但是在交易费用为正的世界里,人们却会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来减少交易费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分配。因此,合约安排在市场交易中应运而生。可以说,交易成本出现正是合约安排出现的根源。(诺斯,1990)

不过,在新古典模型中,因为市场价格不仅反映了社会资源的供求状况,更主要反映了社会资源的稀缺程度。这样市场价格机制能够有效地传递人们所需要的信息,给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内在的激励与约束,使人们对变动的供求关系作出及时的反应,实现社会资源有效配置。同时,在指定价格的条件下,每个经济行为者能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但是,这只是完全信息、交易成本为零的完全市场运作的结果。在不完全市场中,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交易费用的出现都有可能排斥交易收益的充分利用,市场价格机制运作的无效率随处可能出现。例如,当我们考察一个有不同质量的产品相交易的市场时,交易者双方都按相同的方法对不同质量的产品进行分级,但只有卖主知道所销售的每单位商品的质量。买主最多只能觉察到以前销售商品的质量分布情况,而要识别商品的质量是成本昂贵的。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机制并不能有效地传递关于商品质量的信息,交易就可能中止。因为所销售商品没有质量保证,卖主为交易所提供的任何商品的价值都会低于其价格(阿克洛夫,1970)。

而且,人们是从物品或劳务的各种不同的特性中得到所需要的效用,或是从各种不同活动的成果中得到所需要的效用。也就是说,我们用五元钱购买2斤桔子,并不在于我们用五元换2斤桔子的交易本身,而在

于我们对桔子的消费,而消费带给我们效用的是喝的桔汁量、它含有维生素C的份量以及它味道。同样地,当我买一辆汽车时,我得到的是特定的颜色、加速马力、车型、内部设计、耗油情况等,即使我只购买一辆车。当我要招聘一教师时,所聘的不只是他的教学与研究的量与质,也包括他其他各方面的表现。可见,我们所交易所获得的价值乃是不同特性混在一起所构成之物品或劳务的价值。而衡量这些特性是要耗费成本的,而且界定和衡量受转移的权利还要耗费额外的成本(诺斯,1990)。也就是说,商品、劳务与任何人的表现都有许多不同的特性,这些特性的状况在每一件物品或每一人都是不同。由于衡量这些特性状况是要花费许多成本的,以致于这些成本不能清楚或完全准确地度量。即使所有进行交易的个人都有相同的目标函数,仍然有交易成本发生于获取必要的信息以了解每一交易物品或劳务的特性状况与买者或卖者的位置等情况。不过,实际上人与人之间信息是不对称的,例如卖二手车的人比买车的人更要知道其车的价值特性。还有,不仅在交易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对称信息,而且追求个人财富最大化的当事人还会尽量地把信息隐蔽起来而坐享其利。可见,一方面,由于完全地衡量出物品或劳务有价值的特性要花费成本,所以一直存在获得财富的机会,每一人又希望寻找和把握这种获利机会实现自己效用最大化。另一方面,度量物品或劳务有价值的特性要花费度量成本与信息成本,而信息的不完全性又给人们的交易带来了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为了通过交易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又减少在交易过程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人们就创立了不同的合约安排。市场合约也就出现了。

这些不同的市场合约安排不仅在于交易双方一种承诺,在于规划未来的交易当事



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而更为重要的是促进当事人之间的交易。由于物品或劳务的特性度量要花费成本而导致其度量的不完全性,这也就存在许多人们获利的机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这些获利机会如何分享,当然有许多方式。但是最好的方式通过合约安排来划定行为规则与权利的结构以及履行的性质,从而界定现有的或潜在的追求财富的机会,这样就可以透过经济的交换来实现人们的利益的追求。一般来说,交换涉及在既定合约安排下进行,但是当人们发现改变现有的合约安排可以增加自己的获利机会时,他们就会投资去改变现有的合约安排,重建权利结构,促使更大规模的交易。当出现利益多样化,则简单多数决策难以达成时,而人们就可能创新促成复杂之交换形式的合约安排。可见,市场合约安排最基本的意蕴是促成当事人之间的经济交换。尽管市场合约安排并不是促成全部经济交易唯一的方式,但是它至少是促成现代市场经济交换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方式。

而且,合约安排促成市场交易可能希望尽可能精确地在规定交易过程中所包括的有价值的属性。如果当事人之间对所要进行交易的物品或劳务能够精确的测定,那么当事人就能够清晰地规定合约安排所包含的内容,当事人就能知道合约何时被履行或何时被另一方或一方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合约的实施和履行是充分的,交易也能够顺利进行。如果一方违反合约,并且另一方的损害能被准确测定,那么法院或一些其他部分的强制机制就能简单地按损失的数量和诉讼费用判定给予受害者以赔偿。这样也就促成了交易的顺利进行,减少当事人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如果所要进行交易的物品或劳务特性的价值不能够度量,或者度量是困难的,那么当事人双方都可能采取欺骗、偷懒等有利于自己而不利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样不仅会产生租值消散或浪费资源,而且会增加交易的障碍,使交易难以进行,甚至导致交易的破裂(诺斯,1994)。但是,由于当事人的交易活动都是处于各自的局限交易条件下,他们要

签订一份完全的市场交易合约是不可能的。交易当事人只能签订适应于他们交易条件的具体合约,因此,为了减少交易费用,各种各样的市场合约安排应运而生。在此我们仅是考察市场中度量商品质量的合约运作,以便揭示这些市场合约安排是如何减少交易费用,促进市场交易顺利完成的。

在市场交易中,人们只有意识到他所获得的比他所付出的价值更多时交易才能顺利进行,否则交易不会发生。然而,人们如何来确定他所获得的和他所付出的多少呢?关于这点,只有在对所交易商品的质量进行度量与比较情况下才得以实现。但是,在实现的交易过程中,有些商品的质量容易度量,而另一些商品的质量度量就比较困难,要度量之成本是昂贵的。如果交易的商品是容易度量的,而且度量是不需要成本的,那么在商品交易时,人们就能够毫不费力地识别之,人们之间的交易也就能顺利进行,那么对商品的质量保证也就没有必要了。如果交易的商品质量度量是比较困难的,这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及度量商品的错误性,而且知情者一方会通过商品质量的非均一性从中渔利。因此,如何减少度量商品的交易成本或减少度量商品成本潜在错误性,如何减少交易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人们就会通过不同的合约安排方式对交易附加质量保证条款(巴泽尔,1982)。

在新古典经济模型中,由于所销售商品的信息(即关于每单位商品质量和名义量中所包含的实际量的信息)是可以免费获得的,因此等值商品会以等价出售。这样,卖者可以确保自己没有付出太多,买者也可以确保自己没有获得太少。但是,在现实的交易活动中,产品信息是有成本的,这也意味着交易当事人出于对商品度量成本的考虑,他们对所购或所卖商品质量的度量就不一定是在等值商品以等价出售的均衡点上。这既给卖者留下了获利的空间,又为卖者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卖者对买者挑选商品的限制是有利可图的。

现在假设交易过程中有众多的卖者,而所销售的商品是同质的,卖者与买者度量商



品质量的成本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卖者会尽可能巧妙地对所销售商品的质量进行度量,以防止买者对商品进行度量。对于买者来说,如果在给定的价格下所提供的商品的质量变化很少,他就会放弃对商品质量的度量,购买他在这估价水平上的商品。因此,作为一种格式化合约安排——商标出现了。商标作为一种格式化合约安排保证了所销售商品的质量,因为任何违反商标所承诺质量出售某种劣质产品,则整个商标的信誉就必遭到损害。买者如果在未来的购买过程中可能遇到标明该商标的商品,他就更可能会对卖者进行严厉的惩罚,从而也就不必担心会受骗上当。另一方面,商标作为一种格式化合约安排提高了买者对商品质量的识别性,减少了买者对商品度量的成本。因为卖者往往会根据质量变化的损益点对商品进行分类,这样对每项商品质量的度量只要度量一次即可。而买者在这种情况下对商品质量进行度量时,每项商品至少要度量一次以上。例如,“一个罐头商如果在每个季节改变豌豆的质量(如大小、鲜嫩度等),买者在每个季节就要做一次代价昂贵的检查。但另一方面,如果罐头商能保持严格的质量控制,那么买者需要做检查就要少得多。”

(希汉,1973)而且商标具有“标准”的意思。买者购买某一商标的产品,也就是购买同一规格质量的单位产品。如果某一商标的产品度量的维度越少,那么其商标的意义越大,其度量的费用就越低。由此可见,当商品的质量发生变化或没有质量保证,对商品度量困难,而度量成本买者与卖者相同时,用商标作为一种格式化合约安排是减少交易费用促使交易顺利进行的有效方式。

现在我们假设在交易过程中有众多的卖者,所销售商品为异质的,卖者与买者对商品质量的度量成本非均一性。在这里,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买者的度量成本高于卖者的度量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有一个卖者,那么卖者就会降低产品的质量水平,这一水平正好等于阻止买者自己进行度量为止。其结果是,当买者度量商品质量的成本上升时,他们所获得净效用下降。

但是由于卖者之间的竞争,买者可能通过产品质量保证单的合约安排使效用恢复到原来水平。如果卖者的度量成本高于买者的度量成本,或度量成本随商品的使用而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商品的度量留待买者在消费过程中进行,这就会大量节约度量商品质量的成本。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来保证买者购买的不是一种劣质商品呢?如果购买的是一种劣质商品卖者用什么方式来补偿呢?也就是卖者以何种方式使买者放心地购买其商品呢?产品质量保证单就是买卖双方就所销售商品附有具体质量保证的一种合约安排。这种产品质量保证单本质上承诺以现价提供一种优质商品。这样,这种产品质量保证单就能减少了买者所付价与得到商品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减少了买者可能出现的劣质产品的风险以及度量商品质量的成本。另一方面,一个对产品提供质量保证的卖者,不仅可以预先提取商品的保修费用来提高商品的价格,而且可以通过预先提取买者度量商品的成本来增加利润。可以说,许多耐用性商品的交易都是通过这种合约安排来完成的(巴泽尔,1982)。

而且,一些专业性很强,监督度量成本很高的行业资格准入制度,其实也是一种减少度量成本格式化合约安排。例如,在医生、律师、会计师等专业性十分强的行业,由于一个专业人员对所提供的服务进行度量的成本往往要大大低于服务对象对其服务所进行度量的成本。既然服务对象对其所受服务的度量成本大大高于专业人员度量成本,那么由专业人员而不是由服务对象对服务进行度量要节约度量成本。但是,如何才能使服务对象不花费资源对服务质量进行度量而又识别服务质量的高低交易得以进行呢?于是,这些行业采取严格的资格准入制度。这种格式化合约安排,既使其专业人员质量严格均一,又减少了交易费用。

分成合约是市场交易中的另一种合约安排。它是指两人以上的交易者为了某一相互同意的产出而把自己的所占有的生产要素组合在一起,然后合约当事人按照他们

所投入的生产要素来约定一个共同接受的报酬率,以此来分享的实际的产出。对于交易中的分成合约,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合约安排,因为劳动者所得的小于边际产出(科斯,1991)。但是,人们要问分成合约既然是一种低效率的合约安排为何能如此盛行并经久不衰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无论是农业,还是在零售业、美容院、加油站等,分成合约在交易活动中是一种普遍的合约安排,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五常与施蒂格利兹的研究表明,在交易费用为正的世界里,分成合约在市场交易中是一种既可以用来分担风险,又可以用来提供激励的合约安排(施蒂格利兹,1974)。我们可以以著作者与出版者之间的版权合约为例来分析。在这样的合约安排中,一般规定著作者按图书的销售情况来获得其收益。但是,在签订这样的版权合约时,书籍的销售情况如何,收益大小都是不确定的,因此,著作者的报酬也是不确定的。由于著作者与出版者的收益分成比例是在书籍销售前已经确定的,而他们的实际收益取决于书出版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由于事前很难预测到书出版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要想在事前确定一次性稿酬支付是困难的。如果出版者出的是竞争性一次性稿酬支付,那么出版者就必须对未来图书销售市场进行调查与研究,并根据其结果进行决策。如果出版者为了降低成本而只花少量的钱进行市场调查与研究,那么他们的报价很可能受到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出版者竞争报价成功,也会因为开价过高而增加其实际成本。因此,在分成合约安排下,出版者的市场调查与研究是没有必要了,而且他们的决策错误也会限制在版税的分成比例上(巴泽尔,1977)。这样,自然节约了交易费用,分成合约在其相应的局限条件下就是一种有效的合约安排。

总之,在以往的经济理论中,由于不存在交易费用,市场运作是完全的,合约也是简单的、完全的及理所当然的。合约所涉及的交易是当时瞬间的单一产品。但是,在正

交易费用的世界中,由于物品的物理特性或交换的产权特性、多样性以及时间的广延性与空间的广泛性,为了减少交易费用,人们总是会在相应的局限条件下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可以说,不同的合约安排就是人们在不同的交易条件下为了减少交易费用而选择的结果。合约安排为市场交易提供了有效的选择。不过,合约安排不仅为交易提供明确的架构,而且可以从中得出组织形成的实证资料,也可以提供线索以探讨交易双方用何种方法组成更复杂的组织形式。也就是说,合约安排将反映出促成交易的各种不同方法,不论是透过企业、连锁店或其他更复杂的合约安排。

#### 参考文献:

1、Douglass C. North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orge A. Akerlof.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ative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 (3), P. 488 - 500.

2、Spence, A. M. (1973). *Market Signalling: Information Transfer in Hiring and Related Proc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3、诺斯:《交易成本、制度和经济史》,《经济译文》1994年第2期。

4、Barzel, Y. (1982). *Measurement Cost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Marke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5. P27 - 48.

5、Sheehan, S. (1973). *Pacs*,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17.

6、科斯等人:《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7、Stiglitz, J. E. (1974). *Incentives and Risk Sharing in Sharecropp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April P. 219 - 55.

8、Barzel, Y. (1977).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n Information Cos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 P291.

作者易宪容,中国人民大学工商学院经济学博士后(100000)

责任编辑:谭湛明

# 世纪之交精神文明发展战略研究

梁世红 杨松

## 一、当代国际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趋势

世界各国为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逐步认同和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不仅把精神文明看作是教育、科技的进步,更重要的是着力培养人的全面知识结构,促使人在认识、情操、意志和审美等方面健康地发展。

### (一)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是世界各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为了抢占科技这一国际竞争制高点,一些国家和地区对科技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它们争先恐后地调整科技发展战略,成立专门科技管理机构。

1993年11月,美国成立国家科技委员会,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担任主席。美国政府发表的第一项科技政策声明,表示将力求使政府和工业界非军事科学研究项目的总开支由原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增加到3%。欧洲联盟通过了“第4个科研发展框架计划”,并召开欧洲科技代表大会,制订欧共体的科技发展政策。日本政府提出“新技术立国”方针,把科研与开发费增加1倍。加拿大宣布对未来科技发展战略进行全国性审议。韩国实施“2000年生物技术计划”,投资229亿美元以加强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力。

走向信息时代,高科技同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集教学、科研、生产三者协调发展的美国“斯坦福——硅谷”科学工业园,分布着3000多家高科技产业和许多科研机构,其中最大的是具有3500多人的斯坦福研究所。它以科研力量雄厚的大学为中心,以高科技产业群为基础形成科技基地,既出人才,又出技术、出产品,大大缩短了反映高新技术发展的知识信息从创造加工到传播的应用周期。世界各国竞相借鉴美国科技园模式,日本建立了筑波科学城等20多个科学工业园区。英国建立了剑桥工业园

等20多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法国、比利时、爱尔兰、以色列、韩国等也都开始建立由大学、科研机构 and 产业部门共同参与的形式多样的科技工业园。各国政府出于经济和科技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竞相增加对教育的投资,超前规划教育的发展。以美国为例,自1879年以来,美国大学人数每20年翻一番;自1960年到1970年,10年间翻了三番,获硕士学位或具同等水平增加了2.4倍。适龄青年入大学比例,1955年为27%,1965年为40%,此后总趋势一直上升。有学者预测,到2000年,美国将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知识社会。

为了适应社会对教育发展的新要求,战后世界各国的教育政策层出不穷,先后出现了“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回归教育”、“更新教育”等多种形式。各国全面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转变教育观念,制定新的教育政策,发展系统化的教育。现代教育采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使教学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化的教育、光学投影设备、电声录音设备、电视录像设备等,已普遍运用于教学。电子计算机进入教学领域,开创了电化教育的新时代。现在许多国家通过电视系统举办各种专业电视教学节目。社会学习中心、家庭学习中心已很普遍,广播大学、电视大学发展很快。多频道的家用电视系统,同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终端相连,使教育迅速普及到家庭,扩大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

许多国家已认识到: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尤其是在未来21世纪,人才资源作为一种能动的特殊的资源,是一切经济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代表着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未来世界经济的方向,而从事人才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教育,则成为决定未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产业。基于此见,许多国家和地区,不管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领导人都站在时代发展高度,充分认识发展教育产业

和培养人才对于现代经济增长和各国综合国力增强的战略意义,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 (二)重视道德精神的养成

培育道德精神,是许多国家的共识。在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对中小学生的道德精神教育。70年代以来,美国明确提出要把学生培养成为“责任公民”,使之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义务感,具有爱国精神,成为对国家、对政府尽义务的公民。美国的大中学校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较规范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格局。①普遍开设了德育、历史、公民学类课程,把培养“责任公民”放在学校教育的突出地位。②设立专门辅导机构,对学生日常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进行引导,对学生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进行咨询、指导与帮助。③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对青少年形式生动多样的教育,有力促成了人文素质的提高。④注意通过公共环境进行人文精神教育。美国非常注重建设一个美国主义的宏观情景,使置身其间的人潜移默化地受到美国价值观念的影响,根据美国生活方式来生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像美国国会大厦、白宫、华盛顿纪念塔、林肯纪念堂、杰佛逊纪念堂、国会图书馆、航空航天博物馆等场馆集中表现了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天天宣扬着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美国向国民包括大学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基地和生动教材。公共环境成了无所不在“泛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本,加强道德教育是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日本鉴于青少年道德水平下降、犯罪率日增的情况,下决心以“德、智、体”为次序来实践培养目标。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在其发表的教育改造公报中指出:“能否培养出道德、情操、创造力方面都足以承担21世纪的日本的年轻一代,将决定未来的命运,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学校的道德教育”。日本在其规划的《21世纪的教育目标》中明确指出:“只有重视思想素养的培养,才能保证人才的健康成长。”针对青少年道德意识差的情况,日本文部省从1980年起实行《学习指导纲要》,其中加强了有关公民道德的科目和内容。日本还专门拨款用于改善和加强德育工作,各个学校的德育与其它学科有相同的地位。各校开设道德必修课,培养学生“道德实践力”。日本把道德教育重点放在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判断能力、思考能力和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上,并倡导家庭、社会、个人和学校一起进行综合道德教育。日本注重心理咨询,培养健全人格。1953年东京大学就建立了日本高校第一个心理咨询机构,到1992年上半年,日本已有78%的大学建立了心理咨询机构。咨询内容包括性格问题、情绪问题、学习问题、就业以及其它(包括异性问题、友人关系、实践人生等)。此外还开展以人格形成为目的的课外教育活动。

在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基本国策,由总理公署统一领导和协调。新加坡国会提出并通过为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的国人都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意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使之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共同目标。

新加坡把道德建设放在显要位置,协同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完成道德教育任务。学校把道德教育同学生的道德实践结合起来,组织学生打扫卫生,参与社会开展的各种文明礼貌活动。新加坡把社会当做道德教育的大课堂,要求各种大众传媒倡新风、贬恶行,不断净化社会风尚;同时还要求官员率先垂范,教师为人师表、家长身体力行,成年人为孩子树立榜样。他们把个人道德修养看做整个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基础,又把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看成个人道德进步的环境,两者互为促进。新加坡将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转化为规章制度的法律条文,变为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政府经常利用“国小”、“资源短缺”、“生存和发展困难”等危机感教育人民,要求每个公民都与国家共存亡,把个人得失同国家存亡紧密联系起来,把建设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文明的行为规范同个人利害得失联系起来,让每一个人懂得并在实践中履行这样的信条:你要获得社会和别人对你的尊重,你必须尊重别人;要使自己不受损害,你必须不损害社会 and 他人;你要对社会和别人尽职尽责,你才能获得社会赋予你的权力和满足。新加坡完备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为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市场经济条件决定了外国道德观念的产生、取向和实质,同时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的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等道德原则由于顺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对于市场经济的稳定和正常发展亦发挥独特的社会功能。①整合功能。道德与市场经济的相互



适应延伸到社会结构中,形成了西方较为完善的市民社会形态。作为社会主体的每个人都认同这种社会形态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也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对市民社会的认同感,使西方社会表面上是一盘散沙,但本质上却是一个整体。②)协调功能。道德的协调功能是内在的,通过对人的行为的内在引导和调适以实现个人对他人的自我调节,使个人的行为与社会保持一致。③)沟通功能。道德以沟通的方式,加强人与人之间道德的同质性,以保障社会的稳定。④)教化功能。道德在西方社会是个体性的,但它为社会大多数人接受后,客观上具备了社会性,反过来对人起着培育或强化作用,进入这一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会在主动或被动的教化推动下接受这种社会化的道德准则。

### ③) 培育道德精神的机制

对各国道德精神发挥着内在教化影响的机制性力量主要是:宗教、教育、传媒和社团。

宗教是西方社会中对道德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西方传统道德就是基督教道德。宗教对西方道德的决定作用表现为它把人类现世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虚化为上帝的旨意,上帝不仅要求人们对它有一定的道德义务,而且还把人世生活中的道德原则作为上帝的愿望而神圣化,人世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因而纳入了宗教教义,道德随之成为了宗教的附属品。

教育是西方道德控制机制的第二种重要方式。西方教育的直接宗旨是培育工业社会的后备力量,但在道德观念和道德习惯的培育方面,教育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独特作用。一是直接的道德教育;二是普通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产生的道德影响。从趋势上分析,随着道德保守主义思潮的复苏,教育的道德教化特性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大众传播媒介是西方道德控制机制的第三种因素。大众传媒是当代西方社会最普遍的沟通和观念交流工具,也是道德宣传的重要工具。大众传媒对道德的规范作用可以表述为:①)决定“公众道德”日程,如1996年2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和博泽尔环球公司联合进行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觉得,他们的国家已到达行为粗野的分水岭。接受调查的人认为,不文明是社会极度崩溃证据。90%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不文明促成美国暴力行为的增加;85%的调查对象认为,不文明分裂了美国社会;同样数量的调查对象认为,不文明

正在侵蚀诸如尊重他人等健康的价值观念。调查结果的公布,导致众多美国人呼吁向不文明行为宣战。②)影响道德舆论。传播媒介在报道新闻时,从道德角度评判是非,这就使公众在接受新闻的同时,接受其对新闻的道德评价。③)监督政治道德。绝大多数的政治腐败和丑闻、政府官员的渎职行为、滥用权力等都是由大众传媒首先揭露和曝光的。而这些揭露一旦见报就立即传播,形成巨大的道德压力,使某些官员轻则陷入困境,重则丢乌纱帽。大众传媒的监督作用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是举足轻重的。

家庭和社区是西方规范道德的第四种机制性手段。家庭和社区是西方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它们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家庭和社区在规范社会道德方面起着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家庭和社区规范着成员的道德观念取向,将社会道德传输给每一个成员,促使道德行为合乎社会要求;另一方面,家庭和社区道德本身是社会道德的一个有机部分,家庭和社区道德的控制和稳定决定着社会道德体系的基本态势。

从西方的道德规范和控制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第一,要使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核心目标之一的道德建设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必须形成一整套规范化和机制化的道德调控机制。第二,要重视“道德立法”,以“事先规范”为宗旨,以达到警戒和惩罚结合的目的。第三,要重视发挥大众传媒的“道德导向”功能。第四,要加强学校的“道德教化”功能,把重视道德观念的培养和提高与加强对个人道德行为的自我约束教育结合起来。第五,要加强社区建设,重视社区在维护社会道德规范方面的巨大作用。

## 二、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课题

既然精神文明建设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重视。中国更要着力促进两个文明平衡同步发展,形成一种新的文明趋势,其特点大致如下:

(一)精神文明建设的总目标:富强——民主——文明

经济上富强、政治上民主、精神上文明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总体走向。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在近十年、近百年间迂回曲折,大起大落,但历史的转机最终还是被中国人抓住。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借助于天时、地利、人和,改革开放的深



化,终于把中国推上了现代化起飞期、关键期的历史轨道。按照三步走的建国方略,中国将在21世纪前期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特别是中华民族富于融会东西,圆融无限,开拓创新的文化品格,一定会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富强、制度文明等有利条件汇聚一起,必将建成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精神文明的大国。

东西方的一些富裕国家在经历了经济发展、精神颓废的阵痛后,也逐步重视起群体文明、社会文明。位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对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随便攀摘花木,公共场所抽烟等不文明行为严加禁止。他们通过道德立法维持正常的道德规范,人人遵守,形成约束。明确提出大学生要做责任公民,并把道德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突出地位,强调青年要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义务感。重视思想素质的培养,保证人才健康的成长,这种文明意识的加强必将对21世纪的发展形成动力,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 (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体制:经济——政治——文化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正努力探索一种全方位的新体制,即以社会主义新型市场经济为基本点,逐步发展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新型政治体制和新型科技教育体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将实现同整个社会机体的三大层次的有机结合,确立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牢固支点,在社会机体的深层,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相结合;在社会机体的中层,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上层建筑相结合;在社会机体的表层,同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精神文明相结合。这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这个世界历史性难题。尤其是吸引国外资金,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显然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不大,但毕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新的因素,它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则更大一些。通过吸取国际上的资金技术和适合我国情况的管理经验,同时吸纳着人类文明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使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

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新创造,它超越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流行于东西方的教条主义公式。它超越了曾经统治中国社会两千年之久的农业自然经济——封建专制政治——封

建愚昧文化的封建主义模式。有助于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历史难题,也有助于解决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市场经济、现代民主法制、现代科学文化的结合方式。

特别是在文化层面,我们吸取了西方社会“物质文明发达,精神文明衰颓”的历史教训,挖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无限丰富的人文资源,匡正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匮乏。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五四”精神,直到指导新中国诞生的毛泽东思想,再到改革开放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均成为了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的思想文化成果。

### (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主体:内化——动态——创新

精神文明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层面,属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现代化,是解决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因而是一种内化于主体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物质载体,但是,无论其载体怎样多,精神文明的内容都必须内化为人自身的素质。

整个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发展的、动态的事业,因此,人的现代化建设也只能在动态中、发展中进行。人自身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高度与程度也应当随着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变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是循序渐进,尤其是人的精神品格的塑造和创新,需要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来实现。

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有一个重要区别,即物质文明建设在很多场合可以一次完成,完成后有些可以长期不变,甚至一劳永逸,除非出现天灾人祸,很少出现逆转。而人是活生生的生命体,具有可塑性,可变动性,人自身的建设具有可逆转性,因而也具有创新性。企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搞一劳永逸,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

在人的主体性问题上,由于西方近代社会是以个人定位,自我中心和外在征服型为其核心,这是近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高度发达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动力,又是20世纪中后期逐渐暴露的全球问题,是人类困境的思想和文化根源。所谓生存危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危机,是人的现代化的危机,这是西方社会文明建设的败笔之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文化思想主流则贯穿着古代社会比较偏重于内在超越性的道德自

律主体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为主体性,这代表了一种迥然不同于西方近现代思想的新型的主体性观念。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的文明将给 21 世纪新型文明带来福音。

#### 四)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价值:和谐——富裕——发展

东西方由于地域、民族、文化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价值观体系,但是,由于整个世界经济趋向的一体化,封闭、自恃的思想、观念及价值观体系也在逐步地消融、化解,相互渗透、贯通。这在东南亚国家表现得十分突出。

认真吸取中国文化中“和为贵”的和谐价值观,同时也吸取西方现代化进程造成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的深刻历史教训,亚洲的“四小龙”大致形成了一种和谐——富裕——发展的新型价值观体系。他们重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开展各种社会文明活动,在人与自然的联动关系中,更加注意天人和諧,以寻求天人合一,持续发展;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更加注重人际和谐,寻求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在国与地区的相互关系上,更加注重和谐相处,寻求共同富裕。

和谐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意在强调矛盾共同体诸方面的对立统一,协调一致,共同发展,在中国广东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谋求和谐、富裕、发展的新型价值观已形成共识。正因如此,救助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使男女老少慷慨解囊,连细小伶童也知省下雪糕钱。救助残疾人的福利奖券购买不绝,举办不止,几乎没有谁是为了捞大奖、发大财,更多的人以此献爱心、做善事。这种谋求普遍和谐,共同富裕、不断发展的新型价值观,将为 21 世纪人类价值理性提供新的思想资源,有助于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新旧价值观的冲撞及其

深刻矛盾,有助于整个人类的进步。

#### 五)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景观:乡村——城市——一体

在国内外的发达地区农村与城市的差别在逐渐缩小,乡村——城市——一体化已成为现实,农村以乡镇企业为载体,广泛发展城乡交往,建设与大中城市衔接的城镇体系,是中国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开始的新变化。广大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非农化转移,从职业转移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居住地的改变。在中国的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在鱼米之乡的苏南一带,农民已基本住上了新楼房或小楼式集体商品房,各村实现了水、电通畅供应,普及了液化气灶。渡假村、迎宾园、商务中心等新式建筑更成为村庄现代化的醒目标志。虽然户籍制度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城乡的实际界限已渐消失,城乡差别日益缩小。如果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6—57 页)那么,今日城市和乡村日渐成为一体,城乡差别逐渐消失,城市这所大学对农民的教育与引导,促使他们逐渐向现代农民转化。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社会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变迁,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巨变。发达国家这一方面起步较早,占 10% 的农村人口、除了工作环境,与城市人口已无大的不同。

这一变化不仅体现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且必然形成在全社会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日益紧密地结合成有机的整体,共同推动社会前进。

作者梁世红、杨松,暨南大学副教授  
(510632)

责任编辑:冯 生

# 学习邓小平理论 推进广东精神文明建设

□冯达才 冯永宁 陈家义

邓小平理论是我国一切工作的旗帜、方向和力量。邓小平的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加强对邓小平精神文明理论的学习和深入研究,结合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进一步开创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局面,是世纪之交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方向和力量源泉。

## 一、着力把握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核心和特征

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严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科学体系。我们从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大量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就是:要以人为本,以提高全体人民的综合素质为主要任务,在社会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主导地位,使全国各族人民真正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是我国文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

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因此,我们抓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始终不渝地抓住这个核心和根本,在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上全面规划,狠抓落实,真正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决心打一场“攻坚战”和“持久战”,反对形式主义,反对简单化、庸俗化。这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和着力点。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科学、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鲜明特征。

### 1. 指导思想的时代性

邓小平所以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到国家的兴衰存亡、社会主义的生存发展的高度认识,是因为立足于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的形势,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严峻局面,以及全国人民迅速摆脱贫困,奔向小康,提出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因此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客观地反映了时代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实践证明,贫穷就会挨打,愚昧也会挨打,科技文化落后更会挨打,这是当今时代的一个严峻现实。时代要求我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搞好。

### 2. 内容的整体性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受制约和影响的因素甚多,除了经济发展的条件之外,还受人们的素质基础、传统习俗、观念意识,以及科学文化发展

水平等多种因素所影响。因此,在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必须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行整体规划,整体建设,综合治理,综合开发,标本兼治,才能达到目的。没有整体规划和采取不切实际的措施,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自为政,互相别肋,是很难取得成功的。邓小平提出建设“四有”新人,就在内容上强调了人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组织纪律、体育艺术等等各方面素质的整体发展。离开这一特点而去盲目追求某些形式方面的突出发展,是很难实现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目标的。

### 3. 要求的坚定性

邓小平对精神文明建设一贯采取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态度,不仅在讲话时反复强调,而且在实践中也从不手软。例如,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曾经发生过多次一手硬、一手软的全国性失误,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泛滥,都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出来纠正,才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得以健康向前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手都要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的严格要求,正是他对精神文明建设坚定性的反映。邓小平还严肃地警告人们:“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2页)这要引起我们,特别是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 4. 方法的灵活性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固定的模式,它要求人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创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都有各自的不同特点,不能生搬硬套。因此,形式的多样性和方法的灵活性,这是它的一个鲜明特点。为了要使精神文明建设取得良好的效果,我们必须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青年人与成年人,知识界与劳工界,男士与妇女,少年与老年等等不同的人群,由于心理特点的不同,知识基础的不同和身体素质的不同,要办成同一件事情,就要采取各自不同的方法。所谓“一人一锁”,“万佛千样”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对传统文明的继承和外国文明的吸纳,同样也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

## 二、清醒认识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势和弱势

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比较重视抓精神文明建设,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 1. 观念更新的超前优势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中央政府不仅在经济上给予广东许多优惠政策,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也给予大力支持,放手让广东大胆探索,提倡解放思想,观念更新。因此,人们在思想观念上,逐步建立起一系列超前意识,这对推动广东的改革开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人们市场意识的加强,竞争意识的树立,敢为先意识的倡导,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效益意识、平等意识等等思想意识的逐步形成,从而建立起广东意识超前优势,使人们在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步适应了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形势。目前广东人在工作上比较追求效率和效益,人际关系比较讲究互利、平等和沟通,生活方式比较注重新潮、时尚、优雅和质量等等,都是观念更新带来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观念更新的伟大号召,在广东得到较好的落实。

### 2. 改革开放的敢闯优势

在观念更新的推动下,广东的改革开放也走在人们的前面。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和股份经济的建立和蓬勃发展;金融市场、人才市场、房地产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和生活物资市场的全面开放,更使广东的物资流通、货币流通、人力资源流通,以至资产流通,都完全通过市场来完成,从而克服了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各种人为束缚,发挥它们优化组合最大效益的作用。这是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最有效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 3. 全面建设的整体优势

广东的精神文明建设,从起步开始,就比较注意全面建设和发展,做到硬件、软件同时抓,教育、科学、文化、艺术、体育全面建

设,德育、智育、美育、体育全面要求,从而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的要求。目前,广东省、市、地各级的城市建设,比较注意城市的整体规划,注意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整体平衡。文化设施普遍提到议事日程。学校分布逐步趋于合理。大型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剧场等,在一些中等城市也可以看到。群众文化活动和体育活动已逐步普及到大专院校、社区街道、村镇居民,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大专院校的校园文化声誉省外,高雅艺术已逐步受人们所向往和追求。岭南文化的重新焕发,并与高科技时代的新思潮相映交融,这是广东新文化兴起的一大特色。

#### 4. 素质提高的综合优势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思想意识的时代化,人们的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和科技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并产生出综合优势的效果。目前不少广东人(包括在广东工作的外省人)已经不满足于职业的单一化和生活方式的凝固化,而是追求专业的多元化、生活的多样化;就业选择要能发挥自我潜能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盲目的追崇,而是进行有分析的继承、吸纳和创新。广东域外旅游业的兴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心理上的一种新的追求;文化娱乐场所的兴旺发达,也是人们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一种强烈需要。人们个性思维的成熟,适应市场经济能力的提高,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增强,以及理念追求的多元化和现实化,应该是人们综合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

#### 5. 典型指导的实践优势

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特色,就是对先进典型的培养和推广。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基本上都树立起自己的先进典型。通过典型引路,做到学有榜样,追有目标。互相促进,这是使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得以深入持久向前发展的成功经验。广州南华西街长盛不衰的典型,在于永不自满,年年创新,对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南海市创建文明村户镇的经验,

很快被推广到机关、学校、商店、街道,使创建文明活动普及到全市、全省的各个角落。中山市花园城市经验和顺德市股份制经验的推广,以及最近广州市委机关开展“做人民满意公仆”活动的普及等等,都带有典型引路的性质,对全省精神文明建设都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广东精神文明建设也存在明显的弱势和劣势,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根据我们调查研究和观察认为,目前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弱势,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整体发展的不平衡

这里包括硬件与软件发展的不平衡;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点面结合发展的不平衡。其中建设与需求的不平衡,已经逐步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目前由于精神文明建设在软件建设方面(主要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各项素质建设)跟不上,在农村建设方面跟不上,在青少年建设方面跟不上,在社会综合治理方面跟不上,使社会上仍存在不少不文明的死角,藏秽纳污、罪恶丛生之地还大量存在。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屡禁不止,最近还有重新回潮趋势,从而使某些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信心不足,更多的人存有畏难情绪和观望态度,参与的积极性有所减弱。特别在义利之间发生矛盾时,重利轻义、重私忘公已成为某些人价值取向的一种普遍趋向。一些地方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淡薄;人际关系庸俗化、商品化比较严重;社会的腐败现象,特别是有的干部和公务员的腐败现象仍未得到有效地克服等。这些精神文明弱势的存在,已大大抵消了强势的正面影响力,使广东的精神文明建设长期徘徊在低层次水平,没有较大的突破,这有待进一步的改善。

#### 2. 执法力度不足,治理强度不够

精神文明建设是人类本身的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自我治理、自我完善的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的主体作用始终处于决定性的地位。开发自我,提高自我的文明素



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课题。但是,人们的一切自我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必须在外力的推动和激励下才能完成。所以外力的作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也是不可缺少的。目前精神文明建设的威力,除了行政、舆论、道德等约束力之外,还应该借助法治的力量。为精神文明建设立法已是急不可缓的事情了。用法律规范人们的精神文明行为,加强执法力度和治理力度来促使这些行为的实现,这应该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课题。广东在精神文明建设的立法上不仅跟不上,在执法力度上也是个薄弱环节。从而使精神文明建设在某些方面基本上处于“无法无天”的自流状态。例如:许多地方都张贴着“禁止吸烟”、“不准随地吐痰、不准乱丢果皮”等告示,可是,执行者甚少,监督者、制止者更少。又如在货物交易中,欺诈勒索,以劣充好,缺斤短两,坑害顾客等等不道德行为屡见不鲜,也是因为缺少强有力的执法监督而造成的结果。因此,通过加强法制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这是精神文明建设有效措施之一。

### 3. 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还未完全硬起来

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不平衡,来源于各级领导两手抓的不平衡。一手硬一手软在某些单位和地区仍然存在。目前有的领导还认为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属于软指标,好坏难有准确指标来检查,放松点没关系,早抓迟抓无所谓,缺少真干、实干、硬干、猛干的精神。有的地区甚至放弃领导,不抓精神文明建设。目前比较多的领导是畏难情绪严重,采取措施不力,许多工作硬不起来,从而直接影响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落实。

## 三、世纪之交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着力点和新思路

世纪之交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特点,是面临更加紧迫的形势和更加繁重的任务。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世纪之交科学技术更加迅猛发展,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剧

烈,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加速发展,世界之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影响、互相激荡更加频繁和不可避免。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要求更加日益增长而期望甚高。因此,面临这种新的形势,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民族振兴的大事。我们应该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在措施上应该要有更加得力和有效的办法。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这清晰地告诉我们,国人的素质问题和人才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根本问题,说到底核心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问题。世纪之交的科技竞争,国家实力之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一般来说,那个国家、那个部门、那个企业拥有高素质的核心高精尖人才,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就有获得胜利的把握。所以,世纪之交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着力点,应该放在全体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跨世纪人才的培养和开发使用。

1. 教育是素质提高和人才成长的核心基础,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基础工程。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切实核心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核心战略地位。”所以,大办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待遇等,都是世纪之交急需妥善解决的核心重大课题。

2. 智力素质和核心非智力素质的同时塑造和开发,是国民素质提高和人才培养的核心根本方向。目前我国的教育工作,各类学校都比较重视智力素质的提高,而忽视核心非智力素质的培养,特别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从而使培养出来的人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思想不牢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观念薄弱,理想、道德、纪律、意志等缺乏坚定性。这都直接影响核心人才素质的提高,影响人才竞争的核心实力。十五大报告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核心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根本。”这是完全正确和富有远见的,这应该是我国提

高人的素质的根本方向。

3. 营造良好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是提高人们素质,加速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条件。繁荣社会的科学文化艺术,大力发展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事业,让人们普遍得到健康向上,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文化生活薰染和引导,得到正确的舆论指导,得到多姿多彩的文明成果的启迪。要有力地打击各种庸俗低劣、暴力色情、心态扭曲的流氓文化对社会的污染,特别是对青少年的诱惑和腐蚀。

4. 建立人才迅速成长和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增长机制和开发机制,是人的素质提高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保证。当今人才的竞争是整体人才实力的竞争。对单个人才来说,不仅应该是专才,而且更重要的是通才,即既能进行技术创造,又可以实施经营和管理,既有本专业知识,又有大科学、大经济知识,从而在信息万变、竞争剧烈的环境中应付自如,得心应手。对单位人才和部门人才来说,应该具有优化组合的整体优势,既有将才,又有帅才,既有猛将,又有军师,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高科技的超前人才,宏观经济的管理人才,企业集团的高层决策和管理人才等,都是当前人才竞争的争夺对象,更显得培养和使用的珍贵,因此,适应当今人才竞争的客观需要,建立有效的增长机制和开发机制是当务之急的大事。优胜劣汰,公平竞争;多向选择,破格使用;惜才如宝,爱才如玉;流动自如,奖罚分明,这应该是我们建立机制的努力方向。建立规范的人才市场,应该是人才公平竞争的最好场所,也是人才素质检验的有效场所。

怎样使精神文明建设跟上形势的需要,实行精神文明建设制度化、法制化是一个有效的途径,是依法治国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具体体现。早在1986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设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156页)把精神文明这个表面看来是“虚”的东西,用法律规范按照“实”的要求来管理,实行以法治乱,以法治

丑,以法治愚,以法治黄,以法育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

### 1. 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化的必要性

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曾经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这些道德原则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禁止杀人、强奸、抢劫以及人体伤害,调整两性关系;制止在合同契约的缔结与履行过程中欺诈与失信等等,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例子。”(参见《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页)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分需要法制建设的支持和配合以增强其力度和强度。因此,很有必要把一些重要的、必须强制推行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和公众利益的道德规范和要求,上升到法律规范的高度,纳入法律体系之中,以国家权威保证实施。为此,应该根据精神文明建设的广泛内容,进行分门别类,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定,通过法律加以强行实施。例如,在现有已经制定的《教育法》、《出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版权法》等等的基础上,是否可以制定《文化市场法》、《影视法》、《公共娱乐管理条例》、《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禁烟法》、《禁毒法》、《禁娼法》、《禁赌法》等等,从而使法律管治的覆盖面逐步扩大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用法律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 2. 道德规范法制化的可行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认识水平、道德水准参差不齐,自觉性比较低的情况下,要使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建设为全体人民所认同,除了依靠舆论,加强教育,提高素质之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部分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规范上升为法律。因为法律可以明确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且它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能够发挥

道德规范无法起到的作用。因此,实行强制性的管治,做到重奖先进,重罚违法者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仅仅依靠舆论监督、劝说鼓励等思想教育方式,在目前许多情况下已很难规范社会公众的行为,形成不了强大的社会压力和令人感化的社会氛围了,只有以法律为保障,建立在共同理想基础上的对法律的自觉认同和遵守,才能使社会生活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得以全面实现。因此,在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一定要充分突出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主要调节器的作用,任何缺乏法律保障的精神文明既不能持久,也很难深入发展的。为此,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要完善立法,使当前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更加明确,更具有强制性;同时要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使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原则更加普及,并潜移默化地日渐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不少国家的成功经验也证明,强化法治,健全法制,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样才能保障整个社会健康有序地运行和发展,人们才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 3. 强化执法力度的紧迫性

在健全法制的同时,必须加强执法力度,这是当务之急。因为目前我国的社会法律、法规已经制定很多了,但是全面贯彻落实的还很不够,知法犯法,执法违法者甚多,甚至不少党政领导和地方行政长官,以及公

务员队伍,知法犯法,从而使许多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得不到有效的全面实施。所以,只有充分发挥法律的普遍强制效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使各种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法律规范得以实施,从而有效地保障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治乱、治愚、治丑、治黄不放松。

目前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的执法力度,关键在于要有一支精神文明建设的执行队伍,具体制定执法程序和执法法规,做到有人执法,知道怎样执法。例如违反“门前三包”如何执法,违反“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如何执法等等,都要具体化、法制化。最近北京公安局已鲜明地负起文化市场管理的执法责任。凡发现有人传播、销售、制作、租赁各种色情、不雅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影碟、电影以及各种传播品的违法行为,一律捉拿归案,并严密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这对治理当前比较混乱的文化市场是一项有力的措施。例如我国著名的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城市张家港、大连市、三明市等,在精神文明建设的管理力度和执法力度方面,都有许多具体的有效措施和规定,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效仿的。我们相信,通过严厉整治和强化法制管理,配以积极的教育和引导,广东省的精神文明建设必定能跃上一个新台阶。社会主义的文明进步,也一定能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放出灿烂的异彩。

作者冯达才、陈家义,广东省社科联助理、教授(510050);冯永宁,广州市委党校教授(510070)

责任编辑:冯 生

# 广东精神文明建设中的

## 主要矛盾

了三个发展阶段和三种基本形态：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

现代文明是现代社会的根本文明形态，是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思想文化基础上的高级文明形态，其内容包括现代物质文明、现代制度文明和现代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新境界，它同样包括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社会主义社会文明这个大系统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从一般的和最终的意义上说，是主要矛盾；但是，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变化的，就世纪之交的广东精神文明建设而言，在社会文明这个矛盾系统的层面上，其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则是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

首先，这是广东社会文明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广东毗邻港澳，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因此，1979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让广东在改革开放方面先行一步。继创办经济特区之后，中央又批准把珠江三角洲划为经济开发区，实行优惠政策，并让广东继续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广东在不断改革和扩大开放中，抓住了机遇，充分发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迅速地发展了广东的经济，推动了物质文明的飞跃。

改革开放以前，广东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12%的速度递增，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个百分点。1980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45亿元，到了1996年，已发展到6000多亿元，短短的16年增长了23.5倍；1996年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占了全国的十分之一。

广东改革开放到今天，已基本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长期以来的贫穷状态向小康水平的转变。广东经济的迅速发展，物质文明的飞跃，为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如今，

□ 吴灿新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历程中，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广东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也不断显露出来。在世纪之交，广东精神文明建设只有认真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尤其要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并认真切实地加以解决，才有可能卓有成效地把精神文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台阶，为广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保证广东在下一个世纪率先实现现代化。

### 一、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

社会文明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过程。社会文明的发展迄今经历

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受制约的关键因素已不再是物质文明,而逐渐转向了制度文明。换一句话说,随着广东物质文明的迅速提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得以缓解之后,相对滞后发展的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的矛盾终于凸现了出来,成为广东加强世纪之交精神文明建设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之一。

其次,这是由制度文明在社会文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所决定。

制度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言的,它是人类改造社会的积极成果,反映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政治上层建筑的进步状态。制度文明,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文明,它主要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政治关系和政治形式的进步状态,表现的是人们改造社会政治方面的积极成果,其在现代的核心问题,是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二是法制文明,它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规范化、有序化、合理化的进步状态,反映国家治理社会的积极成果,现代法制文明的核心,是依法治国问题。

政治是相对于经济、文化而言,在这个意义上,经济领域的进步状态及其成果,主要表现为物质文明;文化领域的进步状态及其成果,主要表现为精神文明;而政治领域的进步状态及其成果,则主要表现为制度文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之间,政治处在中间地位,它既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又对经济起着最重要的反作用,并对文化发生巨大的影响,制约着文化的发展方向。而在制度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之间,制度文明也处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中介地位,不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要通过制度文明方能实现,而且由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直接紧密联系,使制度文明对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着直接的巨大影响。正如唯物辩证法的创立者所指出的:“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中介性是事物的重要属性。事物都是通过中介、中间环节而互相联系、互相过渡,以

至成为一个统一体的。因此,考察事物间的相互关系,不能忽视对中介的审视,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往往由于中介的障碍,阻隔或影响了事物之间相互作用。在这种时候,解决中介和对立事物一方的矛盾,就成了关键的环节。在社会文明这个系统中制度文明因其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性质,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物;因其组织社会生活、管理国家事务等功能,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介”。而广东物质文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制度文明发展相对滞后之际,解决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关系,疏通制度文明这一“中介”,就成为广东精神文明建设向前发展的关键一环。

最后,还是由制度文明对精神文明的巨大作用所规定。

制度文明对精神文明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主要表现为:第一,制度文明决定精神文明发展的方向。制度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政治文明,政治是经济最直接最集中的反映,体现着社会和国家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它直接制约着精神文明发展的方向,要求精神文明为其服务。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文化“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第二,制度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保证。制度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法制文明。法制文明通过法制和法治,保护和扶持一切有利于真善美发展的人和事,打击和限制一切不利于真善美发展的人和事,从而通过有力地存真去伪、扬善抑恶、护美荡丑,保障精神文明的顺利发展。第三,制度文明为精神文明进步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精神文明的进步,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物质基础,还要有良好的政治法制环境,这其中包括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民主的政治气氛、完善的政治体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规范有序的社会秩序、有充分保障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等,否则,精神文明建设必将步履艰难。



## 二、领导文明与群众文明的矛盾

从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在世纪之交,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是广东精神文明建设外系统中的主要矛盾,那么,领导文明与群众文明之间的矛盾,则是广东精神文明建设内系统中的主要矛盾。

首先,从广东乃至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来看。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就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所在,也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在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关系中,领导素质的提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领导素质的提高,则是直接通过领导精神文明建设(简称领导文明)来实现的。因此,领导文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当然,领导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内系统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这是与领导在社会活动和国家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直接相关。领导干部是社会生活和国家事务的领导者、决策者、组织者、管理者,在一定的意义上,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乃是决定的因素。领导文明的程度、领导素质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国家和社会的兴衰存亡,也直接影响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成败。当今,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面对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面对着广东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使命,领导素质的提高,领导文明建设成了至关重要的紧迫任务。

其次,从领导文明对群众文明的决定性影响来看。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担负着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

使命。领导干部的文明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而且直接影响着社会全体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准。因为第一,党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代表着人民群众实行“管治”,进行社会生活和国家事务的组织管理,他们作为领导阶层,其思想道德素质、其文化程度,代表和反映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素质状况和文明程度,也必将处于领导地位,从而也必然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精神面貌尤其是思想道德面貌。第二,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道德建设的基本规律是“身教重于言教”。马克思认为,人类对现实世界掌握的方式是多样的,而道德则是人类对现实世界掌握的特有方式之一,它以一种“实践——精神”的独特方式去把握现实世界。这种特有的把握现实世界的方式,使道德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强调履行、践行的重大价值。而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者,首先必须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者和表率。这样,精神文明建设才有可能顺利进行。中国古老的典籍《尚书》就指出,官德如风,民德如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那边倒,揭示了官德对民德的巨大示范效应。事实上,在道德建设上,人民群众总是以领导为榜样,即:“上有所好,民必好之;上有所恶,民必恶之”。因此,领导文明是提升群众文明的关键。故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建设物质文明关键在党,建设精神文明关键也在党。”“关键是党风建设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层次性,应当把广泛性的思想道德要求和先进性的思想道德要求结合起来。党的领导干部,是先进性的思想道德的载体,正如决议所说:“越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越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人民群众逐步从广泛性走向先进性,否则,把领导干部的要求和水平降到一般群众的要求和水平,甚至滑落到一般群众的要求和水平之下,不仅无法实现广

泛性和先进性的结合,也无法引导广泛性向先进性提升,从而也无法推动领导文明和群众文明的共同前进。

最后,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为一方面,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一般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生活中来,对精神文明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以及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国外的文化精神垃圾也会吹进来并传播开去,也给精神文明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这些负面影响,首当其冲是领导干部。事实上改革开放十多年来,随着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示出来,随着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道德的滋长蔓延,我们的领导干部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思想道德素质低下者、理想信念动摇者,经不起这些腐朽思想道德的侵蚀,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丧失了领导干部应有的人格、良知和党性,有的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这些害群之马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他们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向前发展。

因此,在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领导文明和群众文明的矛盾也必然凸现出来,变成主要矛盾;而领导文明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紧紧抓住领导文明建设这一主要的矛盾方面,切实抓好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提高这一切入点,才能真正有效地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将精神文明建设顺利推向前进。

### 三、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地位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内系统中,如果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角度来说,领导文明和群众文明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如果从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角度来说,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地位的矛盾则是主要矛盾。

首先,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地位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所决定。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还存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在精神文明(文化)建设方面,主要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这里不仅包括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力,也包括发展精神生产力。在精神生产力中知识分子是构成精神生产诸要素中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因此,发展精神生产力,就必须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否则,发展精神生产力就成为一句空话;而要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必须给予知识分子应有的地位。

其次,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地位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也是由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决定。

现代社会正在向“信息社会”发展。当前,世界正经历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这场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相结合为特征的信息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产业革命,它用信息和计算机化的智能并入整个社会的生产、管理、服务和生活系统,改组现有的全部社会产业构成,能带来空前的经济效益。这场信息革命也是深刻的社会革命,它将根本改变人类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等等,对人类社会的意义是空前的。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作

用如同一个巨大的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将极大地提高这个网络的反应灵敏度和功能。信息及时传递和处理技术已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竞争力和发展成功的关键。在这样一个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科技、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起步,要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经济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历程达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后来居上,更须集中力量大力发展和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科技生产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推动作用,因此,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肩负着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讲,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主体的知识分子,是现代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

最后,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地位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还在于现阶段知识分子的地位尚不尽人意,从而严重影响着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恢复和发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了以往“左”的错误,逐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重新被视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党的十五大报告则进一步认为,“知识分子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

的生产者”;此外,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也有了逐步提高,这一切都说明了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关心和爱护。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封建思想、“左”的思潮的严重影响,至今还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对知识分子抱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特别是“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从而严重地妨碍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落实。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参与决策的程度较低,许多领导决策根本不重视专家的意见,甚至根本就不征询专家的意见,结果决策往往因缺乏科学性、可行性而失败;知识分子的待遇总的还是偏低,往往不得不为家庭生计而操心,从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等等。知识分子的权利与义务、地位与作用之间的反差,在客观上制约着精神生产的发展,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广东世纪之交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必须推动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迅速、健康地发展;为此,就必须解决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的矛盾,从而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建功立业。

作者吴灿新,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510053)

责任编辑:冯 生

# 广东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教育现代化问题研究

□江海燕

20世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明了一个基本的历史结论:没有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在“科教兴国”成为我们党和政府重要战略决策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广东经济发展进程中,教育现代化的课题,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是极有价值的。本文将研究的逻辑起点置于广东经济及其发展目标上,进而从广东经济转型对教育的现实要求,论述了教育现代化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最后提出了广东经济发展中,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 一、广东经济现状及其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一是充分发挥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二是充分发挥广东历来注重商品经济的传统优势,大胆开拓,带动经济发展,率先推进市场经济;三是充分利用濒临港澳,面向东南亚,以及华侨港澳同胞众多的优势。经过18年的发展,广东经济取得了重大成绩,广东国民生产总值已从1980年的245.71亿元增至1997年7308.24亿元(当年价),18年连增30倍,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已从1980年的34:41:25转变为1997年的13.5:50.2:36.3。出口贸易从1980年22亿美元增至1997年745.64亿美元,对比增34倍。①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如农民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274.37元增至1995年2699.24元。广东经过20年来的建设,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通讯等已有了质的飞跃,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但是,广东属于后发型经济发展类型,在初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下,通过大量引进外资,加上充裕廉价的人力和土地资源,使经济出现了飞速增长的势头。然而这种增长由于资金不足,被迫选择低层次劳动力密集型靠高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方式发展生产,投入量大但效益极低;同时,旧的生产方

式以及政体中原有的官僚习气等不仅保留下来而且造成发展的失误和错位,甚至借助放开搞活滋生出严重的腐败,等等这些,对日益增长的经济造成越来越大的制约。90年代后,广东经济不仅面临自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意味着80年代以出租土地、增加劳力资源的剥夺性消耗来取得积累的经济体系已走到了尽头,而且也面临国内宏观调控和国际经济中科技更新换代的猛烈冲击。广东经济要保持领先势头,保证于2010年赶上“四小龙”,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新的改革和创新。广东省委、省政府1994年提出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设想,提出“中部地区领先,东西两翼齐飞,广大山区崛起”和“分类指导、层次推进、梯度发展、共同富裕”的发展方针,组织专家制定发展规划。从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广东要走出高耗低效的传统劳力型经济模式,就必须制定面对新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逐步形成全面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依靠深化改革和科技进步以及教育的现代化,建立起以高密集人才储备为基础的配套协调、优质、高效、轻型、外向的经济;充分发挥广州中心城市、经济特区的辐射和窗口作用,积极依托中部地区,加快发展东西两翼,大力扶持山区和老、少、边、穷地区,实现全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广东要实现这一目标,在新水平上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在新的经济格局中保持领先地位,根据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最重要的法则是迅速推进广东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实现这一转型升级的根本点就是使经济成长的主导动力由粗放型投资扩张转变为科技进步或技术创新。唯有依靠科技,实现技术创新,才能获得效益,在出口产品更新换代以及打破国际贸易壁垒中发挥关键

作用。

技术创新不同于技术发明或发现,而是第一次把这种新发明的技术应用到生产过程之中,并使之发生质的变化的工作。因此,技术创新不属于技术范畴,而是企业家把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经济体中的过程,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一种使进步的科学技术物化、商品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弗里曼在《创新经济学》中将技术创新定义为“第一次引入一种产品(或工艺)所包括的技术、设计、生产、财政、管理的过程”。熊彼特将创新活动归纳为五种状况:①生产新产品;②采用新工艺;③开辟新市场;④发现和利用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⑤实行新的企业组织方式和管理方法。②可见,经济学家关心的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过程产生的相关影响,技术创新只有在对经济过程确实的、持续的作用后才被纳入考察的视域。在现代化或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创造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大,两者呈正相关,且表现为滚雪球式的指数关系。

广东经济要实现高一阶段的飞跃,无论是产业结构转型,使分散的开放转变为集团式的开放,被动型经济转变为主动型经济,还是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组建跨国跨地区集团,发展大规模经济等等,都必须依靠技术创新,都取决于科学进步能否成为广东经济增长的“主发动机”。从国际经济发展特点和广东经济实际看,广东经济增长优势中的科技优势是通过引进国际资本和利用已积累的资金及原有基础,将国内的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的高新科技产品。这是一种不同于国内现行经济体制的新生产模式,广东人尤其是广东的教育必须首先对此做出明智的选择和积极反应。参照韩国和台湾等“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广东只有迅速转变办学观念,建构新的教育模式,才可能使教育获得蕴含着巨大的科技创新潜能的能力,并转向为经济发展服务,培养出大量训练有素适应新生产过程的生产者。

这种教育变革,就是教育现代化。目

前,广东的整体人口素质已明显滞后于广东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而人才素质的提高在于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东教育现代化已成为广东新经济增长的一个“瓶颈”。

## 二、教育现代化是广东经济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广东经济要走出第一次产业革命模式,在2010年实现现代化目标,就必须依靠技术创新。而广东教育现代化尽管对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仍存在发展上的问题,因而极大地影响着广东经济上的技术创新,制约着经济现代化的实现。因此,进一步推进教育现代化是广东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一)广东经济增长模式逐步向技术创新转移,要求教育现代化,建立新型经济增长的启动机制。

90年代后广东经济在国内外形势压力及自身经济增长规律作用下,终将放弃依靠劳力密集、土地资源密集及资金密集,广种薄收,靠高消耗土地等不可再生资源取得低层次积累,利用紧缺日用品开辟市场的增长模式,转向依靠技术创新和行业或区域的技术进步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产品更新换代,占领和扩展市场。人力资本理论家丹尼森进一步把技术创新称为“知识进展”。他认为“知识进展”强调知识对生产过程全面深入的作用,因为任何生产的知识都是综合性的,只有知识进展才能使有关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综合作用而产生经济增长,而知识进展则是教育的结果。他用“知识进展”深刻地阐明了教育对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关键作用。实现技术创新,决定了广东经济增长不再是依靠资源量的增加,也不是仅仅依靠一、二名人才,而是整体劳动力知识水平的提高,是整个企业甚至是区域文化素质的提升。因此,推进教育现代化,按经济发展要求建立新型的教育体系和全省“知识进展”的作用机制,就成了广东经济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二)广东经济增长以赶超先进为目标,要求教育现代化,以建立相应的人才保障体系。



广东省经济现代化目标是要在 2010 年实现赶超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经济发展,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此,1990—1995 年人均 GDP 年增长率为 11%,1995—2000 年增长率为 12.7%,2001—2010 年增长率为 12.4%,1994 年广东 GDP 为 3067.18 亿元(1990 年价),那么到 2000 年时为 6284.67 亿元,2010 年为 20227.66 亿元(1990 年价)。其中在中产值结构中一、二、三产业结构将从 1994 年的 16.4%、50.5%、33.1%,到 2000 年变为 11.8%、46.54%、42.28%,到 2010 年时则变为 5.41%、34.48%、60.11%。③可见,第一、第二产业劳力数将不断减少,而第三产业人数将增加并基本实现向知识经济转变,且会呈现出高科技产业与低饮食服务业并存。因此,必然要求全员教育水平提高,强化企业技术水准。但目前广东人口素质不高,高层次人才比率偏少。据 199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全省粗文盲率为 7.81%,小学文化程度为 48%,初中文化程度为 31.1%,高中、中专文化程度为 11.2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 2.41%。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文化程度也不高,据 1986 年统计,职工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占 2/3 以上,其中文盲及半文盲比重高达 20%,直至目前小学文化程度职工仍占多数。1995 年调查显示,广东第二、三产业实际从业人员总数为 2321.03 万人(含部分外省民工),被聘为技术工人的仅有 336 万人,占 14.37%,而其中高级技术以上占 21.8%,中级技工占 40.5%,初级技工占 37.3%。这就表明,二、三产业中初级工以下的劳力占 90% 以上。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惊人数据。这种人口素质和产业劳动力素质,将直接制约着广东经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因此,教育现代化是广东经济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三)广东经济增长以科技进步为基础,要求教育现代化,以建立科技教育体系和科技大军。

如前所述,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是广东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灵魂,但目前广东科技对生产作用的比重很小。一方面是产业层次

尚低,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科技的力量薄弱或发展科技目标不明尚未能形成对生产力作用的主动机制。一是在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中中等程度以上技工所占比例不足 10%;二是专门人才所占比例过低,1994 年每万社会劳动力中虽有专门人才 311 人,但每万人口中仅 162 人,而韩国每万人口中有 1048 人,台湾为 1245 人。韩国在 1960—1970 年的经济起飞最初阶段大中专毕业生在社会从业人员中的比率从 15.8% 上升到 32.7%。广东农村劳动力中没受过劳动培训者占总劳力的 86.8%。三是科技人才比例过低,目前全省国有研究机构研究开发人员不足 4 万人,1989 年全省大中型工业技术队伍人数 19044 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仅 7465 人,占职工人数的 5.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传统工业为 20%,高新工业为 40—50%)差距更远。1995 年全省仍有 48.5% 的工业企业没有技术开发人员。东莞市 1991 年有逾万家工厂企业,但有专业职称的科技人员不足万人。而韩国在经济起飞的 1960—1970 年中科技人员提高了一倍以上,1976 年在制造行业的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比例为 1:5;1977 年技能工以上水平的科技人员达 156.3 万人,占总从业人员的 12.3%,其中重化工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占全体技能工以上水平科技人员总数的 85.9%。④四是技术进步在工业生产中贡献率过低,据测算,1978—1989 年,广东工业生产中技术进步贡献率仅为 19.4%,其中国有企业总产值增长中也仅有 35% 是技术作用的结果,这与亚洲“四小龙”同期技术进步贡献率达到 50—61%,发达国家为 60—80% 有巨大差距。1993 年全省实施高新技术 88 项,达到国家级的仅占 30%,当年高新技术产值 200 亿元,仅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 6%,且项目的 59% 来自省外。诸如种种,都清楚地表明,广东经济正处于走向新发展的转型时期,前一阶段的改革开放只是动员了全省的物力资源,但这种粗放型的靠剥夺性使用物力资源的生长方式已走到了尽头,必须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创新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因

此,推行从普及科技知识到建立科技中学、科技学院、科技大学以及相关专业到开设从专科到本科到研究生教育的系统科技教育体系,培养层次多样专业结构合理的科技队伍,并建立有益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教育机制和形成“知识进展”的综合效能,就成了广东经济转型的关键要素。很自然,这也是当前广东教育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四)广东经济增长以新型人才为条件,要求教育现代化,以建立培养新型的劳动大军和专家队伍的教育体系。

广东经济增长向知识经济转型,依赖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并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都必须以大批新型人才为条件,因此必须要求广东大力推进教育现代化,改革传统教育,建立培养新型的劳动大军和专家队伍教育体系。历史证明,一种影响整个区域或世界的技术进步的发生,只有凭籍这个区域教育体制的转变才可能真正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以及技术升级,都要求教育要提高质量,培养高素质的专家队伍和劳力大军。当产业结构比重越向高科技产业倾斜时,第一、二产业从业人数就会下降,人员的技术要求就会提高;第三产业中高新科技尤其是电脑信息技术业的兴起,也要求大量科技人才,因而都对教育质量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教育高质量已不仅是学生的高分数,而是包括开设反映最新科技成果的课程,使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相适应以及学生成为这一行业的行家里手。当产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时,经济的扩张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同样需要高质量的人才支撑,并需要教育不断加速改制某些“过剩”劳力,使之成为新兴行业的生产者。由此可见,推行教育现代化,提高教育质量,已成为广东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 三、广东经济发展中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以上研究可见,广东经济要实现新一轮的起飞,必须推行教育现代化。根据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以及广东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本文拟以推进广东经济现代化为基本目标,对广东

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提出以下一些看法。

#### (一)广东经济发展中推行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指导思想

1、坚持以广东经济发展为中心,为广东经济现代化服务。这是广东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核心和灵魂。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研究,一方面现代化与教育在本质上具有互动联系,规定了广东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教育现代化,实施科技兴省战略方针;另一方面,现代化的核心是现代经济增长,这就决定了广东推行教育现代化必须以促进这个“增长”为前提并作为发展教育的最高目的和评价指标,这是所有发达国家以及“四小龙”走向发达之路和实现经济起飞的要诀,也是推行教育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性的工作法则。

2、坚持从广东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后发外生型的发展特点。广东教育现代化必须从广东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充分把握后发外生型的发展特征,如教育发展必须服从广东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可滞后,也不可盲目超前,考虑经济的总体规划和在中部、东西两翼及山区的具体布局及发展差异,在国家教育方针指导下对具体发展目标和体系进行有效设计;在推行教育现代化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示范先进经验,考虑经济需要而不盲目照搬或追求高指标等。

3、坚持遵循现代教育发展规律,使之与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代教育的每次成功改革,实际上是促进教育更紧密地与生产相结合,更好地为本地生产服务。这是一条简朴但又极不易被人们认识的真理。广东教育现代化也只有在坚持遵循这一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对广东的经济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这也是“四小龙”办教兴邦成功的重要经验。

#### (二)广东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根据广东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省委、省政府规定的全省教育发展总目标是:2000年以前,在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普及高

中阶段教育,全省各类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26%;2010 年,全省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在学的各类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3.2%。要逐步形成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规模、教育层次和教育结构,建立起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的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社会共同办学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构合理、机制灵活、开放多元、具有广东特色的教育体系,普遍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实现教育现代化,使广东成为教育强省。

要实现以上教育发展总目标,必须努力实现以下发展目标要求:

教育发展水平现代化。我省在 1996 年已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必须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逐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争取在 2000 年前,在珠江三角洲和大中城市普及高中阶段教育,2010 年在全省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扩大高等院校办学规模,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到 2000 年,全省各种形式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达到 91 万,年均递增 10.6%,达到每万人口拥有各种形式高等教育在学学生 126 人,其中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 26 人,到 2010 年,在学学生增加到 260 万,年平均递增 11.1%,达到每万人口拥有在学学生 320 人,其中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 45 人,研究生约占其中的 5%。根据我省产业结构调整 and 经济发展要求,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建立起初、中、高相衔接的、具有广东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到 2000 年,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年招生数和在校生数要占高中阶段学生数的 60% 左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城市可达 70%。通过改造现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成人高校,兴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到 2000 年,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当年全省高等学历教育在校生的 20%。同时,大力兴办各级各类成人教育,逐步形成终身教育制度。

教育体系现代化。教育体系的现代化包括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改革传统教育观念,树立现代教育观念,这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和前提。教学内容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必须重

视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使之反映出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先进水平,当前应当根据中小学生学习年龄特点和教育的需要适当引进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方面的最新成果,以及在这几个前沿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技术知识。必须继续加强外语教育、计算机教育和信息技术教育,逐步形成我省教育特色。同时还要加强环境教育、人口教育、卫生知识等教育,使基础教育能跟上时代发展步伐。要加强教材教法的研究,克服满堂灌的教学弊端,而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促进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学习,使素质得以全面提高。要根本改变教师主要运用粉笔、黑板教学的传统手段,而同时推广运用包括幻灯、电影、投影仪、收录机、语音实验室、广播、电视、微机及计算机网络、交互电视录像圆盘在内的电化教育和多媒体教育,极大地丰富教学活动,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教育制度的现代化。要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给学校以自主权,逐步加强民主化,同时建立各种咨询、审议机构,以加强对政府决策和机构制约作用。要改变政府单一办学,建立政府办学和社会多渠道办学相结合的体制,政府主要承担基础教育,推动其在广大民众中的推广和普及,其它教育要放开,要更多地推动私人办学和企业办学,促进教育的发展。要适应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要求,为人们提供可选择的多形式教育,改变单一普通学校教育形式,而实现教育形式多样化,如远距离教育、学分制教育、自学考试教育、培训教育等等。

### (三)广东教育现代化的主要策略

根据广东经济发展要求,广东教育现代化应采取下列重大对策和措施:

#### 1、建立推进教育转型的五大教育机制

(1)学校优胜劣汰机制。即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建立校际间的竞争机制,质优学校扩充发展,质差学校实施补救扶持甚至对其关停并转。为此要建立一系列允许私立与公立学校平等竞争的法规,逐步推行基础

教育的非重点化,目前要做到义务教育阶段非重点化,争取更高层次达标;实施创办教育集团和建立联校制度,让竞争中的质优学校兼并或领导质差学校,发挥教育规模效益,一方面对差校实施教育支援措施,改造薄弱学校,另一方面关停并转部分按分级办学因村设校所办的那些无法形成规模的小校和差校。

2)建立供需互动的运作机制。即按照经济发展需要办学,在教育规模、发展速度、教育质量、教育机构等方面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互动关系。为此,应成立专门教育评估机构及评估咨询委员会;进行常规的质量评估工作,例如对办学机构与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常规性的总体评估,对学校、专业设置和运作效益进行评价,作为发展或取舍的依据;建立厂企直接参与办学制度,使供与需、投资与产出之间建立起直接关系;建立人才测试制度和规划模式,根据经济发展与人才需求来规划教育发展,等等,杜绝仅凭教师能力办学的倾向。

3)建立择优录用、竞争上岗的人事机制。即学校内部要彻底推行聘任制,岗位责任制,使责、权、利充分挂钩,择优录用,竞争上岗。建立系统教师业务考评制度,既要鼓励教师献身教育事业,又要鼓励教师不断进取,在业务上精益求精。

4)建立全员参与、社会共办的办学机制。即建立一种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教育决策,共同投资办学的机制。一是要推行董事会制度,聘请社会名流、企业家、专家参与大、中、小学办学;二是建立各种咨询和协调委员会,广聘社会名流参与,如象香港的教育统筹委员会那样;三是建立教育科学决策制度,使上、下级、教育主管机构,群众社团、社会舆论都能广泛参与的决策过程;四是坚持谁办教育谁受益的原则,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积极投资教育的体制,变一元投资为多元投资。

5)建立全员教育、能力分流的学习机制。即建立一种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都取得接受教育机会的制度,从根本上消除升学压力,使学生按发展能力进行多种分流,

选择适合的学习方式完成学业。一是要建立更加多样的学校类型和教育形式,提供更加灵活的教育条件;二是建立更灵活科学的学生学习评价体系,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按能力倾向和学业等级向专业教育和学术教育或文理科等方面分流;三是建立奖励为主的学生管理制度和按教育水平择业的就业制度。

建立和推行这五大机制,将有效地推进广东教育模式的转型,推进广东教育现代化进程,促进教育为广东经济发展服务。

## 2、强化教育发展战略重点,实施四大教育工程

根据广东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广东教育实际,广东必须强化教育发展战略重点,实施教育重点建设工程。

1)突出提高教育质量的战略重点。这是广东“普九”后面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也是高教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应当专门成立教育质量委员会来统筹推行。

2)突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战略重点。这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起飞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根据我省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必须重点发展好机械制造、交通、通讯、电子计算机和信息产业、纺织化工、商业贸易、金融保险、房地产、旅游服务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大批实用性专业人才,实现高科技的产业转化,既是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条件,也是满足广东经济转型对人才需求的一个重要举措。

3)突出发展高等教育的战略重点。这是广东建设高级人才培养基地,解决大批人才需求,提高人才储蓄水平,优化地方投资环境和人文氛围的关键举措。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多功能和开放型的高等教育,在专业结构上注重理工科教育,人文社会学科与理工科比重约为4:6,基础学科与理工科比重约3:7或2.5:7.5。发展高教重在发展私立高校,重在发展地方高校和专业院校,重在发展关系我省发展的重点学科及院系。

4)突出发展科技教育的重点。这是保持广东经济持续增长和实现转型的重要举措。应建立从推广科普知识,到开设中小学



课程和课外活动到成立科技中学、科技学院到科技大学的系统科技教育体系。制定专门鼓励科技教育条例,规定科技教育的发展目标,建立有关基金,造就一批科技英才。

除了推行上述四大战略重点,广东教育现代化应实施四大教育重点工程:

实施素质教育工程。教育要面向 21 世纪,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提高。要改革教育结构,在高中后合理分流,因材施教,各尽其才。深入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着眼于学生独立思维、创造性能力和个性培养,促进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

实施强化师资工程。加强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师资素质。为实现 2010 年教育发展目标,必须实施中小学教师提高一个学历层次要求,小学师资要实现大专化,初中教师要达到本科水平,高中教师要全部达到本科并有部分达到硕士研究生水平;要加强教师继续教育,实施教师的全员培训工作,加强校长联合会和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培养,基础教育实施“百千万”工程(到 2010 年,全省培养 100 名教育专家,1000 名名校长,10000 名名教师),高等教育实施“十百千”工程(到 2010 年,全省培养 10 名国家级,100 名省级,1000 名校级学术带头人),通过这两个工程重点培养一批重点教师、校长、重点发展一批起示范作用的名校。动员一批经费,完善重点学校的办学条件。给重点教师提供津贴、住房等生活条件。这是彻底改造广东学校教育面貌的重要举措。为此应强化现代教育理论学习,强化教育科学研究、强化现代教育实验和创新。

实施重点教材工程。贯彻“一纲多本”或“多纲多本”的原则,鼓励地方和学校根据实际选择和运用教材,根据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编写地方教材,完善、修改沿海版教材,积极组织高中文理科综合课程教改实验。鼓励教师参与教材编写,这能有效地提高教师水平和教育质量。

实施教育特色工程。即鼓励各市县或各校根据自己的实际,办出特色。如深圳南山区的六大教育特色、东莞市农村教育特

色、新会荷塘中学“教富互动、校企合一”特色,珠海恩溢小学的爱的教育特色,等等。

### 3、实行梯级推进型教育发展策略

鉴于许多后发型国家教育现代化为了尽快实现赶超,推行全面出击、一步到位战略,出现了各种问题,鉴于广东经济发展处于新的转型阶段,且很不平衡,应借鉴亚洲“四小龙”的经验,采取分阶段按层次推进的梯级发展战略。

1) 区域层次的梯级推进策略。即宏观上根据广东经济发展形势,以珠江三角洲为重点,向东西两翼推进,并作用于山区。重点构建中部地区密集型教育,形成以研究型大学为主导的学科齐全、辐射力强的教育重镇:东西两翼突出创办专业性大学,并构建完整的应用性教育体系;山区突出抓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抓好教育质量的同时,重点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以中心城市创办应用性大学为依托建构起与中、专科及本科相配套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根据经济发展需要,采取适度超前的波浪式推进的教育发展态势,各层次都同时推行改革,但完成各自不同层次的发展任务。

2) 教育层次的梯级推进策略。即在学前、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学教育发展上坚持梯级推进。一是注重规模发展,抓好包括学前教育一年的十年普及义务教育,再推进至高中,职教以及高等教育从精英型向大众型再向普及型发展;二是注重质量,抓好基础教育,从重点学校推及全体学生,再推向更高层次学校。

3) 高等教育层次的梯级推进策略。即对两年制社区学院、三年制专科大学、四年制本科大学以及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实施逐步提高层次的工作。随着新高校的诞生,老的高校将根据发展需要逐步从低层次的学院向更高层次的大学提升。

4) 行业培训层次的梯级推进策略。从经济发展和教育能力及资源看,不可能一步到位把所有人都培养成高级人才,再行就业。应根据产业要求,实行轮训制,逐步向高级推进,这样可节省资源并密切配合经济发展。



4、强化政府行为,推行五大方向性发展  
广东教育现代化属后发型,因此必须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一是按照现代化的意图推行教育改革,二是统筹教育资源,三是更有计划有目的地配合经济发展,把握教育发展的方向。从配合广东经济发展看,广东教育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应重在推行五大方向性发展:

1)生产性。即政府必须积极推行教育与生产的结合,促进教育为生产发展服务。这里的生产性主要指社会生产实践,强调教育要走出关门办学的学究化道路。教育具有生产性,因此教育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式,是关系社会进步、经济增长的一种全局性产业。

2)效益性。即政府应调控教育发展、教育投资的效益。教育是产业,就要投资,而且应善于投资。有投入应有产出,因此必须强化教育效益,建立起全方位的教育效益观,谋求获取最大的教育效益。

3)综合性。即政府应主动从宏观综合的高度审视教育发展,并注入教育规划之中。一是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综合原理,注重教育各部协调发展;二是注重教育与社会与经济互动的关系,在规划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规划好教育的发展,主动地用教育来支持经济发展。

4)国际化。即政府应积极推进教育国际化。一是强化粤港澳台教育合作与交流;二是促进“四小龙”与广东的“新四小龙”教育研究和发展的合作,并建立起互动关系;三是开展与各国合作办学和学位对等及交流等方面的工作。

5)一体化。即政府要把大力推进广东教育一体化作为重要工作:一是把不平衡的区域教育变成有内在联系,可相互作用的层次合理并与经济配合的统一体,使之彼此之间的长短处产生互补;二是把幼、小、中、大学教育看成是有相互联系的整体,大力推进一体化进程,使各阶段达到最有效的衔接和沟通;三是使德育、智育、体育的作用都能统一地影响学生,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四是使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基础教育与应

用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贯通成为一体;并使学校、家长、社会、产业等产生一体化的密切联系。因此一体化是建构大教育的重要方式,是每一级政府主导教育都必须关注的重点。

①根据《广东统计报告》,1996年。

②陶骅等著:《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④广东省计划委员会有关文件;冯增俊:《试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主要特色及其基本任务》,载《中国教育学刊》1995年第4期。

#### 主要参考文献

1.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凯尔等著:《工业主义与工业人》(Clark Kerr et al,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1973)。
3. 【美】詹马尼:《社会现代论》(Gino Gremain, the Sociology of Modernization, New Jersey, 1981)。
4. 【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人力资本投资》,商务印书馆。
5. 【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教育的经济价值》,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 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 冯增俊著:《比较教育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8. 孙启林著:《战后韩国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9. 李大光等编著:《今日新加坡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0. 田江麟编著:《今日韩国教育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1. 黄浩炯、何景安著:《今日香港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2. 罗祥喜编著:《台湾教育与经济发展》,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3. 江海燕等主编:《迈向教育现代化——江门市教育综合改革实践探索》,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江海燕,广东省教育厅  
责任编辑:童 轩

# 璀璨的“双子座”

——《孙中山与宋庆龄》图录序言

□张 磊 盛永华 萧润君

一

在19—20世纪的中国，诞生了两位巨人——孙中山与宋庆龄。他们的名字是密不可分的，宛如深邃天幕中光辉灿烂的“双子座”。他们是时代和民族的精英，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孙中山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以近40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在广阔的时空舞台上演出了多幕悲壮史剧。他的战斗历程延伸过两个世纪和贯串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前后阶段。他的足迹和活动涵盖了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他力图使自己的祖国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从中世纪入于近代化。他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给时代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孙中山扮演了民族英雄、革命先驱的重要角色。他在两个世纪的交接地时刻担负起开拓的重任，从而使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由准备阶段入于正规阶段。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后，他积极地迎接了急湍的时代大潮，让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经由检验和扬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的一生宛如上升的阶梯，迈进不停，攀登不已，无论是声望、威信或年龄的增长，都未曾导致思想僵化和盲目性。他从爱国和热衷社会变革的青年，成长为民族

民主革命领袖；又从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一直是时代潮流的指导者。

孙中山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领导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辛亥革命；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进展。他的全部政治生涯形象地呈现了一个加半个“弧形”：第一个“弧形”是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动的写照，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构成升弧，辛亥革命为其顶点，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则显示为降弧；第二个“半弧形”反映了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业绩，其顶点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弥平广州商团叛乱和北上。他的非时逝世，中断了“弧形”的高扬。

为了拯救和建设祖国，孙中山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为“新世界”诞生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中，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在“悲剧的高度”——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虽然事业未能及身而成。在这种意义上，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儿子。同时，他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向，“世界大同”作为他的终极奋斗目标，因之获得了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层次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们的认同。所以，他也理所当然地属于世界。

孙中山的战友、学生和伴侣——宋庆龄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女儿，堪称中华民族的瑰宝；同样，她也受到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们的理解和赞颂。

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在于她是以孙中山的战友、学生与伴侣的身份参与、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则是由于她在新的革命阶段发掘和赋予孙中山思想以更深广的内涵,使孙中山思想具有不衰的生命力,而与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接轨。她始终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将不同阶层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爱国进步人士和群体凝聚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成为中国革命大军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并导引他们投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洪流。甚至她的崇高品格的魅力也成为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量,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应当指出,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有着主从之分,但影响却是双向的。在他们携手走过的艰难征程中,彼此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砥砺和促进。孙中山作为宋庆龄的战友、导师和伴侣,对她的成长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宋庆龄对于孙中山的积极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特别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高举他的旗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和事业,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贯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她努力使得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同奔腾不息的历史潮流融会起来,赋予孙中山的旗帜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现实斗争注入了更多的凝聚力。孙中山迄今仍未离开现实的舞台,继续鼓舞人们奋进,以完成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宋庆龄的作用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是时代与斗争的要求,也是他们的共同思想与相互关系逻辑发展的结果。

## 二

孙中山在19世纪末叶踏上了社会政治舞台。他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超越了同时代中国所有的进步思潮和运动,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准备阶段进入正规阶段的第一次重大飞跃。这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青年,很早就要用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他曾经受过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影响,在他的最初的政治活动中很明显地留着农民战争和维新思潮的印记。但是,他的出身和教养又不同于农民战争领袖和维新志士,使他的思想中蕴藏着更多的民主主义因素,未曾囿于先驱者的

范畴。1894年夏,他怀着改革的热望上书李鸿章失败后,便毅然跨出决定性的步伐,立志实行革命以改造中国。从此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毫无疑问,上书的挫折给孙中山以极大的刺激,使他“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他在甲午战争的炮声中前往檀香山,并在今年11月组建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宣言号召人民奋力“振兴中华”,拯救危亡。入会誓词则规定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个已具雏形的民主革命纲领显然具有划时代意义,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首次出现的共和国方案。

在兴中会长达10年的征程中,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他们展开了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并且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在战斗历程中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纲领,形成了以独立、民主和富强为主题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扩大了革命民主派的影响,并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这样,当革命浪潮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开始高涨时,孙中山终于在1905年建立了统一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政纲。同盟会的成立,把民主革命运动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此,“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

策划、组织和发动反清武装斗争,则是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的主要革命实践活动。从1907年到1911年,他在两广和云南地区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或是依靠会党、新军和防营,或是借助群众的自发斗争。这些起义虽然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和其他条件而失败,却在政治上给予清朝政府以沉重打击,促进人民觉醒,激励群众斗志。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更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不断扩大的保路风潮,又把斗争推向高峰。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到来。

1911年10月,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举义帜。各省纷纷响应,形势迅猛发展。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土崩瓦解,这是革命党人流血牺牲和人民群众奋起斗争的结果。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和主持了临时政府。新政权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制定了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与宪法等”的《临时约法》,颁布了多项除旧立新的法令。

然而,共和制度的实际生存期非常短暂。形势

的逆转迫使孙中山不得不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在国内外反动势力支持下夺取了政权,旧秩序在新形式下恢复。这个窃国大盗肆无忌惮地践踏和毁弃共和制度,乃至公然称帝。在他同他的洪宪残梦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后,把持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头子们又继承了死去的独夫、民贼的衣钵。民国依然徒具虚名,政权的实质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

孙中山被迫展开捍卫共和制度的持续斗争,再次举起“武装革命”的旗帜,由是有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两次护法运动。这些艰苦的战斗取得了某些具体的成果,但不能实现共和主义真谛,以致在长达10年的捍卫共和制度的战斗历程中,几乎每个回合都充溢着浓郁的悲剧色彩。

正是在捍卫共和制度遭到第一次严重挫折后,孙中山于流亡东京的极其困难的时刻与宋庆龄会见。他们的始点颇不相同——一位来自濒海的南粤山村;一位诞生于正在崛起的大都市上海,民主革命浪潮使得他们得以汇聚。

对于宋庆龄来说,历史在她的生活历程中提供了特殊的机遇。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君临,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成为旧中国的痼疾。把目光投向世界,吸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冲决封建主义罗网,使中国趋于近代化,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成长的必备条件。宋庆龄的开放的家庭状况在当时的中国是罕见的,这使她能够在少年时代就漂洋过海,走向广阔的世界,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认识了许多新鲜事物,最重要的是受到了民主主义的洗礼。

封建专制制度的朽败和野蛮,民众的贫困和无权,使她在痛苦中思索,由是萌生了社会变革的热望,她亟望人民摆脱“奴役”,获得“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权利。为此,她日渐坚信必须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要求更新和进步,消灭“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的罪恶统治,使得中国从“贫困不堪”变为“繁荣昌盛”。正像许多同代人一样,她从爱国走向变革。

1913年夏,宋庆龄从美国前往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成为伟大革命家的战友和学生。年青的文学士在政治生涯开始时,即刻“接近了革命的中心”。宋庆龄的政治素质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宋氏家族与孙中山的友谊则是重要的机缘。当宋庆龄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

由于父亲的评述使这位献身崇高事业的巨人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其后艰苦的斗争中,他们更结成为生死不渝的同志和伴侣。

### 三

但是,历史的行程并不因“顿挫”而停滞。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降弧已经趋于终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期正在到来。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拓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两年后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和领导阶级迈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导致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在这革命阶段新旧交接的关键时刻,孙中山表现了伟大革命家的卓识、气魄和胆略。他对自己先前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使长期以来从事的斗争适应历史的潮流。他积极地迎接了新时代的到来,实现了他的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飞跃。

孙中山热烈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1918年初就曾致电列宁,表示对他的事业“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共同战斗”。他支持五四运动,认为青年学生发起的这场斗争定会“收绝伦之效果”。当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热情的双手时,他把他们引为忠诚的战友,并与时俱进地赋予三民主义以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培训革命军队,镇压了反革命的买办武装——商团的叛乱,巩固和扩展了广东革命策源地,开创了实行北伐的大好局面。可以断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初期,孙中山已经把自己的思想与实践提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表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高度进步性,在新的时代建树了新的业绩,并为后来的斗争开拓了道路。在持续的战斗过程中,宋庆龄给他以积极的支持、鼓励和影响。

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并肩走过的征程,堪称“艰难顿挫”和奋进不已的10年:先是为捍卫共和制度——主要是反袁与两次护法运动——而斗争,历尽险阻而回天乏术;然后是迎接“新世纪的曙光”,与时代的大潮俱进。年青的爱国者、民主主义者宋庆龄正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尾声中走进了革命队伍,当孙中山处于极度困难的时候选择了他

和他所代表的革命事业。流亡异域,开府广州,颠沛流离,战祸频仍……正是在这艰苦备尝的日子里,孙中山成为宋庆龄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以“亲身体验”帮助宋庆龄深化对“旧中国农村悲惨生活”和其他方面的认识,为她逐步正确理解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大大有助于日后宋庆龄正确判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领导力量、主力军……等等一系列革命成败攸关的问题。他是宋庆龄正式踏上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带领她为捍卫共和制度而奋斗,使她在不断的失败与探索中经受严酷的考验和磨砺,而得以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

但是,作为学生的宋庆龄,与她的导师孙中山的相互关系并非限于单向,他们之间的作用显然是双向的。在革命濒于低潮和孙中山处于逆境的时候,宋庆龄带着蓬勃朝气和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信念、满怀温柔和深情来到孙中山的身旁,她给孙中山的支持和慰藉,无疑成为激励他在挫折中与时俱进的动因之一。因之,对于中国革命也产生独特的影响。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这种作用尤为明显。

两次护法战争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表明旧民主主义革命已临绝境;五四运动的爆发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宣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到来。在中国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转折关头,作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孙中山与宋庆龄,经受过严峻的考验,并在新时代的曙光中看到了“大希望”,要“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他们自觉地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检验过去的理论和实践。孙中山的晚年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高峰——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由此,中国的民主革命新阶段涌起了第一个高潮。

革命形势的迅速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队伍的分化及思想的冲突愈趋激烈。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自同盟会时期就开始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团。随着革命进程中不同阶段的更替,他的主要助手们往往有所变化。从开始追随孙中山革命直至他逝世,对他的思想与事业都能深切理解并始终支持的成员并不很多,而参与革命事业较晚的宋庆龄,无疑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她在革命的低潮中选择了孙中山和他所代表的革命事

业,从此义无反顾。对于孙中山后期活动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展,宋庆龄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不仅由于她承担了许多实际工作,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方面相互探讨、切磋以至共同抵御来自右翼的干扰。在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转换时刻,他们之间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交流和促进日益强化。宋庆龄的炽烈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执着的进取精神,对于新事物的敏感和接纳……成为她与孙中山共有的精神财富,并体现在他们与时俱进的活动中。这一切对于孙中山在新时期观念的更新和决策的形成和制订,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正是在相互扶持及砥砺中,他们应合着时代脉搏走向了更高的革命阶段。

#### 四

然而,正当国民革命的风暴从南方升腾起来的时候,孙中山却因积劳成疾,非时逝世。在艰难的日子里,宋庆龄坚毅地迎向错综复杂的斗争,以政治家、革命家的身份和不妥协的战士的精神面貌,独立投身于时代的激流。

1927年春夏之交,革命在腥风血雨中转入低潮。但是,辛亥革命的悲剧不再重演,革命只是从城市转向广阔的农村,然后再以农村包围城市。因之,革命在退却中向着纵深发展。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宋庆龄高举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旗帜,向叛徒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力图挽狂澜于既倒。而在革命失败已成定局后,她竭尽全力揭露和批判那些自称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们的叛徒嘴脸,指出他们已经背弃了孙中山的事业,走上了反动的道路。她断言“目前已经进入反动时期”,而造成这种可悲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那些所谓国民党的‘领袖们’——如出一辙的小政客们”。他们倒行逆施,所依赖的是“新军国主义”。这些人根本“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推行的是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相反的政策”。她愤怒谴责叛徒们“操纵利用国民党”,打击残杀“农民、工人、共产党”,断言国民党已经走向了反面,“丧失了革命性”而“不再是革命的党”。为了同国民党右派划清界线,她表示“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她当时还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切盼他们能够团结起来,继承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她呼吁“用革命的方法改正错误”,把右派从国民党清除出去,将革命力量重新团



聚起来,继续和推进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宋庆龄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把握住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精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此作为检验革命与反革命的“试剂”。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揭露和批判,大大有助于中国和世界人民认清逆转的形势以及判明革命的走向。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进行认真的学习与反思,使宋庆龄的观念不断更新,辨清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分化及变易,不再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再生,确认它已变质和崩解。从此,她把目光集注于工农大众,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她认为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确定了工农阶级的地位,

“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她把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的奋起,视为民主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认为“全国工农参加革命”才能使“革命具有生命力”,坚信“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宋庆龄从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出发,终于科学地确认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革命主力军。这对曾在西方民主主义的熏陶下成长的宋庆龄,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深刻转变。

土地革命时期,宋庆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有着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并且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总目标调整斗争的步伐和策略。她在1927年9月访问苏联时于莫斯科发表声明,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的决策给予了热情的回应和坚决的支持。她高举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旗帜,把握住民生主义核心问题——土地问题与实现耕者有其田,加以丰富和阐发,号召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支持和投入土地革命。这样,宋庆龄便将孙中山作为社会经济改革纲领的民生主义——他曾经将这种经济改革称之为“社会革命”——发展成为“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的完全意义的社会革命纲领。确信中国社会革命应该是“要把中国的广大群众从外国帝国主义、从国内军阀和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革命,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中国革命刚刚进入由中国共产党独力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土地革命的初始阶段,宋庆龄便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土地革命表示深刻的理解和积极的支持,这正是宋庆龄忠实于爱国主义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必然表现。

30年代初,宋庆龄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她已经完成了自我超越,从旧民主主义跨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范畴,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她以新的思想与风貌,迎向新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风暴。

宋庆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活动,是她的政治生涯中“最突出的一段”。她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不畏强暴,不徇亲情。她坚决反对新军阀的统治,从不停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她尊崇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积极支持土地革命。她继承和捍卫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对歪曲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的各种伎俩予以揭露与回击,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并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凝聚了广泛的进步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她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革命斗争,争取国际友人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同时,她也积极投身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至于妇女运动和少年儿童的保育、教育事业,始终为她所关注。在此期间,她备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中伤和打击,身心遭到摧残,甚至生命危殆。来自革命队伍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态度,更使她感到痛楚和困惑。然而,“在风雨飘摇的30年代,她艰苦奋斗,如千丈巨岩,顶着一浪高似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和媚外政策,使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的大地。当中国面临沦为日本殖民地厄运的时候,宋庆龄认为实现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标志就是“要抵抗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阀”。民族危机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促使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抉择:“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在促成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民族解放战争过程中坚持团结、进步和抗战,反对分裂、倒退和妥协等方面,完成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抗战的全过程中,宋庆龄不断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进行阐发,使其成为促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之一,起到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重要作用。同时,她在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从事的斗争中,总是密切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总目标,为促其早日实现而奋斗。她更以自己在海内外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广泛地宣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实绩,并阐明它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努力在中国和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之间架设相互支持的桥梁,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积极争取各国和各方面的援助,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不朽的贡献,不愧为英勇的民族斗士和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临近,国民党统治集团越来越把力量放在反共和反对国内其他民主力量方面。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为实现和平建国作了巨大努力。宋庆龄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则成为她动员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实现人民民主的武器。她坚决反对罪恶的内战,认为“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解决的办法就是“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运用它。”宋庆龄尖锐指出:“国民党必须通过联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执行它的历史任务”;否则,“就是负担掀起内战的责任”。宋庆龄的声明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理论,使它与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关于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相一致。这个声明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的反响,推动了国内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的高涨。当蒋介石将中国人民推入内战的血海的时刻,宋庆龄更以全部热情和力量投身

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斗争。她在自己熟悉的战线上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经历了三年的奋战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使宋庆龄深感快慰的是,由于新中国的诞生,“使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可靠的保证”。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使得“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宋庆龄以她近40年的光辉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从事了大量的国务和社会活动,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中山和宋庆龄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他们对人民的真挚深情,他们对革命的“不息的热忱”,他们“愈挫愈奋”的坚毅意志,他们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格,他们对人类进步事业的执着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芒,辉耀着人们前进的道路,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

(原文约1.7万字,发表时作了删节)

作者张磊,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510620);盛永华,中国文物研究所;萧润君,孙中山故居博物馆馆长(528400)

责任编辑:郭秀文

# 美国西部土地立法

与

# 农业的资本主义化

□何黎萍

美国是一个未经历过封建社会的移民国家,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对西部的开发。美国政府的西部土地立法政策对推动西部土地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迎来了大批移民西进垦荒,造就了无数自耕农。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土地投机者、大商人以及资本家的大土地所有制对小农的剥夺和小农之间的竞争机制,导致了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出现了资本主义大农场,形成了农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过程从独立战争时起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长达一个多世纪。美国西部土地立法与西部土地开发互为一体,可以分为有偿分配国有土地与农业资本主义产生、无偿分配国有土地与小农土地所有制、小农转变为农场主和雇佣劳动者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互相衔接、互

相交织,构成了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全过程。本文立足于对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考察,论述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与美国西部土地立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力求说明这一过程在奠定美国强大的农业、乃至在奠定后来美国的全面强盛地位中的重要意义。

一、有偿分配国有土地与农业资本主义的产生

铲除殖民时代封建土地制残余,是美国对农业封建所有制实行资本主义改造的第一步,也是确立西部土地立法的先声。封建残余是指东部13州的大地产制、割让租和长子继承制。1777年11月,美国大陆会议通过了没收英国王室、英国国教教会、前殖民地业主以及贵族大批财产和土地的法令。这不仅铲除了13州的封建大地产制,更重要的是政府通常将没收来的土地分成不超过500英亩的土地出售给私人。这就在封建大地产制的废墟上首次出现初具资本主义特征的中等土地所有制。1786年和1791年又先后废除各地的割让租和长子继承制,农民们每年大概可以免交10万美元的地租,<sup>①</sup>从而为农民的自由迁徙创造了机会,为农业资本主义化创造了条件。

西部土地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所有土地。独立战争后,随美国领土扩张而逐渐形成。独立战争前后的西部土地,仅指阿巴拉契亚山脉至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土地,又称老西部。当时这里是一片无人耕种但资源丰富的荒地,只有少数印第安人居住于此。早在革命前,少数农民因不堪忍受各殖民州政府的压迫,不顾英王收归王室所有和禁止北美殖民地人民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居的种种法令,向西迁移,拓荒定居,成为最早的“非法”占地者。独立战争爆发后,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向绿山地带移居的人逐渐趋多。这就引发了各州对西部土地的争夺。1780年10月,大陆会议正式通过一项关于邦联土地的决议,其中有些政策在美国历史上成为永久印迹,影响到土地立法的历史走向:“凡可能割让或转让与合众国的尚未分配使用的土地——其日后的处理应符合于合众国的公共利益,在那里安置移民

而组成的各个共和制州,应成为邦联的成员,并应享有与其他州相同的主权权利、自由和独立。”<sup>②</sup>后来形成的各州接受了当时虽无实权的邦联国会的决议。1783年英美签订《巴黎和约》,美国联邦政府从事实上拥有了这片西部土地,它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公共土地。但是,按照何种原则来制定具体处理这片土地的方案,在当时又出现矛盾,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见。以杰弗逊为代表,希望建立小农土地所有制,构造一个小农社会,反对公共土地的有价出售。他代表了传统的农业势力。以汉密尔顿为代表,则主张出售土地,以增加国库收入,偿还国债。他代表了工商业集团的利益。这两派观点实质上反映了美国农业是走小农社会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影响到以后美国西部土地立法,使立法表现出一种兼顾农业集团利益与工商业集团利益的土地分配原则。在这一原则下,美国农业沿着两条道路发展,而资本主义最终克服了小农社会倾向,确定了美国农业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

1784、1785和1787年的土地法虽是由杰弗逊草拟、提出或受其影响制定的,但却体现出上述原则。1784年土地法是1780年邦联土地决议的延伸,它再次申明了西部土地必须是美国全体人民的公地,并具体规定西部建州的原则。1785年土地法则规定西部公共土地的测量方针和出售土地的方法。1787年《西北法令》是前两个法令的补充,最后明确了西部建州的具体方式。

以上三个法令确定了公共土地国有化及有价出售的原则。它虽然导致了对土地的投机,但它所建立的早期大土地所有制和国有化土地,构成了美国西部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因为国有化可以彻底消灭土地上一切人为的壁障,使土地变成真正自由的土地,农民才感到有获得土地的希望,土地投机家及工商业集团才愿意向西部发展,使西部得以开发。同时,国家掌握土地,创造了向土地自由投资的条件,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然而,土地国有化与资本主义农业之间

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全建立还有待于对西部土地的进一步开发。这就要取决于联邦政府土地立法政策的正确导向。要使西部得到全面迅速的开发,在当时还要依靠在西部建立小农自由土地所有制。虽然它不是直接意义上的农业资本主义,但可以在这里形成自由竞争的场所,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应有的生长环境。相反,如果只推行有利于大土地所有制的立法,就不能使西部得以迅速开发,从而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开始,联邦政府并未认识到小农自由土地所有制对农业资本主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政府中代表工商业集团利益的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等人的观点在较长时间左右着联邦政府的土地立法。1796年的《公共土地法》较为明显。它不仅规定出售公共土地的最低单位面积仍按1785年土地法规定的640英亩,而且每英亩售价由1美元提高到2美元。地价一半付现款,另一半作为一年信用贷款。这项法案遭到包括西北部、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农民和工人的强烈反对。国会不得不在1800年修改土地法案,实行信贷制,并将出售土地的一个单位面积减少到230英亩,每英亩售价仍为2美元,地价在四年内分四次付清,过期未交清地价者,所购土地没收。此地价也只有较富裕的农民才能支付。但它的确对人民作了一些让步,是美国土地立法迈向民主的开端。

1803年,美国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娜,面积达210万平方公里,急待开发利用。但由于受美国土地立法政策的影响,能够移居西部的人并不多,且限于富裕阶层。按1803年杰弗逊的计算,以当时的移民速度,密西西比河以西住满正常数量的人口需要1000年。这无疑严重影响了对西部的开发,束缚了整个美国经济的发展。为此,美国政府在1804年再次放宽条件,把出售土地的最小单位降到160英亩,每英亩售价2美元,分五年偿还。结果公共土地的出售面积有了较大增长,但却导致了1819年严重的土地投机热,严重影响了政府财政。1820年,美国政府紧急通过新地法,取消了信贷

制,购买土地的最小单位减至 80 英亩,每英亩价格降至 1.25 美元。这一法案的实施又导致 20、30 年代贫民在西部自行“占地”运动的盛行。为此,1832 年,政府再次把出售土地的单位面积降到 40 英亩,每英亩售价仍为 1.25 美元,用现金支付。政府希望通过这一办法来满足西部土地占有者的要求,达到开发西部的目的。但由于售价仍偏高,又要支付现金,一般劳动者仍然负担不起。1841 年,美国政府颁布了表面看来有利于西部拓荒者的法案《优先购买权法案》,规定:当政府出售土地时,允许原占地者以每英亩 1.25 美元的最低价格优先购买其占据的土地的权利,条件是占地尚未超过 320 英亩。这一立法首次承认了拓荒者的优先权,鼓励移民西进拓荒。但它实际仍体现着东部工商业集团的意志,即政府收取的地价仍超过一般小农的购买权,大部分贫苦农民和东部因失业而西进的工人还是买不起土地。同时,政府还把大量土地赠给运河、铁路公司,土地投机也很活跃。西部一般移民仍不得不从投机商手中高价购买或租种土地,进而沦为他们的佃农。显然,尽管政府土地立法一次次降低土地售价、缩小售地单位面积,仍无法解决农民获得土地的问题。其根本症结就是土地的有价出售。毫无疑问,只有土地的无偿分配,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自 19 世纪 20、30 年代起,西部移民就提出无偿分配国有土地的要求。进入 40 年代,这一呼声日趋强烈。后来,这种要求引起了国会内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西部议员的注意。从 1842 年起,他们就开始提出接近无偿分配国有土地的法案。1846 年,安德鲁·约翰逊首次提出无偿分配土地的法案,但因遭到东北部和东南部议员反对而未被通过。

## 二、无偿分配西部国有土地与小农土地所有制

从 1803 年至 1853 年的 50 年间,美国采用武力和欺骗性购买等手段,从印第安人、墨西哥、西班牙、英国手中夺取了大片土地,先后吞并佛罗里达、得克萨斯、俄勒冈、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和加兹登,使美国领

土从 440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777 万平方公里。大片西部国有土地的扩张,引起了人们西进的洪流。新州的体制问题便成为当时各方面利益冲突的焦点。南部奴隶主要求在西部建立奴隶制,西部和东北部则要求建立自由州。早在 1820 年密苏里妥协案中关于新州体制的冲突就表现出来。随后,1850 年“妥协案”和堪萨斯内战等使这一问题日益激化。反映在土地问题上,就是两大集团关于是否彻底改变西部土地立法原则、实行无偿分配土地法的争论。从 50 年代后半期起,两大集团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东北部转而支持无偿分配土地的立法,南部奴隶主集团则坚决反对无偿分配土地。态度变化的结果,使反对派在参议院中占优势,赞成派在众议院中占优势。所以从 1852 年至 1859 年五次提出无偿分配土地法,均被参议院和总统否决。

1861 年南方奴隶主集团主动退出联邦政府,挑起内战,终于打破这种僵局。1862 年 5 月 6 日,林肯政府终于通过并颁布了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法案《宅地法》。它不仅实现了小农长期以来盼望和争取的无偿获得土地的愿望,而且奠定了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的基础,成为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化的最重要一步。该法迎来了西进运动的高潮,如:1860—1900 年,进入美国的移民有 1400 多万,其中大多流入西部,仅 1870—1880 年流入明尼苏达州就有 116500 人。<sup>③</sup>据统计,实施《宅地法》期间,有近 200 万农户无偿获得宅地,其土地面积达 28300 万亩。<sup>④</sup>一大批自耕农应运而生,自耕农的增加,不仅使耕地面积迅速扩大,也使新农场迅速增长起来。从 1860 年至 1900 年,全国农场数从 200 万个增加到 600 万个,其中近 70% 是西部农场。<sup>⑤</sup>在此基础上,《宅地法》造就的宗法式小农经营的自由经济,随着西部农业的发展和东部工业革命的完成,逐渐向商品经济演变。

商品经济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前奏,是农业资本主义化很重要的一环。西部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早在《宅地法》之前就已开始,不



过,当时商品化速度很慢。《宅地法》实施后,西部得到迅速开发,宗法式小农经济商品化步伐加快。南北战争前,东部大西洋各州是农作物的主要产地,但战后就迅速改变。以玉米为例:到1869年,全国10个主产玉米的州,其中8个产量最多的州居西部。棉产中心、小麦主产区、主要牧区等移居西部,西部已成为全美农业基地,生产着全国绝大多数农牧产品。他们除满足自己消费外,还有大量剩余产品,为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这时,大西洋沿岸工业革命的完成,加大了对农牧产品的需要,东部工业品也急需扩大销售。同时,南部由于单一种植园经济的后果,也需要西部的粮食。交通运输又得到改善,于是西部农牧产品被大批运输出来,东部大批价廉物美的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运销西部,货币需求日益突出。这样,19世纪中期以前那种拓荒农场主生产绝大部分自给产品的现象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到19世纪后期,这种农业商品化水平已达到较高程度。结果使宗法式小农经济开始走向两极分化,西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成为全美农业发展的榜样。

但是,《宅地法》所造成的商品经济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该法所确定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还没有普及到西部所有地区。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就不可能使美国农业全面迅速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鉴于此,从60年代起,历届美国政府便不断强化和扩大无偿分配土地的原则。1873年颁布的《育林法》规定:凡愿植树40英亩(1878年改为10英亩)者,除宅地外,可再获160英亩的土地。为了把无人垦种的荒地也利用起来,1877年国会通过《垦地法》,规定大平原地区,每个移民每英亩先付0.25美元,就可占地640英亩,但必须保证三年内对其中一部分荒地进行灌溉,经有关部门检查合格后,再补交每亩一美元的地价,就可正式取得土地所有权。此外,政府针对那些不适合耕种,但能采伐木材和开采石料的土地,于1870年颁布了《木材和石料法令》,申请人可按每英亩2.50美元的地价购买160英亩

的土地。1906年又颁布《森林宅地法》,规定:对森林地带可以在不伤害森林的情况下占用。这大大推动了对西部森林地带的开发。同时,政府考虑到160英亩的宅地面积已不再适合农田耕作,1909年又颁布《扩大宅地法》,允许移民在大多数西部州可以占据320英亩的宅地面积。到了20世纪初,美国西部所有良好的可耕地差不多已占完,剩下的多是一些偏僻、贫瘠、干旱的土地。为了加快对这些地区的开发,1912年,政府颁布《三年宅地法》,规定:移民在三年中,每年只需住六个月,就可无偿获得土地所有权。为加快西部畜牧业生产,1916年国会又通过《牲畜饲养宅地法》。这些法案的推行,使美国再次出现宅地热,到1923年,宅地面积达3565万英亩。⑥

如果说《五年宅地法》最终奠定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的基础,那么,以上法案,特别是1909年的《扩大宅地法》和1912年的《三年宅地法》则迅速将这条道路推广到最偏远的地区,为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铺平了道路。

### 三、宗法式小农转变为农场主和雇佣劳动者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确立

如前所述,《宅地法》的实施造就了一大批独立的自耕农,实现了杰弗逊所希望的自由小农土地所有制,美国农业的发展似乎走上了小农社会道路,这与美农业资本主义化不符。但实际上,《宅地法》所确立的自由小农土地所有制,不仅没有阻碍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克服了小农社会倾向,将农业更快地引入资本主义轨道,使农业迅速资本主义化。

首先,获得宅地的小农多是贫苦劳动者,由于缺乏资金,往往无法自主经营自己的土地。据估计,一个西部宅地农要运作160英亩的宅地,第一年至少投资1000美元。为此,他们不得不借款。向小农贷款的高利贷商人、东部资本家、银行家等都要小农以其部分土地为抵押。因为借贷利息高,小农经营的小块土地收获量又少,加之生产技术和工具落后等因素,小农往往无法按期偿还借款本息,于是债主就没收他们的抵押

地。1889—1893年,仅堪萨斯一州就有约11000起农民抵押地被没收事件。<sup>⑦</sup>债主将兼并的土地集中起来,租给一些有钱的大农场主或富裕农民,他们便雇佣劳动力来生产,于是在抵押农户土地上出现了资本主义大农场。大部分抵押农户就这样一次次丧失土地,直到最后丧失所有土地。丧失土地的农民有的沦为佃农,有的沦为农业雇佣劳动者。此外,也有少数较富裕的宅地农,因占有信息、技术、交通等优势,农业生产取得成功,收回了抵押地,进而扩充农场,雇佣劳动力生产,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主。

其次,免费分配的宅地有相当部分是次等、贫瘠、偏远的土地。由于土地位于偏远地区,在投入资金、信息、运输、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不利,所以他们一方面借款很多,另一方面又无法扩大经营,根本无力与其他小农竞争,最终难免破产的命运。

最后,《宅地法》本身还带有不少弊端:一是政府分配适合农耕的土地较少,使宅地农很难靠农业维持生计。二是《宅地法》实施时还附有一个折偿条款,为土地投机大开了方便之门。该条款规定:允许移民在宅地上住满六个月后,只要每英亩付现金1.25至2.25美元折偿费,就可提前获得土地所有权。“折偿条款成了国有土地以惊人的速度转到大公司掌握中的手段”,<sup>⑧</sup>造成土地集中和宅地农破产。许多银行家、土地投机家成为土地拥有者。他们把土地高价出售或出租给富裕农民,从而又诞生出一批大农场主。

以上表明,《宅地法》本身就带有促进土地兼并,加速农民两极分化的因素。因此,它的实施结果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农场的建立和雇佣劳动者的形成。

总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农场大量涌现,形成了一个人数颇多的农业资本家阶层和庞大的农业雇佣劳动大军。据统计:1860—1900年,美国的耕地面积增加到二倍,农场数目也增加了二倍,其中

500英亩以上的农场已有十几个。到1909年,落基山区各州雇佣工人的农户占总农户的46.8%,太平洋各州雇佣工人的农户占58%。<sup>⑨</sup>通过列宁在《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中对各种类型的农户数目和生产数量在整个国民生产中所占份额的分析可以看出,1900年美国农产品总数的一半以上,是出自占全国农户总数1/6的100万资本主义性质的农户;全国雇佣农业工人总开支的69%就是由这类农户支付的。<sup>⑩</sup>可以确定,经过美国历届政府长期制定和实施《宅地法》等一系列土地法案,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终于在美国农业生产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

①Ernest·L·Bogart:《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 1959,第205页。

②莫里森、康马杰等主编:《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4—295页。

③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3页。

④希巴德:《公共土地政策史》,纽约1924年版,第100—106页。

⑤Bartlett:《The New Countr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New York, 1974,第212页。

⑥希巴德:《公共土地政策史》,第398页。

⑦菲特和里斯:《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0页。

⑧转引自杨生茂、林静芬:《美国史论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

⑨转引自赵小平:《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刍议》,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第25页。

⑩《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7—91页。

作者何黎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  
(100872)

责任编辑:郭秀文

# 试论海洋文化优势

## 与

# 广东滨海城市建设

□林炳熙

中国是一个有着广阔内陆疆土(包括高山、高原、丘陵和草原)的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有着1.8万公里海岸线、5000多个大小不同的岛屿和3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的海洋国家,是太平洋沿岸的大国。但是,人们在论及中华文化的类型时,一般都认为中华文化是内陆型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统称农业文化,极少提及海洋文化。一些论及海洋文化的著述,往往也将海洋文化归于西方文化,或称之为西方文明、蓝色文明,而将中华文化(东方文化)称之为黄土文化、黄色文明(东方文明),甚至隐含着西方文明进步、东方文明落后的意味。这无论从概念和内涵来讲都是存在偏颇的。就整体上文明的发展阶段而言,我国确实长期间地处于农业文明阶段,至今仍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期;但就文化的存在类型而言,有5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大系中,既有内陆型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也有处于边缘地带的海洋文化。内陆型文化基本上属于封闭式的封建主义文化,而处于边缘地带的海洋文化则呈现出有别于封建文化的开放性、商业性等特征。细究悠久的中华文化史,人们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 一 中华海洋文化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

翻开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人们可以发现一个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改朝不换制的现象。表面看来,两千多年间封建社会的每

一次政权变易和朝代更迭都轰轰烈烈,动地惊天,但主导这种权力变易、朝代更迭的文化因素都是以内陆型农业文化为基础的封建文化,因而当权力更迭程序一完成,掌权者在恢复和重建其统治社会的典章法规时,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封建主义的价值取向、思维观念,结果是朝代换了一个又一个,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观念却代代相传,封建的社会制度却依然如故,腐而不朽。

本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则导致了另一种结果,不但结束了清朝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而且结束了连绵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何故?还是文化因素——中华海洋文化使然。

众所周知,早在两汉时期,中国就开通了向海外发展经济贸易的海上通路,到了唐宋元三代,这条先后以广州、泉州为起点港的海上丝绸之路四通八达,中国通过这条海路与几乎遍及全球的国家社会进行的通商贸易,持续发达、繁荣了近12个世纪。这一人类历史上奇迹般的经济贸易现象,既是中国航海技术和海上交通发达的生动体现,更是中华海洋文化悠久历史和光辉业绩的明证。

明末清初,岭南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手工业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商业贸易趋向繁荣,墟市交易兴旺发达,农业也开始了商业化的进程,广州、佛山成为全国商贾云集的南国著名商城;康熙平定台湾后大开海禁,岭南地区特别是广东的海外贸易迅速恢

复和发展;随着出洋谋生、海外移民的增多,海外华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成为岭南地区与海外社会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联系的重要渠道和纽带。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国家陷于“亡国灭种”的危机,接着便是中西文化交流接触的加深和碰撞的加剧。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岭南地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发生变化。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以爱国思想为特征的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林则徐“师夷之技以制夷”和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就是这一时期爱国思想文化观的代表。据此,无论从文化结构的表层或深层看,这一时期的岭南文化都与内陆封建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浓重的商业色彩、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和对海外社会的开放性,就文化的类型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岭南文化就是海洋文化,而且是中华海洋文化的代表。辛亥革命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加上孙中山本人从小接受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在他的文化观里有着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因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导致封建帝制的结束、资产阶级共和体制的建立是顺理成章的事。

以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为标志的中华海洋文化取代中原封建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主导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海洋文化在其曲折的发展路程上一次突破性的进展,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二 当代中华海洋文化及其特征

伴随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中华海洋文化也得以形成和发展。但是,如同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经济贸易曲折的历程一样,中华海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和备战体制,不但导致从两汉至元代繁荣昌盛了近12个世纪的中国海上对外经济贸易终于走向衰败,也几乎窒息了中华海洋文化的生机,清末得以逐渐复兴并于本世纪初取得主导地位的中华海洋文化本有一次很好大发展的机会,却由于孙中山的过早逝世而失去主导地位;接下来便是日本

帝国主义的入侵和4年内战,中华海洋文化由于外患内忧而复兴乏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海洋文化本该及早再度勃兴,又由于闭关锁国政策和极“左”路线的实施而深受其害,至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华海洋文化才得到几乎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再度勃兴。18年来,中华海洋文化也不负时代的期待,在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总路线中,发挥了重要的文化因素的作用。

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和实施,是中华海洋文化勃兴的契机,也是界定当前我国文化类型的依据。当前我国是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并存,海洋文化相对比较活跃。以社会主义思想观念为主导,是当代中华海洋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它表明了当代中华海洋文化的时代背景,规范着当代中华海洋文化的社会属性和方向。在这一本质特征的主导、规范下当代中华海洋文化还具体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1. 开放性。如同一般海洋文化一样,中华海洋文化本身就具有开放的特性,以往只是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使得这一开放性受到压抑罢了。如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当代中华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创造了政策环境和条件,启开了当代中华海洋文化的窗口和门户。当代中华海洋文化正在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与域外异质文化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和接触。

2. 多元性。中华海洋文化尤其是岭南地区的海洋文化历来就是一种多元性文化,在性质、类型、层次等方面都存着多元性。如今在开放政策的大环境下,中华海洋文化的多元性显得尤为突出。例如,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主导文化是毫无疑问的,但封建传统文化由于根深蒂固的影响力而继续存在,改革开放需要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于是又进来了资本主义文化。另一方面政府一向保护历史上各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层次间形成并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不同类型的文化,因而,当代中华文化可以说是多种多样,色彩斑斓。

3. 兼容性。文化的兼容性与文化的开放性是密不可分的,开放性必然导致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接触。不同质文化的交流和接触就免不了发生摩擦和矛盾,甚至发生严重的碰撞和对抗。当代中华海洋文化在与域外异质文化的交流、接触和碰撞中所表现出的兼容性主要体现在胸襟的开阔和气度的宽和上,对各种异质文化中华海洋文化都能与之和平共处,并在共处中吸其营养,斥其糟粕,充实自我。

4. 商业性。商业性是一般海洋文化共有的基本特性。中华海洋文化,在精神层面,表现在时下人们普遍具有强烈的商品意识,社会价值取向向经济效益倾斜,社会行为的目标指向也偏重经济效益,等等。在物质层面,则表现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活动的商品化,现在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以商品的形式进行交易的,甚至不少社会活动也要讲经济效益和体现以某种物质作交易。

5. 开拓性。开拓性可以说是海洋文化的本性。由于长期间的闭关锁国政策,当代中华海洋文化的开拓性曾长期间地受到禁锢,如今国门一开,经济体制呈现外向型,国家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要与世界上所有国家、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长期来受到压抑的开拓性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发挥,人们向新领域开拓进取的意欲表现尤为强烈,开拓创新几乎成了当今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的时尚。

### 三 海洋文化与广东滨海城市的崛起

当今世界上习惯于把发达国家称为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也就成了现代化的代名词。而实现工业化又必须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作为工业的载体,于是实现城市化便成了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城市化实际上成了当今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也成为发展中国家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广东地处祖国南疆,面对浩瀚南海,有着 3386 公里长的海岸线,近 800 个面积大小不等的岛屿,100 多个大中小港口,还有辽阔的管辖海域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广东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中华海洋文化的兴起提供了优良的土壤,使广东在两千多年前

就成为中华海洋文化的发祥地。秦汉时期,从广东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等地通往马来半岛和印度等地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意味着中华海洋文化的兴起和形成,接着广州(番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启发港市,则标志着广东城市建设的开端。由此,两千多年来广东的城市建设和发展便与环境和海洋文化密不可分。经过两千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18 年以来的建设,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无论从数量、规模看都有了迅猛的发展,城市化的速度加快,到 1993 年底,有建置市 38 个,其中地级市 20 个,县级市 18 个。作为全省中心城市的广州粗具国际大都市的规模,正在扎扎实实地进行国际大都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的深圳、珠海两市,仅用 16 年时间就建设成为国际闻名、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都市,不但生产力水平发展迅速,文化设施建设齐全,还为下一步更大规模发展打下了基础。城市的布局也相对合理,呈现出一体两翼、展翅高飞的架势。一体是以广州为中心城市,以深圳、珠海为窗口、门户城市,以佛山、江门、中山、东莞、惠州等中等城市为卫星城市,组成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群经济迅速的发展不但在国内受到中央的肯定,在国际上也备受瞩目。两翼则分别是以粤东的汕头、潮州和粤西的湛江、茂名及其周边城市组成的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群。再加上韶关、梅州、河源、清远、肇庆等内地城市,广东的城市化在布局上展现出喜人的前景。

从历史和形成过程看,广东城市化建设有两大特点:一是滨海。广东的大都市和大多数中等城市都建在海边和珠江出海口的江边,这自然与广东的地理环境有关。二是与海洋文化密切相关。广东的城市(广州市)是中华海洋文化的发祥地,海洋文化是广东城市崛起和成长的乳汁。两千多年前,广州与中华海洋文化同一时辰在中国南海之滨诞生和兴起,随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中华海洋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也在不断扩大,而广州则发展成为广东乃至



华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际著名的大都市。可以说,在漫长的成长发展历程中,中华海洋文化既是哺育广州成长的乳汁,也是结伴同行的伙伴,风雨同舟两千余年。作为当代广东新崛起滨海城市的“龙头”,深圳与珠海更是吮着当代中华海洋文化的乳汁“一夜间”从边陲小镇成长为世界闻名的大都市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华海洋文化是广东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母乳,也是当今乃至今后广东在城市建设中精神文化的优势之所在。

#### 四 发挥海洋文化优势 加速滨海城市建设

中华海洋文化对广东滨海城市的崛起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继续发挥海洋文化的优势,而是应该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海洋文化的优势,以加速滨海城市特别是新兴滨海城市的建设。

首先,应继续增强和发挥当代中华海洋文化的巨大活力。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和实施,尤其是中央决定广东先行一步,作为全国综合改革开放的试验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大力吸引外资,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华海洋文化显示活力提供了舞台。在今后的城市化建设中,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路线,不但是新兴滨海城市健康生长的关键,也是保持和发挥海洋文化活力的标志,是发挥当代中华海洋文化优势的保证。

其次,在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主导下,加强海洋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增强全社会的海洋意识。这不但是贯彻实行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需要,也是适应广东城市建设特点的需要。强烈的海洋意识是增强海洋文化在城市建设中的活力和发挥关键作用的内在动力,因此,应该把培育和增强海洋意识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

第三,以战略的眼光着眼于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广东省委作出了建立一个“海上广东”的决策,这不但是极具战略眼光的表现,也是海洋文化巨大活力的体现。改革

开放以来,广东滨海城市引进了大量外资,但其建设项目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以陆地资源为原料的,以海洋资源为原料及海洋开发性的项目不多。而滨海城市如深圳、珠海等,其资源优势恰恰就在海洋而不在陆地。因此新兴滨海城市今后把引进外资的项目建设更多地转向海洋项目的开发与海洋资源的利用,有着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四,以更加开放和远大的目光进行滨海城市的港口建设。港口是滨海城市的标志,港口的规模和现代化水平更是滨海城市国际地位和发展远景的标志。深圳、珠海是广东当代崛起的滨海城市的代表,都有着建设现代化优良港口的自然条件,从城市现代化基础设施看,港口建设应是重中之重。深圳包括盐田、蛇口、赤湾、妈湾、东角头等港区在内的港口年货物吞吐量至90年代初仅2000万吨左右,而同期香港港口的年货运量则近9000万吨,如果深圳能在港口建设上有较大的进展,不仅将有力地带动自身的现代化建设,而且将对全国的对外贸易做出更大的贡献。珠海市的港口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但珠海是广东具有建成“东方鹿特丹”环境条件的港口城市,人们期待着这一宏伟目标的早日实现。

第五,加速滨海城市农业商品化的进程。新兴滨海城市都有一定数目的农业项目和一定数量的农业耕地,特别是珠海市,农业项目和耕地面积均占有较大的比重。因此,引进商业机制,加快农业的商品化进程,对实现新兴滨海城市的工业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不但是个陆地大国,也是个海洋大国,中华文化大系中有内陆型的农业文化,也有外向型的海洋文化。中华海洋文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哺育着滨海城市的崛起和成长。近百年来,中国在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东南部沿海地区发展快于内陆的中西部地区的趋势,甚至出现在经济建设上取得耀眼全球成就的地区和国际化大都市,其中不乏海洋文化这一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当代中华海洋文化表现出巨大的活力。

# 清前期的岭南建筑

□陈泽泓

清代康、雍、乾时期,是岭南古代建筑取得灿烂成就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岭南建筑,在种类上得到空前的扩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地方特色渐趋明显,从一个角度透视了这一时期岭南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

## 一、城镇建设

### (一)原有城市城区突破墙垣限制而扩展

清代城市的城垣已基本固定下来,但有些城市城区则突破原有城垣的局限,向城外扩展。以岭南中心城市广州为例,城区向城垣外的西、南方向扩展。西门外西关,明末已渐形成十八甫商业区。清代,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在西关大片形成,同时也兴起大片民居。广州河南,直到明中叶仍人烟稀少,明末清初则形成了与城区隔江相望的市镇。兴建寺观、园林更为一时风尚。

### (二)新兴城市展示了中国封建城市的新模式

在广东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佛山是唯一未筑过城墙的。清代,由于经济的发展,佛山成为岭南的中心市场。乾隆年间,户数增加到3万余家,市面上“商车洋客,百货交驰”。从乾隆至道光年间,佛山成为周遭三四十里的繁华大镇,城区形成手工业、商业和住宅区三大区划,全镇工商店号在3000家以上,街巷从233条增至596条,城

内有6个墟市。佛山城市经济在康、雍、乾三朝达到鼎盛,与汉口、景德、朱仙镇合称天下四大镇。这种新兴的市镇,打破了传统的“先政治、后经济”的郡县城市发展模式,此后,也没有转化为郡县城市,而是依据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演进,开辟了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新道路。

### (三)农村集镇的大量兴起

由于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和人口分布趋向均衡,集镇的数量迅速增加。潮汕平原潮州府七县,康熙时墟市仅32个,至乾隆时增至112个。圩市的发展,不仅使原来许多设备简陋,没有固定店铺的圩市以及一些新建的圩市大都有了固定的店铺,而且有些更发展为城镇。如顺德的陈村、番禺的市桥、东莞的石龙、香山的小榄、四会的隆庆、高明三洲市、会同(今海南琼海)的嘉积市等。

## 二、公共建筑与宗法礼教

### (一)祠堂

宗祠是宗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宗族的象征。岭南的宗祠建筑比其他地域为盛。步入封建社会之后的岭南居民,很大成分为移民或移民后裔,聚族而居是保留原有文化方式及加强安身创业能力的重要手段,宗祠成为维系宗族的重要场所,因此“乡中

我们应该更好地发挥当代中华海洋文化的优势,加速广东滨海城市的建设。

我们的内陆文化研究的纵向追溯和深化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和进展。对海洋文化的研究似乎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世纪之交,无论从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是从科技的进步和发展看,人们都更多地把眼光转向

海洋。这几乎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趋势。我们的文化研究如果也能在这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作者林炳熙,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510620)

责任编辑:罗 苹

建祠，一木一石，俱极选采，在始建者务求壮丽，以尽孝敬而肃观瞻”，《佛山忠义乡志》卷五）较大的祠堂“土建龛堂，所以安神主而序昭穆也；中树厅事，所以齐子孙而肃跪拜也；前列回楼，所以接宾朋而讲圣旨也；左右两庑，所以进子弟而习诗书也”。祠堂创始于宋代，但其大事兴建和大规模扩建，则多在清代。据开平县 1982~1984 年普查，全县尚存祠堂 446 座，清代占了 340 座。在清代建的这些祠堂中，占地面积为 200 平方米以上的祠堂有 240 座，大者达一二千平方米。潮安浮洋一镇，尚存宗祠 94 座，其中清代建的占 65 座。佛山镇内现存的 92 座祠堂中，清代建的有 80 座。清代祠堂并非都是建于康雍乾朝，但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实力的鼎盛，是建祠之盛期。番禺沙湾留耕堂，始建于元代，康熙三年禁海移民时奉诏拆毁，禁令解除后，康熙三十九年（1700）扩大重建，至雍正十二年（1734）全部落成。建筑规模居番禺四大名祠之首的善世堂，则重修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这一时期也建有一批名贤祠，如为奉祀力谏朝廷解除迁海禁令，为民解困的广东巡抚王来任，各地民间兴建了报恩祠、报德祠、王大中丞祠等，反映了“迁海令”对沿海民生的祸害。

## （二）会馆

会馆产生于明末，初时是寄居京都的同乡为谋求共同福利而组织的社团及兴建的活动场所，渐而演变为同乡或同行业者的联络机构，起着祭祀议事、沟通信息、调解纠纷、照顾贫病乃至娱乐消遣、寄宿读书等多种功能。随着商帮的出现，会馆成为商帮形成和发展的标志。广东商帮建的会馆，有广州帮（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各县商人组成）建的广州会馆和潮州帮（主要是粤东商人组成）建的潮州会馆。康熙十一年（1712），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四县商人在汉口合建会馆。明代始建于金陵的潮州会馆，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迁往苏州吴县阊门外，“因基址未广”，四十七年（1708）又迁往苏州上塘。从康熙至乾隆年间，苏州潮州会馆的产业达银 30665 两，在当时苏州近百所会馆中占第

二位，会馆内还设有天后行宫、韩夫子堂。北京潮州会馆建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址在琉璃厂延寿街北头，由苏州潮州会馆出银 1000 两所买。苏州潮州会馆的戏楼、馆门气派非凡，堪称一流。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有关史料记载苏州潮州会馆的建筑是“列层五楹，为殿者一，为阁为台者一。闲阔高敞，丹 翠飞”。

## （三）书院、学宫

清代重视儒学，书院在明末衰歇之后又得到恢复发展。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颁旨建立省府书院，各省为 1 所，唯苏、湘、粤、桂各为 2 所。省府书院是指定已有的名书院加以修葺增建。广东两所是广州粤秀书院和肇庆端溪书院。有清一代，广东有书院 559 所，海南 39 所，数目以广府、潮州、肇庆、琼州、雷州为多。在广州，越华、羊城、应元、粤秀为著名的四大书院，其中越华、羊城、粤秀书院皆兴建于康、雍、乾时期。省内著名的有倡建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镇平桂岭书院、三十三年（1694）的惠州丰湖书院、四十五年（1710）的琼山琼台书院；倡建于雍正十年（1732）的肇庆端溪书院、大修于雍正十二年（1734）的潮州韩山书院；倡建于乾隆十一年（1746）的梅州东山书院、五十四年（1789）的南海三湖书院、兴建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揭西“三近轩”书院、三十年（1765）的云香斋、雍正八年（1730）的鸿溪书院、乾隆二年（1737）的琴峰书院等。清代不但对原有学宫进行修建，而且新建、重建了一批学宫，气势宏伟、规模壮观，成为地方规格最高的庙堂建筑群。其中突出的有创建于南宋的广州番禺学宫，于清乾隆年间平基重建，广三路、深五进，规制完备。现存较为完整的有康熙六十年（1721）重建的普宁学宫，康熙五十一年（1712）重建的恩平学宫，嘉庆五年（1800）重建的阳江学宫，乾隆十三年（1748）迁回今址，嘉庆六年（1801）重建的化州学宫，乾隆十六年（1751）重建的始兴学宫大成殿，乾隆五十年（1785）重建的定安启圣殿等，德庆学宫在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进行大修，保留了宋元建筑风格。新会学宫在乾隆十三年（1748）大修。

祠堂、会馆、学宫一类公共建筑的大力修建,反映了岭南社会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巩固加强,说明发展产品经济的社会基础尚不牢固。

### 三、寺庙建筑与信仰习俗

清初有意倡佛。广州清代“五大丛林”(光孝、华林、大佛、海幢、长寿寺)康乾年间迭有修建之举。光孝寺内今存有康熙四十一年(1702)立的《光孝寺重建六祖殿宇拜亭碑记》。嘉庆元年(1796)兴工重塑诸佛像,翌年完工。净慧寺也多次重修。在重修的过程中,形成了广州佛教寺院的园林化模式。广东各地建佛寺的风气也较盛。饶平的寺庙现存就有重建于乾隆年间的粤首庵、隆福寺(占地2000平方米)、西岩寺、普陀岩寺、观海寺以及雷音寺。道观也有修建。广州三元宫山门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重建。南海云泉仙馆创建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罗浮山酥醪观为康熙年间重建。

清代岭南宗教之盛尚不及民间之多神崇拜。由于社会多层面的需求,修建神庙不断。广州南海神庙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雍正三年(1725)两次重修殿宇,相隔不到20年。汕头华坞天后宫,清乾隆五年(1740)创建,占地1095平方米。澄海樟林妈祖新宫,建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占地6600平方米。佛山祖庙内的庆真楼,建于嘉庆元年(1769)。各种民间神庙之修建更是不胜枚举,仅就现存的坛庙中较具规模和装修水平的有揭阳城隍庙,乾隆四年(1739)重修;揭阳关帝庙,扩建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南澳后宅关帝庙,建于雍正年间。广东各地现有坛庙修建于康熙年间的有连平吉水庙、郁南药王庙、清远江东古庙、肇庆玉皇殿;建于雍正年间的有高州玉泉寺;修建于乾隆年间的有五华福寿宫、揭西白虎庙、三水康公庙、玉虚宫、徐闻康皇庙、海康节孝祠、廉江龙王庙、文昌庙、关帝庙、高州吕祖殿、信宜石印庙、清远葵岗古庙、园岗北帝庙、潮安雨仙庙、翁源镇水庙、龙川越王庙、连平东安庙、蕉岭五显宫、大埔文武阁、吴川梅菪祖庙、罗定白庙等。

### 四、塔、桥与工艺技术

#### (一)塔

清代造塔数量众多,称得上较为高大有特色的砖石塔,首推东莞金鳌洲塔、顺德的勒流七层塔、桂州文塔、龙江塔等。从总体上看,其造型、装饰于塔的建筑史上已走下坡路。不过,这一时期在建塔中也能反映出成熟的地方手工业工艺特色,突出表现在:其一、石刻技艺。建于康熙年间的广州华林寺白石塔、新会青峰山白玉塔,以及同期的南海西樵山白石塔,均是仿楼阁式白石塔,比例匀称,图案精缕细刻,密而不乱,流畅优美,是建筑与雕刻艺术有机结合的工艺精品。其二、夯土技术。建于乾隆年间的惠来玉华塔、普宁培风塔、汕头腾辉塔,均为贝灰三合土或灰沙夯筑,屹立至今。其三、铸铁工艺。炉火纯青的佛山铸铁工艺也应用于铸塔上。雍正五年(1727)铸曲江南华寺五层方形铁塔,高4.18米。雍正十二年(1734)铸佛山阿育王式释迦文佛塔,重近4吨,体量之大,堪称国内此类铁塔之最,且比例匀称、细部图案花纹细腻,是佛山地区清代前期铸铁工业水平的重要实证。

#### (二)桥

清乾隆之后,创建石桥之民风大盛。从全省情况来看,建造石桥主要是在粤北、粤东山区,说明这些地区更需要跨涧越溪以解决交通问题,而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更重于已有的水运之便。光绪《嘉应州志》载入的石墩木桥、灰桥或石桥共168座,大多是清代所建。松源河上长50~100米的石桥,就有九姑、五槿、福寿、永济、聚奎、木棉、渡船、天成、砥柱等9座。这些古桥至今仍可通驶汽车。梅城东山书院前的状元桥,始建于宋代,乾隆十一年(1747)重建双孔石拱桥,至今完好。龙川长盛桥、合善桥,和平五眼桥、仙人桥、癸酉桥,均为乾隆年间建的多孔石梁桥。长盛桥、五眼桥长度均在50米以上。这些桥梁桥体雄伟,架建工程艰巨,反映了石构技术的水平。

### 五、民居建筑与三大民系

广府民系的早期民居建筑,较为明显地受到江南地区建筑模式的影响,尤其是封建文化高度发达地区的官僚地主住宅,常常是

四五代人聚族而居,以大家族为单位,建成封闭独立的建筑群。珠江三角洲的大中型民居,基本格局为“三间两廊”,建筑材料多采用杉木,以墙体承重,意味着本地木材资源的渐为缺乏。砌墙材料除了砖,还有三合土、蚝壳、卵石等。佛山典型的清代住宅东华里,清初为杨、伍两富户所有,原名杨伍街,至乾隆年间改街名为东华里,清末又得到修整,成为佛山著名的街道,有典型的广府民居建筑风格。另一方面,珠江三角洲下层民众的住房仍很简陋,较多为四壁承重的平房,仅在山墙开一小窗,屋顶开窗采光。在沙田地区存在干栏式“棚寮”,雍正七年(1729),民被朝廷“准其在近水村庄居住”,遂在墩边堤畔或半跨河涌搭寮栖身,每间寮棚面积大约10多平方米,以杉作柱,以竹作椽,以稻草或干蔗壳为上盖,稻草和泥浆作墙,能用上杉皮就算好材料了。

客家民居最有特色的建筑是土楼,土楼建筑从夯土发端,渐而发展到以大青砖、花岗石为材料,十分坚固。广东客家土楼较密集的是梅县、大埔、蕉岭、五华、兴宁、平远、丰顺以及深圳等地。土楼建筑有悠久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唐代,其最盛的时期,则从康熙初年开始。较著名的有位于深圳龙岗镇的鹤湖新居,最近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全国最大的客家民居屋围,包括179个居住单元,386间房子,占地2.6万平方米,始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历经三代人百余年而建成。饶平里秀楼,圆土楼,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墙体全部由贝灰建造,称“灰楼”。饶平德馨堡,方土楼,建于乾隆十九年(1754),占地约6600平方米,二层灰土夯筑。紫金桂山围楼,乾隆四十五年(1780)建,施工长达50年,占地1万平方米。客家的围龙大屋,以三堂二横为基本结构,也是客家民居的常见制式。现存较著名的围龙大屋有建于康熙年间的蕉岭九栋大屋、乾隆年间的大埔衣德堂、揭西进士第、梅县花园楼、和平奉政大夫第、宝安大万世居(占地1.5万平方米)。

潮汕民居平面类型最基本的为“下山虎”(“冂”字型)和“四点金”(“口”字型),其

他型式大多以四点金为基本单元组合发展而成。另外还有集居式的住宅,称方寨或楼寨,其形成在明末清初。留存至今的有揭西郭氏楼,建于清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三年(1712~1725),“四马拖车”格局,占地3848平方米,有99间房间,后进为二层楼阁。围楼围寨有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的潮安长远楼、建于雍正十年(1732)的澄海永宁寨和潮安世德寨、建于乾隆八年(1743)的澄海盛安寨及乾隆十三年(1748)的潮安凤仪寨。这一时期沿海贫民所住的,也有所谓涂寮、草寮。夯土或以木、草组成的墙体,屋顶架梁盖草,形式不一。

在海南,汉族地区典型民居为琼山郑氏祖屋,始建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陆续扩建为现存格局。现占地34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12平方米,有大小房舍38间。基本为硬山顶平房,墙体除少量砖墙外,多以黄泥浆砌乱石,木构件很少装饰。至于少数民族所居,如黎族则是干栏式木架茅棚,架空船形屋。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 六、兵垒与军事活动

清初几十年间,清廷致力于消灭南明武装势力,扼制郑成功抗清活动,厉行“禁海”和“迁界”、平尚藩等,广东兵事不绝,因此清廷在广东驻有重兵,并在沿海建了一批驻军寨垒。现存有建于顺治十三年(1656)的揭阳地都青山汛城、康熙三年(1664)为强制禁海移民而建的番禺莲花山上的莲花城。在珠海,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珠海的前山寨、翌年修建的三灶镜城以及雍正七年(1729)修建的东澳岛统城。由于军事活动频繁,岭南也出现了各种地方武装的寨垒,集中于粤东沿海。海丰大湖镇、可塘镇现存有清初苏利抗迁反清队伍营寨,可塘镇的龙牙营寨遗址有炮楼残存。惠来澳上有建于康熙三年(1664)的三合土夯墙营寨。惠来城东有建于乾隆九至五十一年(1744—1786)之荆隄寨等。

18世纪以肇,清政府在广东的海防,渐而重在对付资本主义列强的侵扰。康熙五十八年(1719),杨琳疏言,“广东沿海险要地



方,修造炮台、城垣、汛地共 126 处,盖造营房共 1380 间,拨守官兵共 3991 人,安炮 807 位。”从旧志可知,所修炮台规模较大。为了对抗用新式枪炮装备起来的诸番军队,清军逐步以炮台式要塞取代了始于明代的海防卫所城池体系的格局。这种炮台式要塞,由若干个能长期坚守和独立作战的炮台构成,每个炮台都由炮台、望楼、营房、火药库、演武厅、围墙、堑壕和障碍物等几部分组成。以康熙五十六年(1717)起开始修建的虎门要塞为典型。虎门炮台由珠江口几个大小岛屿上先后修筑成的炮台群组成。至道光十九年(1839),先后建成横档、南山(后改名威远)、新涌口、镇远、大虎山、大角山(二座)、永安、巩固、靖远(又称定远)等九座炮台,构成虎门主要防御体系工程。另外在虎门东南的新涌山、西南的蕉山,各建新涌、蕉门炮台,成为两侧防御阵地,形成四道防线的防务体系。不过这些炮台全部为明台建筑,在鸦片战争中暴露出其守御上的弱点。

广东海防东起潮州,西抵钦州,南至琼州,清代前期建设了廉州要塞、虎门要塞、长洲要塞、潮州要塞、琼州要塞等。现存炮台

遗址还有建于康熙年间的潮阳石井、钱澳、海门南炮台,汕头广澳、河渡炮台,饶平西虎仔屿、鸡母澳炮台,南澳猎屿铙城(改建炮台)、长山尾炮台,澄海莱芜炮台,汕尾遮浪、石狮头炮台,东莞南山炮台,惠东港口炮台,惠来澳角、资深、溪东、靖海炮台;建于乾隆年间的海丰鲒门炮台,建于嘉靖年间的汕头宫鞋石、汕尾长沙村炮台等。

清代大建烽火台(或称烟墩)。据《潮州府志》,仅惠来一县就有烽火台 23 处。现存烽火台遗迹,建于康熙年间的就有惠来茶铺、新寮烽火台、饶平上里尾烟墩、潮阳海门大小烟墩、汕尾南町山烟墩。

总之,清前期的岭南建筑,反映了岭南社会的变化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值得指出的是,就整个清代而言,一些更为辉煌的成就出现在晚清(如陈家祠、四大名园、侨居建筑以及更多仿西式建筑的出现)。就建筑的发展水平建筑技艺而言,嘉道以后是更为灿烂辉煌的时期。

作者陈泽泓,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副研究员(510091)

责任编辑:郭秀文

## ——翁山述白沙之学与诗

□ 刘付靖

于粤籍名卿硕儒之中，翁山极推张九龄与陈献章，他说：“知天下于一国，知一国于一人，此一人者，其出则必如文献，处则必如文恭者也。”<sup>①</sup>文献之行事乃所作《金鉴录》，堪称一代忠臣义士的楷模；文恭修身论道，使岭南之学在“有明一代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sup>②</sup>

### 一、翁山为白沙之学辟禅

翁山述白沙之学的目的，主要是为白沙辟禅且传扬白沙之学。宋明诸儒出入佛仙，融摄佛仙的思辨精华，扬弃其有悖于封建人伦的糟粕，将孔孟开创的注重实证方法的伦理哲学发展成为包含思辨方法的人生哲学。佛仙的思辨精华被儒学所吸收，佛仙之学也就失去了对士大夫们的特殊魅力，逐渐流入低层次的民俗实用范围，为士大夫们所不齿。宋明理学诸学派互相指责对方入禅，是为了贬低对手以争夺正统理学的地位。有明诸帝对于佛仙的利用也仅限于低层次的斋醮作法，其中的仁、宪、孝三帝皆死于服食丹药，是为历代帝王死于丹药者之最，故晚明遗民痛定思痛，将亡国亡族之咎归于佛仙及流于禅学的心学末流的空谈无用。

理学中的心学流派自王阳明开始盛行，但在浙江传经王畿之后便逐渐入禅。黄宗羲曾学于王畿的三传弟子陶奭龄（石梁），“石梁之门人皆学佛，后且流于因果。……石梁言一名臣转身为马，引其族姑证之。”<sup>③</sup>黄宗羲因此大失所望，改投刘宗周门下。刘宗周（念台）乃有明心学的殿军，曾与石梁一同讲学，后因石梁入禅而分手，创证人书院，讲论心、禅之别，力挽心学之颓风。

念台的学术思想接近于白沙的同窗胡居仁（敬斋）。敬斋以学主忠信为先，求放心为要，重诚敬、慎独、力行，戒“存心”等屏绝思虑以求静的修身方法，以免入禅。念台亦主“学之要，诚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则诚，诚则天。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矣。”<sup>④</sup>是以念台虽以王学后人自居，但其学已经略

有别于阳明心学。白沙之学承陆九渊而启王阳明，白沙在世时敬斋即言其学近禅，<sup>⑤</sup>后王阳明也说白沙的传人湛若水之学“其知者，且疑其为禅”。<sup>⑥</sup>念台论学时，以敬斋之“心有专主之谓意”为是，而以白沙之“藏而后发”、“随动静以施其功”为误。<sup>⑦</sup>

念台虽未明言白沙入禅，但却只为阳明辨诬，而不为白沙辨诬。念台说：“朱子惑于禅而辟禅，故其失也支。陆子出入于禅而避禅，故其失也粗。文成似禅而非禅，故不妨用禅，其失也玄。”<sup>⑧</sup>念台只以“玄”规王学之过，而以其非为入禅。

翁山虽未得过明朝一官半职，却至死以遗民自居，痛绝佛仙之道及心学末流空谈误国。翁山自言其编纂《广东文集》的苦心孤诣为：“一篇一字，亦必以内圣外王为归，痛绝释老之言，阴寓春秋之法。”<sup>⑨</sup>在编纂白沙诗文时，翁山也有自己的编辑标准：“录其尤醇者若干篇，易名《陈文恭集》，中有借用佛老之言，一皆舍之。是亦予之所以厚爱先哲也夫。”<sup>⑩</sup>

翁山认为白沙之学源于理学之开山周敦颐（濂溪）与程颢（明道）。翁山说：“说者谓孔门以孟氏为见知，周先生则闻而知之者，程伯子周之见知，白沙则周之闻而知之者。孔孟之学在濂溪，而濂溪之学在白沙。”<sup>⑪</sup>翁山以濂溪、明道及白沙三人的静虚之说作比较，举例如：濂溪曰“无欲则动直静虚。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道曰“静中须有物。有物者，言乎自得之也。”白沙说“失动，已形者也，形斯实矣。其未形者虚而已矣。虚其本也，致虚之所以立本也。”“失学贵自得也，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之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去耳目支离之用，存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三人对于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阐发大致相同，故翁山诘问道：“钱儒不察，谬以白沙之言为禅，然则濂溪、明道其亦禅矣乎？”<sup>⑫</sup>

事实上，理学（包括程朱道学及陆王心学）是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其中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与

禅学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皆有共通之处,但由于理学思潮是因为反对禅学而发起,心学的末流又有入禅空谈误国之名,故宋明诸儒皆未能正视心学与禅学的共通之处,反而大张旗鼓地为心学辟禅辨诬。濂溪以“阴静”为“阳动”的根源,其说融摄了道教的宇宙生成模式论。二程从“积习”到“豁然有觉”的认知过程,是在印证吾所固有之“理”,亦即禅学从“渐修”至“顿悟”。象山言“心即理”、“心外无理”,更与禅学之“不我执”、“不他执”无异,朱熹便直截了当地说陆学入禅:“陆子静之学,自是胸中无奈许多禅何,看是甚文字,不过假借以说其胸中所见者耳。”<sup>⑬</sup>阳明训朱子“格物致知”之“物”为“事”,以其为主观意识“心”之所发,“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sup>⑭</sup>此乃华严宗之“理事说”,而非阳明之独创。

阳明在世时即被视入禅,阳明多有自辨,以“朱尝外人伦、遗事物”为心学、禅学之别,心学乃“圣人学”,“朱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盖圣人之学,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之为心”。<sup>⑮</sup>而释氏之学却是起于自私自利,“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sup>⑯</sup>此亦正是宋明理学扬弃佛仙糟粕的一部分。

念台高足黄宗羲认为“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sup>⑰</sup>王阳明曾与湛甘泉同讲席于武夷大同书院,然王阳明从不提及自己与白沙的学术联系,而以自己直接继承陆九渊的学术思想,“亦未尝数言甘泉之师为白沙”。<sup>⑱</sup>刘念台亦曾以甘泉的再传弟子许远孚为师,<sup>⑲</sup>然念台亦从未论及白沙与王学的关系,而以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王守仁为孔学后五子,并以“阳明直追孟氏矣”。故甘泉、翁山皆极力为白沙辟禅辨诬,翁山并发问于念台传人曰:“然念台知阳明而不知白沙,岂未尝读其书乎?念台生于浙,故知阳明;予生于南海,亦惟知白沙,岂皆有私其乡之心乎?”<sup>⑳</sup>

## 二、翁山发白沙诗之高妙

白沙不事著述,却喜作诗,有诗作二千多篇传世,与庄昶(定山)并称,时谓“陈庄”。明初诗人复古拟古,一扫宋元以来诗坛上的纤秾缛丽之风,诗坛一片生机蓬勃。但至洪武后期,诗人们相继罹难,大都不得善终。此后的永乐至天顺年间,复古

拟古流为台阁重臣们的平稳空泛之作,此时正值白沙的青少年时代。白沙与稍后的李东阳一样,反对台阁体的冗沓肤廓,为沉闷的诗坛注入新空气。东阳为茶陵派开山祖,对明诗前七子有启发之功,但因其身为台阁重臣数十年,诗作多取史材,平滞有余而灵性不足。白沙一生归隐,淡泊名利,远离宦海惊涛骇浪,其诗出自性灵,明朗活泼,接近洪武诗人的风格。东阳曰白沙诗“极有风韵”,<sup>㉑</sup>俞长城曰:“陈白沙先生倡学东南,为世儒宗。吾疑其文必方正严肃,确不可犯。今诵其集,潇洒有度,顾盼生姿,腐风为之一洗。”<sup>㉒</sup>今人有选明诗者,大多少选或不选陈庄之诗,其理由为“理学气甚重,无多可取”。<sup>㉓</sup>明诗后七子之集大成者王世贞(弇州)曰:“公甫诗不入诗,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其妙处有超出法与体与题之外者。”《四库提要》引述其语,似为定论。故陈庄虽以理学入诗,但其诗中之“高妙不可思议”处,<sup>㉔</sup>仍应为诗论家们所重视。

复古拟古是明诗的时代特色,台阁诗人剝模拟,前后七子将此因袭之风推向极端。以王世贞而言,“他从西周拟到盛唐”,“他拟的《诗经》,比《诗经》本身还‘古’”。<sup>㉕</sup>他们也明白“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的道理,<sup>㉖</sup>但他们在实践上却无法割舍古选与盛唐的辉煌,李东阳说:“文与字一也。今人模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sup>㉗</sup>故这些为诗而诗的复古拟古之作大多平庸空泛、缺乏骨力,李贽抨其为“机锋圆熟、千篇一律”。<sup>㉘</sup>

白沙以道入诗,一改台阁诗人的平庸空泛,恢复儒家寓教于乐的传统,使诗词的创作有健康充实的思想内容。白沙曰:“失诗,小用之则小,大用之则大,可以动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鸟兽,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皇皇帝霸之褒贬,雪月风花之品题,一而已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sup>㉙</sup>

绮靡雕凿、无病呻吟之诗远离普罗大众,无法起到诗教的作用,故白沙主张“率吾情盎然出之”,<sup>㉚</sup>“不乎乎人伦日用而见鸢飞鱼跃之机”,“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此《风》、《雅》之源也。”<sup>㉛</sup>

真诗在民间,乃古今有识之士的共识,然李东阳、王世贞等诗名显赫者大都未能付诸实践,而白沙却以平常语言事物入诗,以自己于读书交友、往来山水之间所感悟到的“吾心即理”入诗,定山曰白

沙之诗：“喜把炷香焚展读，了无一字出安排”，“为经为训真谁识，非谢非陶莫浪猜”。<sup>③②</sup> 弇州于白沙诗中独独拈出一个“妙”字，是为知白沙诗者也。

甘泉以白沙诗为“自然之发”，一发为“自然之蕴”，亦即道蕴，“忠、信、仁义、淳和之心”；再发为“自然之文言”，“在于勿忘勿助之间，如日月之照，如云之行，如水之流，如天葩之发，红者自红，白者自白，形者自形，色者自色。”<sup>③③</sup> 甘泉述白沙之诗，重在阐释诗中之“道”蕴，且处处辟禅，故其《古诗教解》中的白沙诗，基本上是一部道学诗。

翁山乃晚明一代诗才，又是岭南文化史上最重要的诗人。林昌彝以亭林、翁山之诗为“地籁”之鸣，曰：“此中精微之境，难为不知者言也”。<sup>③④</sup> 翁山以白沙之诗为“天籁”之鸣，极力言出其诗中的“精微之境”。

与白沙一样，翁山也主张将时代的思想与精神倾注入诗词之中，翁山曰：“颠倒日月，鼓舞风雷，奔五岳而走四渎，使天下万物皆听命于吾笔端。”<sup>③⑤</sup> 故翁山赞同白沙以道入诗，“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始，以道为诗，自白沙始”，“天道不言，四时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诗之妙用，此白沙诗之教也。甘泉尝撰白沙诗教以惠学者，然学白沙者难为功，学曲江者易为力。曲江以人，而白沙以天，诗至于天，呜呼至矣。”<sup>③⑥</sup>

与白沙一样，翁山虽也未能超越明诗复古拟古的时代风气，但却千方百计自开天地。白沙师门后人夏尚朴言白沙“自出机轴”、“诗学为之大变”，<sup>③⑦</sup> 翁山则主张以《易》入诗：“《易》以变化为道，诗亦然。故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sup>③⑧</sup> 故翁山赞赏白沙“诗之工、诗之衰也”、“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的诗论观点，并摘出其中的抒自性灵之句，如“惟有白头谿里影，至今犹戴玉台巾”，“柱地撑天吾亦有，一茎青玉过眉长”，“两鬓馨香齐插了，赛兰花间木犀花”，“何处思君独举杯，江门薄暮钓船回；风吹不尽寒 月，影过松梢十丈来”等等，翁山曰：“其风流潇洒，油然自得，身在万物之中，而心出万物之外，斯乃造化之徒，可以神遇而不可以形迹窥者。”<sup>③⑨</sup>

翁山发白沙诗之“高妙”，可谓尽矣、至矣，翁山对白沙之行事、学术、诗文皆推崇备至，焉知翁山之

地籁之鸣，不曾得自白沙之天籁之音的真传耶？

①②⑨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11《纹语》

③⑦⑧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十二《戴山学案》。

④⑩ 赵吉惠、郭厚安主编《中国儒学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130、518 页。

⑤⑳ 《明儒学案》卷二、卷四《崇仁学案》。

⑥⑫⑳ 屈大均《陈文恭集序》，见《陈献章集》下，中华书局 1987 年。

⑩⑪ 《广东新语》卷 10《学语》。

⑬ 《朱子语类》卷 124。

⑭ 《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⑮ 《王文成公全书》卷七《重修山阴县学记》。

⑯ 《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传习录》。

⑰⑱ 《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卷五《白沙学案》。

⑲⑳㉑ 李东阳《麓堂诗话》、《诗集自序》、《再与何子书》，见黄瑞云等选注《明诗选注》，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⑳ 俞长城《题白沙文稿》，《陈献章文集》下。

㉑㉒㉓ 《明诗选注》第 98、15、16 页。

㉔ 《四库全书·明诗综提要》。

㉕㉖ 陈白沙《认真子诗集序》，《陈献章文集》上。

㉗ 陈白沙《惕斋诗集后序》，《陈献章文集》上。

㉘㉙ 湛若水《重刻白沙先生全集序》，《陈献章文集》下。

㉚ 林昌彝《海关琴思录》卷六，钱仲联主编《明清诗文研究资料集》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㉛㉜ 屈大均《空莹堂诗集序》、《粤游杂咏序》，见刘斯奋等《岭南三家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㉝ 《广东新语》卷 12《诗语》。

㉞ 《广东新语》卷 9《事语》。

作者刘付靖，广东民族学院民研所助研（510633）

责任编辑：郭秀文

# “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

## ——评晚年曹聚仁的鲁迅研究

□古远清

曹聚仁虽然早在大陆时期就登上了文坛,和鲁迅等人过从甚密,是海派作家重要的一员,但他的4千万字以上的著作,有近3/5完成于香港(在大陆出版了26种,在香港出版了43种)。1950—1972年,他在香港生活、写作,成了地道的香港作家。《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是他的两种主要研究著作。

他做过近20年的新闻记者,加上他和鲁迅交往甚密(仅鲁迅给他的书信就多达44封),鲁迅是和他同桌吃饭、一室闲谈的文友,他本人又十分尊敬鲁迅,他说过“假如时间稍微推前一点,我就在杭州赶得上做他的学生(他教的杭州两级师范,便是我们一师的前身)”<sup>①</sup>。所以,由他作传是合适的,至少他不会去相信那些推想和神话般的玄谈,更不会按谁的旨意去图解。他完成于1956年的《鲁迅评传》,便是他独立思想的产物。

该书28章,前面是“引言”,后面依次为:绍兴—鲁迅的家乡、他的童年、少年时代的文艺修养、在日本、辛亥革命前后、民初的潜修生涯、托尼学说、《新青年》时代、在北京、《阿Q正传》、《北晨》副刊与《语丝》、南行——在厦门、广州九月、上海十年间、晚年、《死》、印象记、性格、日常生活、社会观、青年与青年问题、政治观、“鲁迅风”——他的创作艺术、文艺观、人生观、他的家族、他的师友、闲话。前面16章,为生平史实,后面12章,为鲁迅面面观。这种构架,与郑学稼、王士菁均有不同。

1967年出版的《鲁迅年谱》分上下卷,

上卷为年谱,计11节,依次为小引;幼年:1881—1897年,少年:1898—1901年,日本留学:1902—1909年,辛亥革命前后:1910—1911年,在北京:1912—1916年,五四前后:1917—1926年,南下:1926—1927年,在上海:1928—1936年,病逝。下卷为“作品评论及印象记”,作者周作人、茅盾、(英)H. E. Shapick 马珏、阿累、陈源、张定璜、曹聚仁、景宋、内山完造、邓珂云。另有悼诗及挽联。附录有“鲁迅生平和著作年表”。其中,上卷曾在香港《文艺世纪》连载过,后经过修正和补充。下卷则是作者过去和邓珂云合编的《鲁迅手册》的修订本,比过去编得更有代表性。其中陈源致徐志摩的信,充满了攻击鲁迅的内容。曹聚仁之所以要收入,是因为鲁迅自己觉得这是难得的反面教材,曾同意编入《关于鲁迅及其他》一书,亦可见鲁迅胸怀之宽广。

曹聚仁研究鲁迅,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他自始至终坚持认为鲁迅是人,反对把鲁迅神化的观点。他曾当着鲁迅的面说过:“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sup>②</sup>在他看来,要在表面上把鲁迅形容得伟大的人,“也许表面上是褒,骨子里是对他的嘲笑呢!”而在思想上,曹聚仁也认为鲁迅并不纯粹:“他的思想本来有若干矛盾的,思想上的矛盾,并无碍于其在文学史上的伟大的。一定要把这些矛盾之点掩盖起来;或是加以曲解,让矛盾消解掉,那是鲁迅所不会同意的。鲁迅赞许刘半农送他的对联:‘魏晋文章’,‘托尼学说’,那就一切歪曲都没有用了”。<sup>③</sup>这与有些论者极



力否认或削弱托尼学说对鲁迅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这表现了曹聚仁作为一位史家求真的一面。鲁迅赞同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兼容托尔斯泰的泛爱主义与尼采超人的学说”<sup>④</sup>;他有为人亲善的一面,同时还有“绍兴师爷的脾气”,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

基于鲁迅不是圣人的思想,曹聚仁不赞成把鲁迅批判过的人都看成坏人,如陈源(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很渊博,文笔也很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便把陈西滢、梁实秋看作十恶不赦,是太天真了——鲁迅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也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这些看法有合理的成分,像徐志摩、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有一定地位,如因鲁迅批判过就抹杀其作品及其影响,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鲁迅批判顾颉刚,连其考证工作也加以否定,这是“党同伐异,气量偏狭”的表现。但是,被鲁迅痛骂过的王平陵、黄震遐,与顾颉刚不同,他们从事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有靠山和背景,不能因其年轻就低估他们的能量。在这方面,曹聚仁的评论未免有书呆子气。

曹聚仁研究鲁迅,处处注意以文学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来看鲁迅,而不是以偏狭的政治眼光或“阶级斗争为纲”的眼光来衡量鲁迅的一切文学活动和实践,因而他不满王士菁在其《鲁迅传》中把鲁迅在上海10年当作被围攻的时期。他认为,“新月派”、“第三种人”、林语堂和鲁迅的笔战,均是文艺观不同的争论,而谈不上围攻鲁迅。“真正围攻过鲁迅的,倒是创造社的后起小伙子,《洪水》,‘太阳社’那一群提倡革命文学的人”。这种看法,不失为一种崭新的看法。因为文学论争多半是由文学问题引起的,不见得都是阶级搏斗。而创造社诸君子对鲁迅实行错误的排斥、打击的方针,甚至污蔑鲁迅是什么“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法西斯蒂”等等,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围攻”。过去的文学史家往往偏袒钱杏村等

人,对“第三种人”则一棍子打死,这是“左比右好”的思想在作怪。

鲁迅曾被国民党通缉7年而未被逮捕,其原因何在?曹聚仁认为,鲁迅在上海10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原因是,鲁迅的名声和地位,一方面受中共组织所掩护,一方面又为国民党特务所不敢触犯(投鼠忌器)。曹聚仁在这方面虽不及后来的刘心皇拿出足够的证据说明自己的判断,但这毕竟言之成理。而且,曹聚仁在香港研究鲁迅时并没有依附任何政治势力,他是谈自己的实感而不是在为谁辩护。应允许这样的观点存在,才能体现百家争鸣的精神。

曹聚仁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比如,王瑶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把那一(指左联)时期,当作鲁迅领导文学运动的时期”<sup>⑤</sup>。曹聚仁认为此说不符合事实,因为“无论左翼作家联盟或社会科学联盟,或戏剧工作联盟,都有主要负责人,如瞿秋白、周扬、潘汉年,他们对于鲁迅,只当作同路人看待——他们有其领导文化运动的路线,并非要鲁迅来领导”。他在《鲁迅研究述评》一文说得更明确:“若干文化运动,如大众语运动,手头字运动,都不是鲁迅所领导的,一定要把这些文化工作写在鲁迅史上,对于他,也只能说是一种莫名奇妙的讽刺。”<sup>⑥</sup>曹聚仁这里讲的“领导”,主要不是指思想上的,而是指担任的实际职务。冯雪峰说过:“左联和鲁迅是相互发挥的”,“在那时候,只要有鲁迅存在,左联就存在。只要鲁迅不倒,左联就不会倒。鲁迅斗争的顽强和他的权威实在起了决定的作用”。这里讲的是鲁迅的权威(并非是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所产生的效应,因而曹聚仁引出来的结论是“左联依靠着鲁迅,而不是鲁迅领导左联”。这样理解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不是贬低鲁迅,而是还鲁迅以本来面目。尤其是大众语运动,1934年夏天由曹氏与陈望道、夏丏尊、徐懋庸、金仲华、陈子展等人提倡,然后向鲁迅征求意见。那篇在大众语运动中产生广泛影响的《门外文谈》,是应曹聚仁的请求写的。鲁迅在大众语运动中

起了重要作用,但不是领导作用,这种看法是站得住脚的。

在研究鲁迅小说方面,曹聚仁也有新的发现和大胆的诊断。如论《阿Q正传》,曹聚仁曾说过鲁迅也是“阿Q”<sup>⑦</sup>。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丑化鲁迅,其实,曹聚仁不过是说明“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sup>⑧</sup>。这“中国人”当然也包括鲁迅,也包括曹聚仁自己在内。但曹聚仁并没有荒唐到把《阿Q正传》看作是鲁迅自传体小说,只是认为它“是一篇典型的现实的讽刺小说”<sup>⑨</sup>。

曹聚仁对《在酒楼上》这个短篇也相当重视,认为这是鲁迅小说中“最成功的一篇,正如他自己所推荐的孔乙己一样”,因为这篇小小说“表现了中年人的情怀”<sup>⑩</sup>。曹氏原以为吕纬甫的原型是鲁迅的朋友范爱农,“后来才知道其中虽有范爱农的成分,但大部分还是鲁迅自己的写照”。尤其是有关蝇子飞了一小圈后又回来停在原来的地点的议论,以及先前到过城隍庙拔神像的胡子的感慨,“是把真的鲁迅勾划出来了,他就是吕纬甫”<sup>⑪</sup>。但曹聚仁并不是认为吕纬甫的精神就等于鲁迅的全部,鲁迅后来就飞到更高更远之处,没有“停在原地点”上。我们应该准确、全面地理解曹聚仁对吕纬甫的评价,而不能一听到鲁迅“就是吕纬甫”便认为贬低了鲁迅的光辉形象。

曹聚仁和冯雪峰是先后同学,且两人均是鲁迅的挚友,但他们对鲁迅的看法有重大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于冯氏多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看鲁迅,而曹氏却站在无党派的立场透视鲁迅。对冯氏的《回忆鲁迅》,曹氏认为其中对鲁迅的评价有拔高之处,里面有“教条主义的错误”。他最反对的是冯氏对《彷徨》和《野草》的评论,不认为《野草》的思想和感情不健康,而认为“鲁迅一生的作品中,《野草》是最好的一种,也可以说是最接近尼采思想的”<sup>⑫</sup>。曹氏和冯氏的看法见仁见智,很难说谁是谁非。不同的研究角度必然会有不同的结论,多种结论比一言堂好些。

对《故事新编》中的《采薇》,长期以来未受重视。而曹聚仁认为:“鲁迅和笔者所谈:

《采薇》中的‘阿金’是很重要的;他创造了阿金,就等于创造‘阿Q’,阿金也和阿Q一般普遍地活着的。”<sup>⑬</sup>可是,有人认为鲁迅写阿金是为了讽刺某类人物(以“鹿脯”和“芦布”谐音为例),曹聚仁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牵强。还有,曹氏认为“《一件小事》只能算是一篇杂文。《明天》是一篇阴暗的小说。”<sup>⑭</sup>这些看法也很值得重视。

在体例结构上,曹聚仁的《鲁迅评传》也有独到之处。该书不完全按纵的线索流水账式的叙述鲁迅的生平,而是抽出诸如“托尼学说”、“青年与青年问题”、“文艺观”等专题单独评说,这样给人以结构上的立体感。由于这是作家写的评传,且是鲁迅当年好友写的评传,故行文中所穿插的一些回忆文字,使读者感到亲切,可读性甚高。至于《鲁迅年谱》,深受胡适、梁启超的影响,尤其是胡适所撰的《章实斋年谱》的影响。具体说来,曹聚仁编的年谱,除列举鲁迅作品的著述时间外,把凡是可以表示鲁迅思想发展的变迁沿革的材料,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在列举鲁迅作品时,不是客观的介绍,还掺入自己的评价。如谈到《白光》这篇真写狂人的小说时,将其和《狂人日记》比较<sup>⑮</sup>。谈到《中国小说史略》时,便对其学术特色作出评价<sup>⑯</sup>,尽管文字不长。历来的鲁迅传记,一般只说好话,尽量不谈传主的局限。曹聚仁则既报喜又报忧,既说鲁迅的长处也说其短处。

曹聚仁研究鲁迅的工作,在香港学术界口碑甚佳。现代文学史研究家李辉英曾说:“曹聚仁先生写这部评传是因30年代初期和鲁迅的来往还很密切,对于鲁迅只消察言观色,就已是上好的材料了——直到今天为止,可以大胆地说,还没有任何鲁迅传超过曹著这一部。”<sup>⑰</sup>曾经三次向曹氏索要“评传”的周作人,在致曹氏的信中还说:

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遍,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及政治观为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尊

书引法郎士一节话,正是十分沉痛。常见艺术家所画的许多像,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没有写出他平时好的一面,良由作者皆未见过鲁迅,全是暗中摸索,但亦由其本有戏剧性的一面,故所见到的只是这一边也。<sup>⑮</sup>

当然,许多内地学者对曹聚仁的鲁迅研究有保留,因为曹聚仁的评价确实还有不少值得质疑之处。

一是鲁迅是否是“同路人”的问题。曹氏认为:“我们得承认鲁迅自始至终是‘同路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共产党员,否则我们就无从解释鲁迅回复徐懋庸的公开信以及他写给胡风的几封信了。作为一个‘同路人’,鲁迅在革命道路上的贡献也是同样伟大的。”<sup>⑯</sup>他说的“同路人”,含有鲁迅并未加入中共组织,但仍靠拢中共,与中共共同走一条路的意思。这与胡适认为鲁迅晚年“反共”<sup>⑰</sup>的说法完全相反。因曹氏说鲁迅是“同路人”而将其打入反鲁乃至反共行列,是黑白颠倒的表现。但这里讲的“同路人”,在内地学者使用时有特定的政治含义,故这一词是否准确、科学,值得讨论。

二是鲁迅是否属于“自由主义者”。胡适曾和周策纵说:“鲁迅是我们的人,鲁迅基本上是自由主义者。”<sup>⑱</sup>无独有偶,曹聚仁也认为鲁迅“只能说是自由主义者,正义感很强烈,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前驱战士”<sup>⑲</sup>。这种判断是有偏颇的,它带有曹聚仁本人强烈的主观色彩。如上节所述,曹聚仁赴港后,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派”和“自由主义者”自居,对内地50年代初期的新气象有赞有弹,结果遭受左右两派的夹攻。鲁迅并不是自由主义者,其思想境界比曹聚仁高得多,其政治立场亦比曹氏坚定,旗帜更为鲜明,这从鲁迅批评曹氏1933年所写的《错错了人》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们对同一政治斗争所采取的不同态度<sup>⑳</sup>。曹聚仁把鲁迅说成是“自由主义者”,未免有谬托知己之嫌。本来,曹氏与鲁迅“有一段极机密的交游”<sup>㉑</sup>,凭这点,他可以像当年有人说“我的朋友胡适之”那样说“我的朋友鲁迅”。曹聚仁没有

以此去炫耀,这是他人品高尚的表现。但他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决定了他不时会以自由主义者的眼光去审视鲁迅,以自己的好恶去评价鲁迅。这样,鲁迅就难免被这位台港文坛有名的自由主义者打成自由主义分子。这客观效果上是谬托知己。关于这一点,曹聚仁在《鲁迅与我》中曾坦率地表白过:“在鲁迅身后20年,我才开始写《鲁迅评传》,后来又再三易稿,写成了《鲁迅年谱》,真的是谬托知己了。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的结尾上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鬻,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或许我也是这样的‘无聊之徒’呢!”<sup>㉒</sup>想不到曹聚仁竟不幸而言中。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无法理解鲁迅讲的下列话:“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sup>㉓</sup>;“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sup>㉔</sup>。

三是鲁迅是否戴着假面具演戏问题。1945年后,曹聚仁曾任苏州国立社教学院教授。他在该院讲课,曾对学生说:“人总是人,人是带着面具到世界来演戏的,你只能看他演得好不好,至于面具下面那个真实的人,那就不是我们所能看见的。……依我的说法,鲁迅为人很精明很敏感,有时敏感过分了一点。我们从他的言论中,听出他对青年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而且上了无数次当,几乎近于失望,然而,他知道这个世界是属于青年,所以他对中年人,甚至于对他的朋友,都不肯认输,不肯饶一脚的,独有对青年,他真的肯让步认输……。”这里讲的鲁迅敏感乃至过分敏感,上过许多青年人的当,均是事实,但他并未由此改变对世界属于青年的看法,这是因为他善于辩证地看问题,还有他早年信过进化论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他人格分裂,戴着面具在演戏。演戏云云,是曹聚仁的人生观。他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强加在多次反对过“做戏的虚无党”的鲁迅的身上,是很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鲁迅实际的。

## 媚后之痴

□ 罗书华

### 媚后藏痴

《聊斋志异》全书 490 余篇长文短文，蒲松龄的笔触几乎写遍了地下、人间和天上的各个角落，各色人等、物等汇聚于此，浓缩于此，展示着各自的奇异与卓绝。就是那些纯然描写自然物事的篇章如《地震》、《元宝》、《龙肉》、《蚰蜒》等都无不精致玲珑，耐人寻味。一般认为，最能代表《聊斋》风格的还是怪鬼狐妖，人们印象最深刻的也正是他们。娇娜、青凤、聂小倩、鸦头、连城、莲香、胡四姐、伍秋月、阿绣、小梅……这串人物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她们或刚或柔、或热情或羞涩、或单纯或老到，各有各的特点，同时又具备了一个共同特点：她们都集中了几千年中华女性发展的精华，个个面貌若仙，风华绝伦。她们频繁地往来于《聊斋》的字里行间，一颦一笑、一步半跬都如此奇异迷人，故不少论者都以为《聊斋》的成功主要得力于这类形象塑造的成功，《聊斋》的意义多来源于这些形象。

然而，如果细致搜寻一番，我们可以发现，《聊斋》中还活动着一群足以与这些媚丽的花妖狐魅相毗美的人物群像。这就是由

从根本上说来，曹聚仁是拥鲁的，对鲁迅是相当尊敬的，和郑学稼们水火不容。他虽然号称不偏不倚，其实是“形中实左”。他受过右派及左派的围攻，又曾 3 次见过毛泽东，周恩来请他吃过 10 次饭，在贫困的晚年对国家的前途仍感到乐观。仅凭这一点，内地应重印他的《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至少作为内部出版吧。

①③⑥曹聚仁《鲁迅年谱 20》》，香港《文艺世纪》1959 年新年特大号（1 月出版）。

②⑦曹聚仁《鲁迅评传·引言》。

④参见刘心皇《鲁迅这个人》，台湾东吕图书公司 1986 年 6 月版。

⑤北京开明书店 1951 年 9 月版，第 138 页。

⑧⑨⑩⑪⑫⑬⑭曹聚仁《鲁迅的一生》，台北新潮文化事业公司 1987 年 12 月版，第 61、163、165、166、163、173、58、170 页。

⑮⑯⑰见《鲁迅的一生》第 69、321、164 页。

⑱⑲ 跋《鲁迅评传》。

⑳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1958 年 5 月 4 日）。

㉑周策纵《五四思潮得失论》，台北《中国时报》1987 年 5 月 4 日。

㉒《鲁迅评传》第 226 页。

㉓参看鲁迅《“杀错了人”异议》，《鲁迅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㉔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鲁迅与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92 页。

㉕鲁迅《仁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㉖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作者古远清，中南财经大学香港台湾研究所教授（430064）

责任编辑：陶原珂

常大用、马子才、向杲、霍桓、耿去病、孙子楚、席方平、邢云飞、白下、程生、叶生……构成的男性人物系列。他们虽然被分置在不同的篇章，赋予了不同的身份、背景与活动，但是，他们的性格却几乎无例外地具有一个共同点：痴。他们在《聊斋》的人数、形象的鲜明性和深刻性，都足以与媚丽女子相比肩。正是这两组相辅相承、相映成趣、一呼一应的形象系列，构成了《聊斋》人鬼狐妖世界的构架和整体。

首先，在那些花妖狐魅的爱情篇章中，那些鲜丽的媚女们其实很少单独活动，她们的出现往往与痴男儿相伴而行，一男一女，一媚一痴，扮演出一折折动人的故事。而更让人不能忘怀的竟或是这些傻汉子的痴情。孙子楚为着意中人阿宝的一句戏言，居然斧断己指，为近芳泽又魂寄鸚鵡（《阿宝》）；刘子固因为买扇时“女以纸代裹完好，已而以舌舔粘之”，便“注目不移，不语亦不食”；《莲城》中的乔生，为着意中人，竟自出白刃，剜肉相赠，宁知这是索命之举，只为“相逢时，当为我一笑”。真可为后世痴情的祖宗。

在《聊斋》的爱情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见弈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见弈又忘其生”，却未尝过胜果的棋痴（《棋鬼》）；看到“好石，见佳不惜重直”的石痴（《石清虚》）；可以看到“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的菊痴（《黄英》）；还可以看到“癖于曲蘖”的酒痴（《酒友》）；还有为报仇而化身为虎的仇痴（《向杲》）……总之，在《聊斋》里，痴汉绝不止于情痴。凡有一物，便为一痴，痴汉遍布之广，甚至胜过媚丽的花妖狐魅，成了《聊斋》舞台的一大主角、一大主题。

### 痴源是我

《说文》云：“痴，不慧也。”在《聊斋》中，“痴”的最显而易见的语意就是这“不慧”，这痴呆。作者在介绍珠儿（《珠儿》）的“性绝痴”时云，“五六岁尚不辨菽麦，言语蹇涩”。可见，这“痴”指的是智力和语言能力的落后；《小翠》中的元丰亦类此，“绝痴，十六岁不能知牝牡”。至如《阿宝》中那生动、丰满的孙子楚，则是“性迂讷，人诳之，辄信为真。”人们“遂貌其呆状，相邮传作丑语，而名

之曰‘孙痴’。”这各类痴者，无论是情痴还是物痴、事痴，几乎都没能蜕尽这层生理“痴呆”的外皮。

但是，要在《聊斋》中找到一位自始至终的傻子，却不容易。古人曾把一些痴呆的奇言异行收罗进入一些搜奇猎异的笔记，以为茶余饭后谈笑之资，但作为“寄托如此”的“孤愤之书”的《聊斋》，则毫无此意。《聊斋》中的这类痴儿郎，事实上并没有停留在这表层的怪异之上。相反，他们体现了作者的无限思致和审美情态。对于这些出场时还不免痴痴傻傻的呆子们，作者一无例外地要进行改造，灌注以栩栩的生命气息。因此，《陆判》中“素纯”的朱尔旦经过蒲松龄的器官移植术“洗心革面”后，“文思大进，过目不忘”。那位“五、六不辨菽麦、言语蹇涩”的珠儿，经过死而复生的处理后，也变得“慧黠便利，迥异乎昔”。“不辨牝牡”自然也不懂夫妻生活的元丰也由于一偶然事件的激发而“果不痴”，且“琴瑟谐好”。

当然，更多的情形是，蒲松龄对“痴”的改造并不借助某种偶然事件，而是由他自然发展。事情往往是这样，在篇首以痴呆面目出现的儿郎们，随着情节的展开，或者慢慢呈现出焕然的风貌，或者是风云骤起，痴子们做出惊人的事业来了。这些似痴非痴的小伙，都表现出某种坚毅不拔的禀性。他们身外无物，生死由之。“痴”由此来，讥从此来，而功亦成于斯。霍桓为美人所动，而不知穴墙之非法，几番凿壁要入人家闺室。乔生、孙子楚、王子服、刘子固，他们为了意中人的期许，无不是出生入死地漫漫求索。刑云飞情随石清虚，百折而不挠，以致“欲以身殉石”。席方平为代父伸冤，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死而又死，生而复生”；身入冥都，虽遭铤床焦骨，利锯裂顶，而素志不稍改，受强令出生为婴儿后，竟“愤啼不乳”，得以“三日遂殇”，誓申其志。真乃“成劫不移”！这便是“痴”，这就是《聊斋》中“痴”的本义所在。难怪异史氏热情洋溢地称赞道：“性痴则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慧黠而过，乃是真痴！”

显然，这样一种禀性早已远远超越了



“痴呆”的范畴,也非“入迷”可以包容。从这一系列好痴儿郎身上,已浸淫了并折射出我们民族执著坚定、矢志不移的精神。在夸父追日的迂傻中,在精卫填海的顽固中,在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中,在陆游的“铁马冰河入梦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中,无不可以看到这种“痴”影。或者说,正是由于灌注和继续着我们民族这生生不息的“痴”劲,《聊斋》的痴儿形象才会如此深沉而飞动。

不仅如此,蒲松龄更把自己的血肉精神融入到痴儿郎身上,他们那种生死由之的“痴”情正是作者人格的倒影。蒲箬在《祭父文》中有云:“忆我大母病笃,昼夜皆枕冥坐,转动便溺,皆我父自为提携,四十余日,衣不脱,目不瞑……”《聊斋志异·青梅》中恰有近似的一段:“时翁卧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液污衣,翁觉之而自恨;生掩其迹,急出自濯,恐翁知……”可略见作者在创作时是如何将自己投注文中。而从蒲松龄的《述刘氏行实》中的“(刘氏)入门最温谨,朴讷寡言,不及诸宛若慧黠”等文字看来,《聊斋》痴者的塑造其实还有爱妻因素的介入。蒲松龄一生中最大的关节乃在科举,自其19岁“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张元《墓表》)后,一直汲汲功名间,屡败而屡战,直至72岁时犹作一搏,这不仅体现了他对科举的迷恋,从中也可看到他坚毅不拔的精神与“痴”劲。这就难怪《聊斋》中的痴男会如此得到作者的倾心了,因为作者把自己的满腔热血、满怀寄托都倾注到了他们身上,甚至把小说人物当作自己来写了!

或者正因为如此,《聊斋》中的许多爱情篇章都是以痴汉为轴心、视点来结构故事的,就是那些看似分明倚重女性(花妖狐魅)的篇章也不例外。然而,有趣的是,一部《聊斋》读下来,人们记忆中往往多是那些鲜丽欲绝的姑娘,能记住的男主人公却只有寥寥几个,《聊斋》研究的兴趣指向到现在仍然是媚女远高于痴男。这里包含了一个奥妙。我们知道,《聊斋》中的爱情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以女性名字来名篇。而痴汉们在全篇中往往只有一个姓氏,被称为“X生”。

《酒友》中的酒痴称作“车生”,《冷生》中的笑痴固然叫“冷生”,著名篇目《青梅》中那位痴郎也只是被称作“程生”,就是《连城》篇中那名十足的情痴也只是叫“乔生”,《瑞云》中那位情郎则叫“贺生”……。这是什么原因呢?

《叶生》开篇劈头一句说道:“淮阳叶生者,失其名字”,真是恍恍惚惚,奇奇妙妙。作者曾明确地宣称《聊斋》乃“妄续幽冥之录”的“放纵之言”,非正史,乃“异史”,何来“失名字”之说?更奇怪的是与“失姓名”相伴的另一现象:与生动逼真的花妖狐魅的外貌描写相反,这些痴汉们的面貌长相,《聊斋》基本上付诸阙如。这并不意味着成书年代里男子的姓名不重要,或人们对男性的面貌不重视,只要看看《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有关男性外貌的出色描写就可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乍看是作者对痴汉们的忽略,事实上,这种“忽略”正是作者与形象合一的结果,究其实质,痴汉们乃是蒲松龄自身的写照。相对于“浮白载笔”、“寄托如此”的作者,他们的姓名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并不需要姓名!这也是痴汉们没有留下尊容的原因:看不清自己的面容,故以媚丽的花妖狐魅为镜,投影作者的心象。——所以,《聊斋》的生花妙笔就汇聚在她们身上。如果说,媚丽女子是《聊斋》爱情篇章众所周知的主角的话,那么痴男子便是藏在后台的真正主角。媚后藏痴,不仅指角色构成,更重要的它是《聊斋》艺术构造的一个大关节。当我们阅读到镜中花时,不要忘了花之原相,不要忘了原相是如何影响镜像的。当然,痴汉之成为艺术的轴心和视点,根源仍在这些被创造者与创造者的精神合一。

### 狂痴变奏

“痴”与“狂”是一对孪生兄弟。《论衡·率性》云:“有痴狂者,歌啼于路,不辨东西。”《淮南子》亦有“痴狂”并称者。“痴”与“狂”的并举也不限于它们生理上的疯疯傻傻之意。即便这两词在魏晋间发展成为品藻人物言谈举止的常用词,它们彼此也很难分开。刘伶病酒,阮籍白眼都是既痴且狂。究其原因,它们在生理意义上都是一种异于常人的病态,其症状有其相似之处;在社会意

义上,它们都是不肯同流合污,保存着自己一块圣洁的梦想园地,即所谓“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晋书·儒林传序》)。痴中含狂,狂由痴起,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离叛力量。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

“痴”偏重于痴呆、傻,“狂”偏重于疯颠;在对现实的离叛上,“痴”表现更为内向、自守,“狂”的表现则更为外向扬厉。

《聊斋》痴者之所以被称为“痴”,乃在于他们不谙世理,不懂世事,我行我素,各自按照自己内心的要求来行动。这样一种自守,自然是对世态污染的拒绝。执著于报仇申冤的仇痴,事实上已构成对社会制度的直接冲击,如席方平对残酷吏治的揭露;痴迷于美人的情痴,其言行又无不是对封建礼教的嘲弄,对理的云霾的鼓拨,对情的风景的呼唤;就是那些迷恋于草木虫鱼的物痴们,也因“玩物丧志”而与儒家教统背道而驰。清人入主中原后,经过动乱的社会得到整合,受到明中叶以来进步思潮冲击的理学思想又开始显示出它的顽固,《聊斋》之痴即由此起,为明中叶以来进步思潮的余绪。其思绪所至,不拘男女,都弥漫上这股无尽的痴意,小翠、婴宁就是。

蒲松龄既是“痴”的,也是“狂”的,他笔下的儿郎们,只要稍有机会,孙子楚式的“痴”就会表现出耿去病式的“狂”来。耿去病(《青凤》)、桑晓(《莲香》)、陶望之(《小谢》)诸位,为了遭遇到花妖狐魅的青睐,费尽心思地到荒庙野郊中专候;霍桓(《青娥》)“念穴墙则美人可见”,便“穴两重垣”;程生(《青梅》)遇一女子,女子自我介绍为狐,程生却说“倘得佳人,鬼且不怕,而况于狐”;而在《阿瑞》中,男子不顾阿瑞那“狂生不畏鬼耶?将祸尔死!”的严重警告,仍然“强解裙襦”!他们和痴儿郎们一样,热烈地呼唤着爱情雨露的滋润,但言行却放射出豪迈狂放的光芒,有惊世骇俗之力。生活中的蒲松龄,和他所创造的男儿一样,也是“天性伉直”、“意气洒如”蒲箬(《柳泉公行状》)。《聊斋自序》说作者自己“遄飞逸兴,狂因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在作者心灵的深处,“痴”与“狂”犹如不同的声部,合奏着愤世的

旋律。

然而,蒲氏所处的时代,毕竟缺乏明中叶以来那种天地震坼的动荡。清王朝的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压抑,封建生产关系和统治基础的调整,康熙、雍正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奴化、笼络以及高压政策,都使晚明个性思潮的狂飙失去了条件,从而得到充分遏制。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很难满怀豪情地呐喊,难以产生像王良那骨刚气雄和万死不回之气,也难见到李贽般冲决网罗的百倍决心。明代启蒙思想家汪洋恣肆的狂放,不得不逐步收敛或转向,变为成康雍以至乾隆时代的“痴”。蒲松龄“孤介耿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张元《柳蒲泉先生墓表》),与他同时代的吴敬梓更是“蒲轮觅径过蓬户,凿坏而遁人不知。有时倒著白接鬣,秦淮酒家怀独特。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金妆燕(《寄文本先生》)”曹雪芹也是赋性疏朗,狂逸不羁,“接鬣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扞。(《四松堂诗钞·赠曹芹圃》)”“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

(同上《寄怀曹雪芹》)”他们的言行确证了他们真狂的资格。然而,一进入文学,这种外指的狂放便转成了内守的痴迷。贾宝玉虽然“似傻如狂”地“疯疯颠颠”了一阵子,他的性格核心也仍然落脚于“痴”。杜少卿虽然也曾狂过,而《儒林外史》借以隐括全文的还须痴者王冕。他们进入文学的深沉思索状态后,更加切肤地体会到时代暮气的窒人与暧昧,他们欲冲决网罗,时代却不赋予他们足够的力量,这恰恰说明了当时理学礼教统治密不透风、正势力强盛。所以,他们只有在形象中含蓄地寄托自己的灵魂,在痴儿们身上表现自己的向往,在艺术的天地里自守一块与世俗远离的自我空间。蒲氏笔下的痴者们身外无物,生死由之的品性,正是源于绝无一丝杂念的“真心”。痴意所至,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因而不见了明末那么思想明朗、清晰、强悍、泼辣,少了几分粗野的男子气。

在中国独特的痴狂发展线索上,如果说魏晋是痴与狂混沌未分的时代,晚明以狂放为其特征的话,那么,“痴”可以说是弥漫康

雍乾之际的一股思绪，蒲松龄虽然不免痴狂交织，其狂亦不能不隐居于痴。

### 痴归于幻

在对痴狂者最后归宿的安排上，《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几部小说显示出了鲜明的特点。曹雪芹虽然无微不至地袒护着他的宝玉，还是让他披上斗篷，远遁空门，好象作者实在是爱莫能助。杜少卿、王冕的结局则是悄然隐去，不了了之，吴敬梓的这种不为之为的处理，何尝不是不忍心看到他的偶像在社会的挤压下，遭遇不测或者变形。《红楼梦》的痴最后归于佛，造就了一部伟大的感伤小说，不时飘忽出“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的哀音来。《儒林外史》的痴最后结于隐，吴敬梓果断地将他们悄然转移，情寄四高人，然后置身局外，冷眼觑着世道的滑稽、荒唐，文学史上于是便有了足称讽刺之书。

像曹雪芹、吴敬梓一样，蒲松龄应该也有机会认识到真心痴情之不可能，它们必将被社会所吞噬，这是封建理性之必然。蒲松龄自己一生的经验仿佛也印证着这条简单的道理。蒲松龄本性“至诚不欺，胸无城府”。蒲箬《祭父文》，在兄弟阅墙析箸时，便落得个“菽五斗，粟三斗”的地步（参见蒲松龄《述刘氏行实》）。他“天性慧，经史皆过目能了”。蒲箬《柳泉公行状》”结果却是科场终生饮恨。《聊斋》中也隐约有一种经验的印痕。冷生因为逢场作文时，总忍不住笑声朗朗，得“笑生”之名，学使官只为“忽闻笑声”便“怒执之”而黜其名。天真无邪，唯爱各色各样花，唯喜各色各样笑的婴宁一进入王子服家，一踏入现实社会中，她便不再随心所欲地攀树摘花，不再可以或嫣或狂地喷出内心的笑泉。婴宁因而“矢不复笑”，“虽故逗之，亦终不笑”。蒲松龄已经隐约地感受到了，烂漫无邪，一随己意的真人痴者，在现实社会中，不是被挤出圈外，就是被扭曲，

万难保全他们的本心。

然而，蒲松龄笔下更多的痴子们，却并没有像贾宝玉、王冕一样最后一走了之。他不情愿痴子们被赶走，甚至也不愿意他们被改变。相反，他的痴子们往往以他们的痴意痴行换得了现实的隆遇。车生（《酒友》）因癖酒得到狐友，“由此益富”，由“家不中资”一转而为“治沃田二百亩”。痴于花卉者不仅可得到美女（《葛巾》），也可以获得小康（《黄英》）。笃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的书痴，没有被现实碰得焦头烂额，而是一一应验（《书痴》）。一方面，作者热情地讴歌痴者对现实的离心和冲击，一方面他又用那些被攻击的对象作为对冲击的奖励。

鲁迅曾云：“有谁曾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蒲松龄不曾像曹雪芹、吴敬梓那样经历过从富家大族走向困顿从而认清世人、世相“真面目”的机会，相反，蒲氏身份低微，一生都在生计所划定的圈子中挣扎和奋斗；也没有曹、吴二人学识，思想方面的风云际会，因此，他没有能获得独立于社会之外来冷眼观察或伤感地回顾这个世界的机会，没能形而上地思索社会人生的真谛。对现实世界中金钱、地位的企望和向往，这种执着的入世精神，这种近于佛家所云的对世俗的感而不悟、沉溺不返的“痴”，于是幻化出这一篇篇神奇迷人的文字，幻化出中国文学史上离奇的浪漫。这种浪漫是作者对个人现实缺憾的补偿，因而是孱弱的，这种浪漫又是作者无比坚定的人生信念，一种张扬的个性意识、男性心意识的产物，因而又是强劲的。

作者罗书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100875）

责任编辑：陶原珂

# “也”“亦”兴亡探析

□陈宝勤

汉语专表类同的副词只有“也”“亦”新旧两个,语义完全一致。本文以远古(殷商)、上古(西周—西汉)、中古(东汉—中唐)、近古(晚唐—明清)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献为语料,试对副词“也”的产生与发展,副词“亦”的衰落与灭亡进行探索。

## 一、副词“也”的产生与发展

也,在上古是个语气词,分布于句中与句末。副词“也”与句末语气词“也”毫无联系,与句中“生+也+谓(主题后的‘也’、时间状语后、主语前的‘也’、假设连词‘若、必’后的‘也’等除外)”语气词“也”有着语位联系,是在一些必要条件下,由“生+也+谓”句中语气词“也”促生而来。

### (一)副词“也”产生的条件

副词“也”产生的条件有四。

#### 1、上古汉语“生+也+谓”语气词“也”字句式。

例如: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诗经·卫风·氓》)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

冬日之闭冻也不固,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韩非子·解老》)

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孟子·尽心下》)

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史记·李斯列传》)

类似上述例句“生+也+谓”句中语气词“也”在语法结构关系上均属主语,在语法功能上均是添补音节以舒缓语气,其在句子线性次序上的位置正好是副词的位置,因此,在一些必要条件下,由其促生出了副词“也”。

2、上古汉语“生+亦+谓”句中副词“亦”为副词“也”的产生提供了类化条件,赋予副词“也”以语法类别。在线性次序上,“生+也+谓”句中的语气词“也”的位置正好与“生+亦+谓”句中副词“亦”的位置相同,二者前后语法成分也相同;在语义上,

“生+也+谓”语气词“也”字句中往往隐含着类同的语义因素。例如:

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

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孟子·尽心下》)

其志亦将以求食与。(《孟子·滕文公下》)

夫市之无虎也明矣。(《韩非子·内储说上》)

夫势之足用亦明矣。(《韩非子·难势》)

在语音上,“也”与“亦”也有联系。亦(掖、腋)上古音为余母铎韵,拟音为 $\Delta iaK$ ;中古音为余母昔韵,拟音为 $jiək$ 。亦,《说文》:“亦,人之臂亦也。”此意在古书上先写作“掖”,后又写作“腋”。“掖、腋”均从“夜”得声,“夜”与“也”中古声韵相同,“夜”为余母禡韵,“也”为余母马韵,拟音均为 $jIa$ 。中古文献中有将“也”写作“夜”的用例。例如:

邻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赊。(杜甫·遣意二首·右二)

宋郭之达编著《九家集注杜诗》则写作:

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

郭注曰:“夜能赊”一作“也能赊”。

由于语位、语法、语义、语音方面的因素,促使“生+也+谓”句中语气词“也”逐步与“生+亦+谓”句中副词“亦”同化,终于发展为与“亦”语法、语义完全相同的副词。

3、上古汉语“生+也+谓”中语气词“也”字句自身所隐含着类同语义与上下文所构成的类同语境为副词“也”的产生提供了语义条件,赋予副词“也”以语法意义。这种“也”字句往往自身隐含着类同的语义。例如:

君子也有恶乎?(《论语·阳货》)

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韩非子·内储说上》)

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

詈。(《韩非子·喻老》)

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谷梁传·庄公三年》)

桓公之享国也长,文公之享国也短。  
(《公羊传·僖公十年》)

上古汉语“生+也+谓”语气词“也”字句常常与上下文构成类同的语境。例如:

鲤也死,有棺而无椁。(《论语·先进》)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

类似上述“生+也+谓”句语气词“也”字隐含着类同语义及其与上下文构成的类同语境赋予了主谓之间语气词“也”以类同的语义,促使其从语气词逐渐演变为类同副词。

4、中古时期口语中“生+也+谓”句中语气词“也”为副词“也”的产生提供了足够的促生条件。

中古开始,汉语双音词大量产生,由于双音词的疾速发展,导致上古汉语在主谓之间补充音节语气词“也”的衰落。我们普查了东汉至六朝大量的俗文献与正统文献,发现主谓之间语气词“也”在汉译佛经、乐府民歌、佚闻趣事杂志、神仙怪异述记等俗文献中已不见踪迹,只残存于某些正统文献中,

《论衡》有17例(其中引《论语》用例8个),《齐民要术》有8例(除《序》中1例外,余者皆是引古书用例:《孟子》1例、《吕氏春秋》3例、《淮南子》3例)。例如:

夫周之民,犹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灾,贫羸无蓄积,扣心思雨……。  
(《论衡·艺增篇》)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衡·感类篇》)

故其敬通人也如见大宾。(《论衡·别通篇》)

神农、仓颉,圣人者也,其于事也有所不能矣。(《齐民要术·序》)

《淮南子》曰:“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齐民要术·耕田》)

类似上述自身隐含着类同语义及与上下文构成类同语境的“生+也+谓”句中语气词“也”为副词“也”的产生提供了足够的促生条件,使副词“也”得以在言语活动中产生。

上述副词“也”产生的四个条件,位置是前提条件,其它是必要条件。没有位置,光有类化、语境、促生条件,副词“也”不会产生;反之,光有位置条件,而无其它条件,副词“也”同样不会产生。副词“也”产生的四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 (二)副词“也”的产生

副词“也”是中古时期产生的。由于上古汉语“生+也+谓”句中语气词“也”在中古时期口语中已经消亡,故时人在某些书面语中见到隐含着类同语义和上下文构成类同语境的“生+也+谓”句中“也”时,有古文修养之士即理解为语气词“也”,无古文修养之辈则理解为与“亦”同义的副词“也”。杜甫将《庄子·齐物论》中“吾生也有涯”,在诗作《春归》中改为“吾生亦有涯”例就足以证明我们的理论推测是有道理的。东汉至六朝时期,无古文修养者与晚生之辈对“生+也+谓”句中语气词“也”的错误使用创造了副词“也”,后人对“生+也+谓”句中语气词“也”的误解错用,促进了副词“也”的发展。天津师大学报常青《祖堂集副词“也”“亦”的共用现象》一文将《祖堂集》中140例副词“也”理解为445例,显然是将其中有的语气词“也”也误解为副词“也”了。这更加证明我们的理论推测是可信的。

一个新词的诞生,一般要经过人们的真正认识,口语中普遍使用后方能反映到书面语中。我们普查了汉魏六朝时期大量的汉译佛经、佚闻趣事、神仙怪异等俗文献以及大量的正统文献,均未见副词“也”的用例,只在六朝诗歌中发现了副词“也”的用例。例如:

①贞女信无矫,傍邻也见疑。梁·沈约《贞女引》)

②那知不梦作,眠觉也恒飞。梁·徐防《赋得蝶依草应令诗》)

③无论人讶似,蜂见也争来。梁·王伟《咏剪彩花诗》)

④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陈·后主叔宝《戏沈皇后》)

⑤桂宫非蜀郡,当垆也至宵。陈·陆瑜《独酌谣》)

⑥莫轻小妇狎春风,罗袜也得步河宫。陈·江总《姬人怨服散篇》)

⑦庭草何聊赖,也持秋当春。陈·何辑



《班婕妤怨》)

⑧不能片时藏匣里,暂出园中也自随。  
(北周·庾信《镜赋》)

⑨自知费天下,也复何足言。(北周·庾信《拟咏情诗二十六首》)

从语法上看,上述9例副词“也”均位于类同句动词性成分前,修饰其后的动词性成分,与其后的动词性成分构成状中短语,作句子的谓语;从语义上看,副词“也”均为“同样、照样”义,除例③的副词“也”表示假设人与蜂的情况的类同外,其它8例均为本句隐、类同句现,本句暗含于类同句之中,副词“也”表示明暗人物两种情况的类同,例①⑤⑥副词“也”表示明暗不同人物两种情况的类同;例②④⑦⑧⑨副词“也”表示明暗同一人物两种情况的类同,例⑨是“也”与“复”连用,说明“也”与“亦”的语法、语义没有什么差别。

### 三)副词“也”的发展

唐代副词“也”有很大发展,不但使用频率增高,而且语法、语义也基本发展成熟。在语法方面,副词“也”从六朝的仅仅修饰动词性成分,而发展为也修饰形容性成分;在语义方面,副词“也”从六朝的仅仅表示人物两种情况的类同,而发展为也表示人物两种性状的类同;本句与类同句均现的用例比六朝时增多,且类同句从六朝时的仅仅一个而发展为两个以上。

寒山、拾得诗中有副词“也”6例:

①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全唐诗·807·拾得》第9104页)

②无思亦无虑,无辱也无荣。(同上第9108页)

③似聚砂一处,成团也大难。(《全唐诗·806·寒山》第9075页)

④题安 饼上,乞狗也不吃。(同上)

⑤为汝熟思量,令我也愁闷。(同上第9077页)

⑥我住在村乡,无父亦无娘。并无人教我,贫贱也寻常。(同上第9099页)

从语法上看,例①②④⑤副词“也”均位于类同句动词性成分前,修饰其后的动词性成分;例③⑥副词“也”均位于类同句形容性成分前,修饰其后的形容性成分。从语义上看,例①②③⑥副词“也”表示人

物两种性状的类同;例①③⑥本句隐、类同句现,副词“也”表示明暗两个不同人物性状的类同,例②本句与类同句均现,副词“也”表示明现同一人物的两种性状的类同;例④⑤副词“也”表示人物两种情况的类同;例④本句隐、类同句现,副词“也”表示明暗不同人物两种情况的类同,例⑤本句与类同句均现,副词“也”表示明现不同人物两种情况的类同。例②“亦”与“也”用于对句中,例③⑥“亦”与“也”用于隔句中,说明“亦”与“也”语法、语义相同。

杜甫诗有副词“也”11例,岑参诗有副词“也”10例。从语法上看,杜诗与岑诗副词“也”修饰动词性成分的有16例,修饰形容性成分的有5例。例如:

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杜甫《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②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  
杜甫《释闷》)

③塞迥心常怯,乡遥梦亦迷。那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  
岑参《宿铁关西馆》)

④五月也须应到舍,知君不肯更淹留。  
岑参《五月四日送王少府归华阴》)

⑤款忆吟梁父,躬耕也未迟。  
杜甫《诸葛庙》)

⑥固知贫病人须弃,能使韦郎迹也疏。  
杜甫《投简梓州幕府简韦十郎官》)

⑦可怜汾上柳,相见也依依。  
岑参《题平阳郡汾桥边柳树》)

例①②③④副词“也”位于动词成分前,修饰其后的动词性成分;例⑤⑥⑦副词“也”位于形容性成分前,修饰其后的形容性成分。从语义上看,杜诗与岑诗有15例本句隐、类同句现,有6例本句与类同句均现。副词“也”表示人物两种(或两种以上)情况类同的杜诗有6例,岑诗有9例;表示人物两种性状类同的杜诗有5例,岑诗有1例。

《敦煌变文》所依版本《敦煌变文集》与《敦煌变文选注》)中有副词“也”114例。从语法上看,副词“也”修饰动词性成分的有106例,修饰形容性成分的有8例。例如:

①不但凡夫佛也怜。(《文集》第444页)

②我也深知你见解。(同上第606页)

③神灵也不曾相事。(《选注》第 839 页)

④只首思量也大奇。(同上第 720 页)

⑤却唤危中也大危。(《文集》第 295 页)

⑥也刚筑,也柔和。(同上第 432 页)

例①②③副“也”均位于动词性成分前,修饰其后的动词性成分;例④⑤⑥副词“也”均位于形容性成分前,修饰其后的形容性成分。从语义上看,《说文》中副词“也”本句隐、类同句现的有 86 例,本句与类同句均现的有 28 例。表示人物两种情况类同的有 85 例,表示人物两种性状类同的有 29 例。

五代以后副词“也”疾速发展,五代《祖堂集》使用副词“也”140 例,宋初《景德传灯录》使用副词“也”233 例,《景德传灯录》与《祖堂集》相隔仅 50 年,副词“也”的使用频率竟高出 93 例,可见副词“也”发展之速。南宋时期不仅副词“也”的使用频率于前大大增高,而且副词“也”的语法、语义也已完全发展成熟,从六朝诗歌中的“眠觉也恒飞”到寒山诗中的“乞狗也不吃”,再到《说文》中的“兼我也遭带累”(《选注》第 260 页)而发展成“只他连这个也无”(《朱子语类·卷一一五》)。

元末明初,副词“也”更加发展,《老乞大》《朴通事》中有副词“也”178 例,只有 3 例副词“亦”,且均用于文语中,其它文献类同副词也都用“也”,而不用“亦”,“亦”只保留在文语中,说明元末明初副词“也”在口语中已完全取代了副词“亦”。

## 二、副词“亦”的衰落与灭亡

亦,是名词“腋”的本词,甲骨文象“正面直立腋下点两点的人”形。《说文》:“亦,人之臂亦也。”远古时期,人类为满足交际需要,对一些语义抽象的单音节词,难以直接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方法创造,一般便采用在原有词基础上,通过同音假借、词义引申等方法创造新词,副词“亦”即是远古人类从名词“亦”同音假借而来,并独据了“亦”的词形,名词“亦”以形声方法另造了新词形“腋”。

“亦”在甲骨文中一般用作副词。例如:

①庚辰亦雨。(《甲骨文合集》127170)

②己丑卜,争贞:亦唤雀燎于云犬。(同上 1051 正)

③己酉雨,辛亥亦雨。(同上 12487)

④土方征于我东鄙,邛方亦侵我西鄙

田。(同上 6057 正)

⑤丁丑其有设,不吉;其唯甲有设,吉;其为辛有设,亦不吉。(同上 6485)

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亦”既修饰动词性成分,也修饰形容性成分,例①③副词“亦”位于动词“雨、鼓”前作状语;例②④副词“亦”位于动宾短语“唤雀燎于云犬”、“侵我西鄙田”前作状语;例⑤副词“亦”位于状中短语“不吉”前作状语,修饰其后的动词性成分。

从语义上看,甲文中“亦”均为“同样、照样”义,表示人物两种情况、两种行为、两种性状的类同,例①②本句隐,类同句现,副词“亦”表示明暗人物两种情况的类同,例①“亦”表示明暗不同时辰两种情况的类同,例②“亦”表示明暗人物两种行为的类同。例③④⑤本句与类同句均现,副词“亦”表示明现的两种情况、两种性状的类同,例③④副“亦”表示明现的不同时辰、不同人物两种情况的类同,例⑤副词“亦”表示明现的两种事物性状的类同。

副词“亦”在远古汉语中即基本发展成熟,在上古、中古汉语中其语法、语义发展得更加完善。副词“亦”从远古产生到中古前期,使用频率不断增高,《论语》中有 46 例,《孟子》中有 109 例,《韩非子》中有 138 例,《史记》中有 680 例,《论衡》中有 690 例,《道行般若经》(东汉支娄迦谶译)中有 806 例(包括 45 例“亦”“复”连用形式)。中古时期副词“也”产生,动摇了副词“亦”的专治地位;中古末期副词“也”的不断发展,迫使副词“亦”逐渐衰落;近古末期副词“也”蓬勃兴旺,导致副词“亦”在口语中踪影匿迹;现代汉语副词“亦”在书面语中不见踪影,“也”成为口语与书面语中独表类同的副词。

### 主要参考文献: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0 年版。

张玉金编《甲骨文虚词词典》,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陈宝勤《汉语副词生源探微》,1996 年 8 月“第二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

作者陈宝勤,沈阳大学文法系副教授(110041)

责任编辑:陶原珂

# 我与《学术研究》

## 学术研究的良知与平等

□马洪林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1983年9月18日,乘改革开放之风,我第一次南下广州,目睹南中国波澜壮阔、震惊世界的改革大潮,心情振奋极了。思想的解放是经济腾飞的先导,过去认为是神圣的东西正在解构之中,实事求是的学风正在重构着人们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广东学术界敢为天下先,在戊戌维新85周年、康有为诞生125周年、梁启超诞生110周年之际,由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戊戌维新和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开幕式,然后赴新会、南海分别召开纪念梁启超和康有为的群众大会暨学术讨论会。

由于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纪念康梁的学术研讨会,加以广东改革开放领先一步的巨大吸引力,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反应热烈,到会学者多达200多人,北京有黎澍、陈庆华、戴逸、庞朴、胡绳武、李侃、李文海、龚书铎、阮芳纪、丁伟志、王晓秋、林言椒、耿云志、乔还田等;广东有张江明、陈锡祺、丁宝兰、李时岳、张磊、段云章、李锦全、袁伟时、陈胜彝、徐光仁、陈周棠、吴熙钊、方志钦等;上海有蔡尚思、陈旭麓、夏东元、汤志钧、曾乐山、吴乾兑、李华兴、熊月之等;真是名家云集,群贤毕至,盛况空前。斯时,我刚从拉萨支援西藏两年回沪不久,在旭麓师麾下编写《中国近代史词典》戊戌维新部分的条目,还是研究康梁的后学。我怀着唐僧取经的心情,拿着笔记本,追随各位师友左右,倾听他们的高谈阔论,记录他们的真知

灼见,如沐春风,如饮狂泉,学术感觉好极了!

9月26日上午,在南海西樵山白云宾馆礼堂,召开了南海县纪念康有为诞生125周年大会,陈旭麓教授满怀激情,用浓重的湘音作了题为《康有为的爱国维新精神》的演说,纵论康有为的爱国思想,评说戊戌维新是一个全国规模的爱国革新运动。这一见解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认同,几乎成了大会的共识。散会时,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学者走过来问我:“你是上海来的马洪林同志吧?”我点点头,他继续说:“我是《学术研究》编辑部的,这几天把大会的论文翻阅一遍,想采用你的大作《论戊戌维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潮》,不知你的意见如何?”

听了他一席话,我有点不知所措,自知学识浅薄,在众多前辈学者面前,只能忝列末座,更没想到岭南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会采用我这普通教师的小文。感慨之下,竟然忆起了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为了郑重其事,我立即将拙文送到旭麓师房间,请他审阅。陈先生放弃午休,仔细地阅读一过,认为立意不错,文字尚佳,可以发表。当晚,编辑先生亲至我的房间,取走此文的修改稿,星夜回广州去了。

这年年底,我收到了从广州寄来的1983年第6期《学术研究》,以显著的版面全文刊登了拙文《论戊戌维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潮》,同时还发表了李时岳先生的《戊戌变法历史评价的若干问题》,接着我又收到了《学术研究》作者登录卡和联系表,约请我作为《学术研究》的特邀作者。从编辑先生的诚意,到编辑部处理稿件的迅速,给我这个初登学术殿堂的学人,以强烈的学术良知与平等的感受,使我领悟到研究学术是人生

的一种美好体验,而坚持学术平等则是理论刊物赢得作者与读者的命脉。所谓学术良知,可以说是编者的慧眼,也可以说是作者的知音。敬祈《学术研究》今后继续坚持这一好的传统,不管是本省的还是外地的,不管是观点相同的还是相异的,也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素昧平生的,一概以学术为重,以平等为衡。鄙人受到广东学术界的教益和《学术研究》的鼓舞,此后每五年必赴广东参加一次学术盛会,既不跳槽,也不旁鹜,专心在戊戌维新学术阵地上耕耘,每当读书得间,著述有成,则常想起《学术研究》以学术平等待我之厚谊,激励我夙兴夜寐,不敢稍懈!谢灵运《游南亭》诗云:“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诚如是也。

在《学术研究》创刊40周年之际,适逢我在高校任教40周年,荣幸地有双子座之谊,诚祝《学术研究》勇攀更高的学术星空,笑迎新世纪的文化学术挑战!

## 祝愿《学术研究》更创辉煌

□ 邓国伟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适逢《学术研究》创刊40周年的庆典,我很高兴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一点敬意和贺意。

我说不上是《学术研究》的经常的投稿者,但可以说是热心于这份刊物的一个读者。每期刊物到手,我都会即刻翻阅一遍,在目录上看见自己熟悉的前辈或朋友的名字,会感到格外的亲切。这到底是我们广东学术界自己的一块园地,我们都在浇灌着这块园地。

《学术研究》走过40年的历程是很不简单的。40年也说得上是漫长的岁月了,中间有多少艰难曲折,有多少经验教训,有多少欢喜烦恼,恐怕也难于细说了。好在无论怎样,这些都是宝贵的积累。一个地域的学术的发展是需要丰厚的积累的。有了积累便会形成学术的氛围,形成自己的学术的格局,于是而能催生出丰硕的成果。

我觉得《学术研究》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格个性的。因为是综合性的社科期刊,它的信息量很大,一卷在手,大致可以浏览广东学术界的现状。内容上,它立足广东,力图解决广东地区出现的各种理论问题,而在理论的建构和探寻方面,又能与国内外的学术界展开广泛的对话。文章的取纳,重视言简意赅,富有创见,既不失学术文章必备的书卷气,而又颇显活泼的气氛。

自然,综合性的期刊也会有自己的缺陷。如鲁迅所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切己的最为关心。刊物要照顾全面,没有法子不是面面俱到,而具体的读者所关心的通常只是其中的一角一隅;好像面对着一个原野,而他只找寻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这使得《学术研究》显得永远亲切也永远陌生。但这感觉恐怕是因为自己太自私也说不定,而且有鉴于刊物的性质,恐怕也没有必要把这傻里傻气的感觉说出来。但又想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它也是综合性刊物,有时会集中力量,出它一次“易卜生专号”或“白话诗特辑”,有没有借鉴意义呢?

我是办刊物的门外汉,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谨向为这刊物付出了忠诚和心血的编辑者致敬,并祝《学术研究》在未来的岁月中更创辉煌!

## 《学术研究》——我的良师益友

□ 冯增俊

(华南师范大学教科所教授)

《学术研究》是广东省创刊较早的社会科学学术刊物,也是我的学术启蒙老师和走上学术道路的重要向导。今天,在她即将走过创刊40周年光辉历程的时刻,我谨借此表衷心的祝贺。

我祝贺《学术研究》40周年华诞,首先是由于她是我接触到最早的一份本省社会科学学术性刊物,从20余年前求学广州时起,我就经常阅读她,关注她,从中了解和研习有关理论问题,获得许多重要的思想启示,成为我从事学术工作的重要向导。尤其

# 《学术研究》是解放思想的先锋

□吴启文

(无锡轻工大学教授)

该刊积极反映广东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热心参与广东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为广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武器,对我也有重要激励。

我热烈祝贺《学术研究》40周年华诞,更重要的还在于她是中国教育战线思想解放的尖兵。在1978年政治气候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就以大无畏的气概,最早刊发于光远同志《重视培养人的研究》(1978.3)这篇时代檄文,揭开了批判教育上左倾思潮的斗争,对建国以来把教育作为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就是阶级斗争从而导致教育巨大灾难的错误观点进行理论清算,掀起了全国性的教育思想大解放运动,对中国教育拨乱反正立下汗马功劳。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参与广东教育现代化运动,在推进现代教育理论的发展和创建有广东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事迹将永垂史册。

我祝贺《学术研究》40周年华诞,还在于她是发表我首篇学术论文的重要学术刊物。我真诚地感谢该刊敢于发表有新见解学术论文之勇气,更感动热心扶持青年学人的可贵精神。而且这种扶持是那样真挚,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还在1980年岁末,我在年会结束返回原校时,年会论文采用通知书已摆在我书桌上。当时意料之外所产生的激动心情直至今日尚仍然历历在目!要知道那时学术刊物是相当少的,年青学人极难获此殊荣!自此,我始终把《学术研究》作为我的良师益友,尔后在北京、上海求学时也特别关注她,藉此从中感受到来自南国改革开放热土上的时代搏动,吸取思想营养。如今,我积极参加《学术研究》的各种活动,每每有邀必应,有了心得便送往编辑部请教。我敢说,《学术研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年青学者,播种了一批批思想的良种,春华秋实,广东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思想理论建设的丰硕成果,已为她步入40周年华诞戴上了灿烂的花环,描绘了光辉的足迹。在此,我也衷心地希望这一光辉的足迹不断延伸下去。

《学术研究》是新中国创刊时间最早的学术期刊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经济改革走在全国的最前列,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也十分活跃,《学术研究》及时反映了理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因而具有全国影响。我本人在改革开放之初即1979年在《学术研究》上发表了《论在真理的界限上可能隐藏着错误》的文章,类似这样的观点在“文革”中是要挨批斗的,然而《学术研究》敢于发表,并发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这是有关这一问题的第一篇文章,全国许多媒体对此文的观点作了报导。最近两年,《学术研究》又发表了我的两篇文章,其一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是随时代而变的,另一篇提出“推广说”不能成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体系中是实践而非辩证法居首要的决定性地位,这都与传统观点不同。由此可以看出《学术研究》的风格,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百家争鸣,它有理论勇气,敢为天下先,发表新观点、新理论,在这方面,它走在全国学术界的前列,而且它不是做一阵子,而是一贯坚持这个创新的风格,这在长期深受教条主义影响的学术界无疑是倡导了令人头脑清醒的好学风,这是难能可贵的。《学术研究》不仅有独具一格的好学风,而且它的编辑、校对、印刷在国内学术期刊中也堪称一流,编辑人员在尊重作者的前提下有时对标题稍作改动,就有画龙点睛之妙,令作者钦佩!校对亦很认真,是差错率最低的刊物之一,其印刷之精良也是学术期刊罕见的,作者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送到这样的刊物去发表,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我衷心祝愿它越办越好!



# 庆贺与期望

□余少波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管理学研究所教授)

《学术研究》已走过 40 周年的光辉历程。这是值得广东省社会科学界的同仁们热烈庆贺的！《学术研究》是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较早创办的学术杂志，她以务实创新求真的风格，发表了许多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论文和一批密切联系广东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优秀文章，从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她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指针，在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广东省这片热土上，在岭南文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鼓舞下，更是率先发表一些敢于创新、敢于冲破僵化教条、敢于反对不适合现代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陈旧观念的好文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令人钦佩和振奋的！

在世纪之交，《学术研究》将进入更加成熟的时期。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一个杂志的忠实读者，我诚恳地提出如下几点期望：

1、进一步立足于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深入研究。结合广东尽快追赶亚洲“四小龙”的战斗历程，对两个文明建设、对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对社会全面进步、对社会可持续发展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2、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推动我省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强“精品意识”，力争发表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3、通过学术活动和组织稿件，在继续发挥老专家作用的同时，应把重点放在扶持、培养一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方面。要提倡严谨的学风，鼓励年青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创新，又要艰苦

细致地、有据有理地进行学术研究，力戒空疏浅薄，防止“急功好利”。希望刊物逐步完善自己的运作机制，遵守通行的学术规范。

4、从哲学学科的角度，在世纪之交，希望加强人学的研究，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的研究。要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等方面，探索社会主义新人的培育、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规律性。还要发挥广东有岭南文化的优良传统，毗邻港澳，面向东南亚和环太平洋沿岸的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使岭南文化开出更艳丽的花朵。

## 解放思想，精心办刊

□李恒瑞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我是《学术研究》的读者，同时又是一位投稿者。80年代初我从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起，就同《学术研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85年，我在《学术研究》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10多年来已有10篇文章见诸该刊。数量不多，但对我的理论研究工作影响颇大。我的不少理论见解，是凭借《学术研究》这块“宝地”走向社会的。也正是得益于《学术研究》的支持，才增强了理论开拓的信心。能与国内素负盛名的这一理论刊物结缘，实在是一种幸运。看到《学术研究》由双月刊而月刊，越办越好，影响越来越大，心中感到由衷的欣慰。

倡导解放思想，鼓励理论创新，是《学术研究》办刊的显著特色。欣逢改革开放的盛世，又处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广东，《学术研究》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办刊，坚持不懈，难能可贵。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每一次思想解放的高潮，都有《学术研究》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方面，《学术研究》敢为人先，“超前性”发表这方面的理论见解，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南国学术界的一块绿地

□ 苏新春

(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学术研究》善于捕捉改革开放理论突破的信息,及时发现发表具有理论性创造价值的文章,精神可嘉。这方面,我本人深有感触。1986年,我撰写了《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开放原理》一稿,提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有一个“社会开放观”的问题,应当重视“社会开放观”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概括,用以指导我们的改革开放实践;文稿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区分社会的封闭状态和开放状态,关于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性,关于社会开放的物质动因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开放观的基本观点作了初步的、粗略的描述。这篇文稿受到《学术研究》编辑的重视,并于1987年编发,很快为有关刊物转载。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后来我撰写的《社会开放学引论》一书的前期阶段性成果。1987年,我又撰写了《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二重结构”》一稿,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应当是公有制的占有关系和商品经济的交换关系二者的结合,既是公有制的,又是商品经济的这种“二重结构”。这种观点在当时确有“标新立异”之嫌,我也不奢望能够发表。但稿子交到《学术研究》,却引起了该刊的兴趣和重视,遂于1988年以1·1万字的长文刊登,很快又被国内有关刊物全文转载。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对《学术研究》编辑们的理论勇气深表敬佩,同时也极大地促使我从新的角度研究社会改革开放理论,在这方面逐步形成了新的观点体系。理论刊物,必须有理论创新的精神,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扮演“理论先声”的角色。这是理论刊物的生命力和社会价值所在,也是《学术研究》的成功之道。

目前,我受广东省哲学学会的委托,主编《现代哲学》杂志。因此,又算是《学术研究》的同行。作为同行,又期望加强同《学术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学术研究》解放思想、精心办刊的经验,为繁荣社会科学研究尽力尽责,作出贡献。

我第一次与《学术研究》直接打交道是在1991年底。当时第二届全国语言与文化研讨会在广州花果山的国际会议中心召开。那时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刚刚在全国兴起,会上除了来自全国各地及香港、日本、韩国的学术界代表外,出版界和期刊界的朋友也来了不少,大家都关注着语言学界这一新的研究思潮。在期刊界的朋友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学术研究》的编辑同志。他不太吭声,但始终参加了全会程的大小讨论,看得出来,他对会议中洋溢着学术热情和创新意识倾注着关心。会议结束前,他约我写一篇会议综述。这篇长达6000余字的详细综述在《学术研究》刊出后,很快北京的人大复印资料就作了全文转载。从那以后,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就一直在《学术研究》的视野中,它连续刊出了不少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新作,文章借此在全国学术界传播,对学术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像《词义的人文研究论纲》(刊93,1)在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并获广州市社科优秀成果奖;《论语言的人文性与词的文化》(刊94,3)入选《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文化语言学不是现代语言学中人文研究的自然延续》(刊96,12)收入《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而《学术研究》在刊登这些文章时,都是就文论文,看准了就及时刊出。这种不问名家,不唯传统,只重学术的良好风范,在当今的学术圈内确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

总有人抱怨着论文难刊,书难出,我却认为,只要是真正有创见的论文和著作,就会有真正追求学问的刊物来刊登它,就会有追求高品位的出版社来出版它。广东的商业味不可谓不浓,有人把广东文化概括为“市民文化”“实惠文化”“世俗文化”,这都有它一定的道理,但这并不影响在这块土地上仍有着追求理论之梦的执着之士。这些执着之士或是不甘于被“实惠文化”同化,或是

努力在将“世俗文化”上升为有理想光彩的全面发展的现代文化。如果把《学术研究》人格化的话,那么它的身上就体现出了这样两种精神。它一方面拒绝商业性广告出现在自己的封页内外,保持着高品位的学术形象,一方面又大力强调理论研究要面向现实,面向广东,探讨规律,追求创新。这种精神风范恰恰代表了岭南学术的理性追求。可以说《学术研究》是岭南学术的一面旗帜,是岭南学术大地上永远值得人们向往的一块莫大绿洲。

## 我对《学术研究》的认识

□黄德鸿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学术研究》创办已40周年了。

“四十而不惑”,这是古人对人生经历成熟程度的总结。40年来,我是《学术研究》的长期读者,对该期刊的健康成长,历历在目。我觉得它越办越有生气,越办越好。好在哪里呢?

首先,该期刊好就好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南,而且具有人类社会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世界性意义。该期刊发表了宣扬、阐发、研究有关邓小平理论的大量著作,对丰富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次,该期刊好就好在以市场为导向,坚决贯彻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它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创新等方面,刊登了不少科研成果,将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对科学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三,该期刊好就好在集文史哲财经科研成果之大成,充分反映了广东社会科学联合会期刊的特点。它照顾到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研究成果突出,质量较高。

第四,该期刊好就好在具有地区特色,它不但反映广东社会科学研究方向、进程与

成果,而且注重港澳地区社会科学的发展,发表了不少有针对性的科研成果。

第五,该期刊好就好在高瞻远瞩,视野宽广。它除刊载国内及广东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外,还高瞻远瞩,注意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发展,比较其得失以资借鉴。

正由于该期刊指导思想明确,目标具体,经过编辑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取得了殊荣,已是首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期刊评奖获奖期刊、广东省第一、二届优秀社会科学优秀期刊。我衷心希望《学术研究》在积40年经验的基础上,同心同德,努力奋进,迈向21世纪,做出更大更多更好的贡献。

## 益友,诤友

□程杰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我在《学术研究》发表论文两篇。一篇题为《论词所体现的音乐艺术精神》,责任编辑在编发过程中,曾多次赐函指教,由此我们建立了通信联系,所谈渐广,使我获益匪浅。另一篇是《宋诗“平淡”美的理论和实践》,正式发表的文字与原稿相比短了一些,斧削后的文字精练了许多。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劳动。其实我投给《学术研究》的论文还有一篇,文章务虚多,落实少,属于那种半生不熟的东西,抱着试试看心理勉强出手。《学术研究》未予勉强,编辑先生附信详谈了自己的意见,指出了许多不足。我问心无愧,好似向农民兄弟强卖了劣质种子,让人家徒劳一场。自那以后,我立誓,自己不满意稿子决不出手。不自欺,更不能欺人。决不用那些半生不熟的东西去虚扰、“谋害”编辑。

# 推动百家争鸣,促进学术繁荣

□马中柱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我是1974年末才来广东工作的。《学术研究》复刊后,我即是热心的读者,也在这里发表过一些文章。近20年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术研究》积极倡导、推动百家争鸣,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广东学术繁荣。

就以哲学这门学科来说,1978年复刊伊始,就组织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有关问题的讨论,随后又开展真理中是否包含错误、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起点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组织、刊登不同意见的文章,及时作出综述,梳理争论的意见,指出争论焦点,引导讨论的深入。这种学术讨论,落实了“双百方针”,活跃了学术空气,开发了哲学工作者的理论思维能力,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理论兴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讨论发表了评述,在全国产生了良好影响。

编辑部的同志在学术争鸣中,通过精心选择、帮助修改文章,促进学术讨论的深入,提高理论队伍的学术水平。1979年,我针对《两变》中争论的问题,写了一篇6000多字的论战性文章。初写这样的文章,内容驾驭不好,中心不突出,稿子送到编辑部后,不久由那时的编辑梁渭雄同志向我转达了他们研究的意见,建议我把标题改成“两点质疑”,把内容集中在“两点”上,不要撒得太开,还提了一些技术性的意见,我照着修改以后,梁渭雄同志又做了加工,在1979年第5期发表出来后,我把它和我第一次的原稿、第二次的修改稿作了比较对照,弄清自己在理论研究上的不足和写文章的毛病,使我以后有所鉴戒,提高了写文章的成功率。编辑部到今天,编辑已换了几茬,但仍保持对作者的关心,即使稿子不用,也给提出中肯的意见,使作者受益匪浅。像我这样受到帮助的人还很多,特别是青年学者。应该说,《学术研究》为广东学术繁荣和理论人才的成长是发挥了摇篮作用的。

90年代初,我受聘担任了一届《学术研

究》的编委,编辑部的负责同志,每年都要集体或个别登门向编委征求对办好这份刊物的意见、了解各单位学者正在研究的问题,征集可供开展学术讨论的题目,探讨开展学术争鸣的路子,态度谦逊,集思广益,表现出《学术研究》编辑部的同志们,不只着眼于把刊物本身办好,而且视野广阔,殚精竭虑,为我省理论队伍的壮大和学术繁荣推波助澜。

际此《学术研究》创刊40周年之际,衷心致以祝贺和感谢之忱!希望她继续保持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期刊的光荣,为广东学术争鸣和繁荣做出新贡献!

## 四十不惑 “四性”鲜明

□刘伟林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

我是以作者、同行和朋友的身份来做我与《学术研究》这个题目的,所以显得特别亲切。这个题目并不难作,因为《学术研究》的成绩和特色是明摆着的。《学术研究》1958年创刊,我自1959年从梁启超的故乡跑到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可能出于对专业的爱好,从那时起我便知道和认识《学术研究》了。而且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刊名是由郭沫若题签的。郭沫若是文史哲学术权威,他对于像我那时在攻读文史哲的青年大学生来说,是很有影响力的。

《学术研究》走过了40年的历程,在这当中她培育和形成了什么特色呢?我以为用学术性、理论性、当代性、严谨性这“四性”便可以概括之。当然,一个刊物,首先要有正确的办刊方向,方向不正确,便不能生存发展,也不可能生存发展。《学术研究》的办刊方向是正确的,是始终遵循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繁荣社会科学事业服务这个宗旨的,在这个宗旨的前提下,逐步形成了她具有“四性”的鲜明特色。

先说学术性。以繁荣学术为宗旨的《学术研究》具有学术性,这似乎是题中之义。但是,由于在我国几十年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周折,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而

《学术研究》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是名副其实她的刊名的。许多重大的、新颖的学术理论问题,都是由《学术研究》首先提出又加以研讨的。1996年,《学术研究》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我初时担心,《学术研究》的学术性特色恐怕保不住了;结果不然,她出版周期加快了,但其学术性却依然存在。

次说理论性。别以为有学术性便有理论性,有些刊物在谈学术,但在指导思想上却缺少理论层次,刊发的文章也缺乏理论深度。而《学术研究》在“理论性”方面是比较突出的,不论是刊发的论文,还是书评、综述、专家访谈等等,都是从理论层次上切入的,不作人云亦云,许多文章都有它的理论特色。我想这也是《学术研究》在《新华文摘》等保持较高的摘转率的原因之一。

第三说当代性。当代性与现实性有相同,也有不同。我说《学术研究》具有当代性的特色,是她既注重研究现实问题,又把古近代的选题,放在当代视野中进行探讨,使这些选题刊发之后,既有文史资料价值,又有其当代价值。这就不同于一般的理论联系实际,不同于一般的现实性。

第四说严谨性。《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特色,我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编、排、校、版式严谨,甚少疏漏,没有粗糙之举;二是选稿严谨,可说是以文取人,而不是以人取文。权威人士、顶头上司、老专家、老朋友的文章,也有不登、也有退稿的时候,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也难能可贵。

正是由于《学术研究》有以上特色,所以我很喜欢《学术研究》,成为我每期必读的学术理论刊物之一(其他还有《文艺研究》、《学术月刊》、《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学评论》等)。

也正是由于《学术研究》具有以上的高品位的品格,我给她的稿子,从不敢马虎急就,一般都是自己的上乘之作。我在《学术研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萧殷的文学评论》,当时我还是个大学讲师,但现在看来,对萧殷的评论思想还概括得比较全面,行文也比较平实。此文发表后据说被一个国外权威杂志所转载。以后发表的是《先秦美学

的方法论意义》、《异军突起的〈审美中介论〉》、《“三外说”——司空图的诗鉴赏心理学》、《文艺作品通过“中间环节”反映现实生活》、《蔚承万的审美中介学研究——当代美学研究的新视向》、《如何看待作为商品的文学》,一共7篇文章,国内外文摘刊物均有所反映。这可说明,作为作者、同行和朋友,我曾经支持过《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也在培育我成长发展。

愿《学术研究》葆其特色,再创辉煌!

## 南粤改革开放的理论号角

□李辛生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我与《学术研究》接触,始于50年代末的《理论与实践》。但关系的发展是在70年代后期,邓小平同志复出提出解放思想,反对“两个凡是”后,在全国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热潮中,《学术研究》及时组织了一批哲学理论工作者,集中于白云宾馆进行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研讨和写作。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像严冬过后的理论春天,思想解冻,余悸渐消,针对那种认为“已被实践证明为真理的理论,还要继续接受实践检验,就有损真理的威严,是怀疑论”的说法,写了《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是一个反复的发展过程》,刊物在1978年第3期以头版专栏发表我们十几位作者的文章,在省内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得到刊物的组稿和作品的发表,给我莫大的鼓舞,激励了我的理论志趣和写作热忱。这也成为推动我当时撰写《恢复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应有地位》这篇曾引起哲学界一定反响的文章的动因之一。自此,使我一直积极地参与刊物的学术活动和撰稿工作,并受聘为刊物编委,与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学术研究》创刊40多年来,作为刊物的理论战友,亲身感受到刊物的成长发展,尤其改革开放后,刊物的整体素质和品位,都有显著的提高,在省内发生了越来越大的理论作用,成为国内有影响的“全国



中文核心期刊”，其中从哲学看，有三个主要作用和特点：

### 一、发挥了思想解放的理论号角作用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不久，《学术研究》立即发动和组织了当年第3期：“关于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讨论”专栏，刊发了《判断是非的理论依据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11篇文章，这在当年的正本清源热潮中，理论反应之快、规模之大，是全国刊物中不多见的。而且在内容上如《逻辑证明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实践标准的确定和“不确定”的统一》等已超出初期一般表达性水平，包含着较深的见解，属于“深入性阶段”的理论内涵。参见《建国以来哲学问题讨论综述》，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99页）因此，对贯彻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议上提出的打破理论僵化，解放思想的号召，在省内外发挥了较早的理论喉舌作用。

### 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鸣锣开道

由于广东具有较悠久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因此在改革开放前夕，《学术研究》于1978年第一期就发表了卓炯同志《评为反党夺权服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一文，批驳“四人帮”的谬论，明确宣扬“商品就是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而“社会主义商品制度，同旧社会没有多大差别”的思想。接着1979年第一期又连续发表他的《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一文，成了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鸣锣开道的南粤晨钟，既反映了作者较早坚持商品经济的观点，又体现了刊物编辑的改革开放强烈意识和理论胆识。经济特区建立后，80年代上中期即发表深圳股份制经验和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理论，从而对宣传邓小平体制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思想，发挥了广东先走一步的理论导向作用。

### 三、社会主义辩证法学科成长的摇篮

理论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当广东城乡体制改革一开始，哲学界就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的课题。《学术研究》紧密配合这一趋势，积极组织发表一系列社会主义辩证法文章，并辟专栏以肯定这一新兴学科的地位，尤其

在1983年东莞社会主义辩证法研讨会之后，开始吸引全国理论界把广东这一刊物作为这门学科研讨的主要阵地。从8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一专题稿件，几乎从未间断，使学科内容从研究对象、性质、方法，到整个体系以及不同观点的争鸣，得到逐步展开、发展。今天回顾历史，不仅可从刊物的成长，看出这一学科走过的足迹，反之从学科发展看，《学术研究》也可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辩证法学科成长的南粤摇篮。

## 祝贺与期待

□宋德华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学术研究》创刊40周年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可贺之一是经过数十年的风雨曲折，这份杂志终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地生存了下来，且日见壮硕，这也就意味着它所承载的学术研究这项坐冷板凳、讲真话的事业同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之二是在杂志社的不断努力下，这份杂志的确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和成绩。以我所学的历史而言，我就感到《学术研究》在组稿用稿方面是有眼光和有勇气的，它从不惧怕让学者发表一家之言。我印象很深的是，杂志编辑部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用心组织过好几次专稿，在史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反响。除了突出创新与争鸣这两大准则外，《学术研究》为使所刊之稿严谨、精粹，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由此，这份杂志赢得了应有的声誉，至少在我所接触的学人中，许多都以在《学术研究》上发表论文为荣幸。我自己当然更是如此。虽然我因缺乏研究功力而写论文不多，贸然投给《学术研究》的文稿更少，但仍有幸多次得到刊登的机会，杂志编辑部组织的好些学术活动也受到邀请，这都对我鼓励甚大，令我心存深深的感激之意。

庆贺之际，《学术研究》与学术研究都对着一个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新世纪在召唤，作为一名学人，自然会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一些新的思索。新世纪中国社会

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无疑要求学术更多地与现实相结合,更充分地关注重大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不过,当学者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任务是通过独立的、科学的、艰辛的研究对现实进行尽可能透彻的分析,提供人们还未知的新东西,换言之,他们的职责是不断发布预告、忠告甚至警告,用良知、理性和远见防止或纠正现实中可能出现的迷失。学术应使现实升华,而不应毫无创意地迎合现实,更不应乘机贪图现实的实惠与华彩。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科学性,显然就需要营造更加有利于学术新成果的涌现、不同的学术观点交流和交锋的气氛。作为学者个人,首先要以诚实(不剽窃他人成果)、踏实(不作没有深入研究的高谈阔论)、朴实(不以表面的标新立异博取浮名)自律,而作为学术界和社会则应以更平和、更宽容、更尊重的态度对待学者提出的各种见解。其关键是要以学术对学术,而尽量避免将其他非学术的因素搅和到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中来。这些是我对新世纪学术研究的一点即兴式的期望,如果并无大错的话,我同时也就期待着作为学人挚友的《学术研究》能在上述方面作出更多更好的建树。

## 不能忘记的回忆

□何国文

(原《学术研究》编辑)

我是在1957年12月到编辑部报到的,在杨樾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据说算是编辑部第一个正式到职的工作人员,因为杨樾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编制,只是暂时兼管编辑部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杂志创刊的最初几个月,就只杨樾和我两个人,以后才陆续来了好几位同志,但直到改刊为《学术研究》(双月刊)时,实际搞编辑工作的也只有四个人,中间还要轮流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人手更少,学科分工并不很固定。由于是月刊,我们工作十分紧张,但也很锻炼人。转为《学术研究》后,编辑人员又多了几位,学科分工才比较固定,我除了负责经济学、政

法、民族学科外,还兼做编辑业务秘书,对各个学科的稿件或多或少都有所接触,对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都比较熟悉。回顾在编辑部工作这段时间,我感到很受益的是扩大了知识面,提高了理论水平,锻炼了写作能力。我从与专家学者的交往中得到很多教益。

我原是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助教,因耳病手术后严重失聪,便专攻《资本论》,也写了些有关论文,实际上知识面很窄。来到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刊物的编辑部后,面对的是各种学科的稿件,既要组织又要作编辑过程,特别是要对一些稿件作质量鉴定,强调不要埋没好稿子,还要尽量做到在来稿中沙里淘金,干起来实在不容易。好在领导人杨樾同志知识面宽,是个多面手,在他的指导下,再加上自己还能比较自觉地用功学习,特别是对领导上批改过的稿子,注意从对比不同的处理中学习不少好东西,工作总算干了过来,能坚持下去,有时由于工作需要,或自己在学习中有所体会,自己还会写些文章。就这样,在编辑部实际工作的七年多中,我发现自己的知识面宽多了,理论水平提高得较快,也觉得很欣慰。在这里,我顺便谈谈在编辑工作中从与专家学者交往得益的一些往事。

记得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经济史专家梁方仲教授给《学术研究》来了一篇论文。对老专家的稿子,我们一般都很尊重,并不大改动,但也并非无所作为。杨樾同志在最后审稿时认为梁文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字(具体我已记不起来了)要改成另一个字,并让我去中大请梁方仲教授过目。梁老看后非常欣赏,大大称赞了编辑部改得好,要我向杨樾转达他的谢意,以后他还多次提起这件事,足见他的真诚。这件事有力地鞭策我努力学习,力争高质量地处理好稿子,认识到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作者的尊敬,同时也感到像梁方仲教授这样的老专家也如此虚心,自己更需要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还有一位使我不能忘怀的老专家是卓炯教授。我作为经济学编辑,经常要同广东经济学界和经济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们联系接触。当时在省委党校任教的卓炯教授首倡社会主义

计划商品经济论,他那种不避政治风险、不看风驶舵,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进行科学研究,勇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的精神和风格,使我深受教育。后来我虽然离开了编辑部,但始终关注他的理论活动。所以在我从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退休后,还决定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他的商品经济理论,并写出了对卓老经济思想研究的系列论文,介绍他的生产形式学说,阐发他的创见,以此作为与他交往的一种纪念和对他表示的敬意。

## 情深学子的编辑理念

□杨海文

(中山大学哲学系 96 级博士生)

刚刚攻读硕士研究生,业师李宗桂教授便对我说:在全国的社科类学术期刊中,《学术研究》历史悠久、质量上乘,而且长期以来勇于提携青年学子。正是因为这番话,因为李宗桂教授的教诲与指引,我与《学术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硕士研究生期间,我曾在《学术研究》发表过两篇习作,一篇论述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颢(538—597)对空、假、中范畴的开展,一篇探讨台湾鹅湖学派领袖牟宗三(1909—1995)的儒家道统观。这两篇习作得以在《学术研究》这样知名的刊物上发表,既激发了我治学的浓厚兴趣,也使我荣获了 1995 年度“南粤优秀研究生”一等奖,1996 年被免试推荐攻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饮水思源,我深深地感激《学术研究》对一个青年学子的厚爱,深深地感激编辑先生对拙文的悉心斧正。

攻读博士学位以来,我又在《学术研究》发表过一篇论扬雄(前 53—18)《法言》之文化守成主义的习作。同一期还有一篇研究扬雄与道家的论文,是南开大学一位博士生写的。所以,收到这一期样刊,我最深的印象是:情深学子,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优良传统。

《学术研究》情深青年学子的编辑理念,或许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自然

是为青年学子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应有的版面,另一方面则是在自己的版面上正确引导青年学子的治学态度。后者的意义无疑更为重要,方式不外两类。一则刊发高质量、有创见的学术论文,这对刚刚步入学术殿堂的青年学子而言是一种“硬刺激”,《学术研究》40 年来也正是这样做的。二则邀请知名学者就自己的治学经历、目前的学术动态发表感想,这种“软刺激”对青年学子的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

作为一名青年学子,《学术研究》的“软刺激”对我便有过相当强的震撼。陈胜焱先生在 1996 年第 11 期的一篇短文中说:

对于年轻一代学者,我们要继续提倡“坐冷板凳”的精神,“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我们的有关政策、措施,尤其要防止引导青年走上急于求成、追求数量、甚至“一年磨十剑”的道路。中山大学历史系从 50 年代起,就有几句话相传、哺育了几代人:一句是“《老子》五千言”,一句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意思是说,真正的传世之作,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还有一句是“乱拳打不倒老师傅”,意思是做学问不要耍花招,要像老师傅那样,学会真功夫。(第 9 页)

陈胜焱先生发表在《学术研究》上的这席话,近一年来我时常咀嚼,“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因此,借这篇短文,我由衷地期盼《学术研究》在落实情深学子的编辑理念时,能够多刊发一些像陈胜焱先生这样的治学心得。

在某种意义上,一个青年学子的成长,学术期刊的支持是一种相当关键的力量。当《学术研究》步入不惑之年,我们这代青年学子也将在 30 岁的界碑前驻足。一个人的学术生命和一家刊物的文化使命如此息息相关,不管怎么说,对于双方都是一种值得铭记的缘份。这大概也正是对《学术研究》“情深学子的编辑理念”最好的注脚。

# 倡导清新学风,促进学术进步

□张凤林

(辽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15年前,在读硕士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热心读者。以后,我又有幸成为她的作者群中的一员。记得最初的一次投稿并未被采用,当时虽然不免心情有些沮丧,但是从编辑部对稿件处理的严肃认真程度(包括统一登记编号,及时向作者反馈信息)以及所附的中肯的建议中,我又着实地感到这是一个学术态度十分严谨的刊物。后来,随着理论功力的逐步提高,我的一些研究心得终于能够通过《学术研究》来与学术界同行和广大读者相互交流了。这对于我个人的学术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由衷地感谢《学术研究》的编辑人员,感谢他们用心血浇灌出这一块肥沃的科学园地。

作为一位北方的经济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我之所以钟爱南国的《学术研究》,最看重的是她的学术品位。当今中国,各种刊物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然而,学术性的刊物却并不很多。即使是一些以学术名称相标榜的刊物,真正具有学术特色、达到较高品位的也不多。《学术研究》却应当说是国内少数十余种办得较好的学术性刊物之一。她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联系现实而又不囿于现实,反映地方特色而又不失察于宏观全局,始终坚持把全局性、基础性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作为刊物的主导。这使她能够保持较高的学术品位和良好的学风。所开辟的栏目,不论是文、史,还是哲、经,均使人感受到一种清新淡雅的学术氛围。以经济为例,近年来就组织发表了许多关于市场经济基本理论研究、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与学术流派研究、东西方两大经济思想体系比较研究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都不去刻意追求政策设计,而是热衷于客观的纯学术式探讨,从而便少有目前一些刊物的文章中所常见的那种紧跟当前政治风向、追求政策急功

近利的倾向。正因此,它们给予人们的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信息量是巨大的,给予人们思想的启迪也是深刻的。我想,这正是《学术研究》的主要魅力之所在。

《学术研究》不仅倡导基础性理论研究,而且还善于捕捉各学科理论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前沿性课题,及时组织力量攻关,从而较好地发挥了对于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导向功能。科学总是不断创新,人文社会科学也是如此,而且其速度在日益加快。一个优秀的社科学术刊物应当紧紧把握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发展的脉搏,及时追踪国内外最新理论动态,以引导学术界赶上当代科学发展步伐,并参与其理论创新。《学术研究》在这方面做得也是比较好的。以经济学方面来看,近年来在国外比较流行的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等等,在版面中均有相当程度的反映,有些文章还相当有功力。经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近一二年才刚刚引起经济学界的重视,1997年的《学术研究》就刊有好几篇这方面的分析、评述性文章。这反映了编者较高的学术修养和敏锐的科学洞察能力。正是由于这支高素质的队伍,使得《学术研究》近年来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日益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理论前沿阵地之一。其所发表各类研究成果在全国处于较为领先的水平,为繁荣我国社会科学、推动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学术研究》迎来自己40岁的生日,这预示着她将更加成熟。我们衷心祝愿这块科学园地永远生机盎然,绚烂多彩。

## 尊重作者 立场公正

□赖伯疆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60年代,我还在大学学习期间,就是《学术研究》的读者;70年代,我除了是读者外,又成了它的作者。它在我省以至全国社会科学学人中,是颇受看好的一份学术杂志。在市场经济大潮震天动地奔腾澎湃的

今天,它仍能保持着一份平静、纯真的心态,继续孜孜矻矻地耕耘着自己的一片园圃,这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我在《学术研究》上发表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是与它的一些编者还是比较熟识的。在我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感觉:一是尊重作者,二是学术立场公正。

尊重作者的劳动,这对于一个杂志的兴衰浮沉,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刊物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作者和读者的支持,二者不可或缺,而首先要有作者的大力支持,否则,刊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以为继。这道理似乎最浅显不过,可并不是每个刊物都能做到,《学术研究》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70年代中期,我和一位同事合写了一篇有关广东戏曲历史的文章寄给《学术研究》,当时该刊曾派出编辑同志到我的工作单位联系商量修改的问题,后来又约我到编辑部谈具体修改的问题,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既从编辑要求的角度出发,又设身处地替作者考虑,使作者能愉快地接受修改意见。前几年,该刊拟发表我的一篇文章,编辑同志同我一起在庐山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期间,就主动征求我的意见,对文章作了充分鼓励的同时,也指出不足之处,并预告可能发表的时间。这表明,该刊长期以来,都坚持尊重作者、主动同作者商量的良好传统作风。

坚持公正的学术立场,对于一个刊物的声誉和威信,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一个刊物或编者,从自己的个人喜爱和观点出发,只发表某家某学派的立论不够公允的文章,而不顾事实、不管不同的声音,肯定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前几年,该刊发表了一篇书评文章,对某部专著作了高度的评价,但未免有些溢美之词,而对另一本性质内容相似的专著,则轻轻地一笔带过。责任编辑虽然不完全同意该文的观点,但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还是发表了该文。后来,他又对这两本专著作了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并写了一篇文章,对这两本专著的各自长短作了中肯的分析和评论。

当然,《学术研究》也还有其他优长之处,限于篇幅,不一一道来。至于不足之处,

我有两个改进的希望:保持严肃性,增强活泼性,这是一。学术的严肃性是宝贵的,应该锲而不舍地保持和追求,但是,在稿件内容、栏目安排、封面封底设计、内文和题目的排版等方面,可以多样、活泼一些。其二,要增加学术信息量,国内外各种学术动态、走向、新观点、新学派等等,要尽可能多报导。处在沿海地区和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区的广东,它的刊物更应该起到“学术信息窗口”、“学术信息接收和转播站”等的作用。

## 《学术研究》与学术上的敢为天下先

□萧君和

(佛山大学中华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杂志确乎有一股子学术上的敢为天下先的气概。我是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而这么看的。现举一例来说:

1986年年初,我写了题为《关于“社会政治文明”的思考》的论文。(《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这篇论文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要建设社会政治文明”的问题,并且认为,“物质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动力,社会政治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核心、主体。如果用一棵生长正常、万古长青的树来比喻人类文明的话,那么,物质文明是它强劲的树根,社会政治文明是它粗壮的树干和树枝,而精神文明则是它繁荣茂盛、充满活力和朝气的绿叶”。因为触及“政治”这个敏锐而危险的领域,这篇文章写出后,许多朋友为我捏了一把汗,纷纷劝我别寄出去发表。他们还说:“没有哪个杂志敢发表它。”可是,我把这篇论文寄投给《学术研究》后,《学术研究》就把它刊登出来了。这篇论文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新华文摘》1986年第12期还将它放在第三题的显著位置上予以转载。在此之后,“政治文明”这个概念飞到了我国的许多地方,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等



著名科学家也在《一个科学新领域》中指出：“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自然杂志》1990年第1期）

显然，《学术研究》是以“敢为天下先”的气概，率先推出关于“政治文明”以及关于其他学术观点)的文章的。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这种“率先推出”是正确的，是能够促进改革开放事业的。

回忆往事，我深切地感到，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确乎有一股子学术上的敢为天下先的气概。这种气概出现在《学术研究》身上，是有其必然性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民，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人民响应了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关于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敢为天下先的气概，想前人之不敢想，做前人之不敢做，闯前人之不敢闯，战斗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创造出人间奇迹，使南粤大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发生了为世界所瞩目所惊叹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学术研究》的敢于捕捉新的学术信息，敢于发表学术上的“奇谈怪论”的敢为天下先气概，即学术上的敢为天下先气概，实在是广东人民，特别是珠三角人民敢为天下先气概在学术研究、学术出版工作中的表现。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而敢为天下先的气概是创新的前提、“节奏”。你不敢前行，不敢走在人家的前头，怎么敢去创新，怎么会去创新？我们即将跨进21世纪的门槛。怎么在21世纪里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回答。因此，在庆祝《学术研究》走过40周年历程的时候，我衷心希望《学术研究》能保持和发扬学术上的敢为天下先的气概。

## 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

□韩湖初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1998年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和许多读者一样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学术研究》40岁的生日。作为岭南文化与学术的窗口，《学术研究》40年的辛勤耕耘，它对岭南文化与学术的发展，对广东省各项事业的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推动，其贡献，其功绩，无疑是巨大的。因此，作为他的一位读者，对她的生日，谨致热烈的祝贺！

当我们回顾过去，展望21世纪的时候，我们自然地对《学术研究》寄予更高的期望和要求——任重而道远。展望新世纪，这将是一个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候，也是我国即将实现四个现代化、向世界强国的地位迈进的时代。这样，作为“窗口”的“窗口”——广东是我国开放改革的“窗口”，而《学术研究》又是广东的“窗口”——自然也就任重而道远。而正当此时，《学术研究》迎来了她的40岁生日，可谓适逢其时：40岁，这是人生趋向成熟、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的时候，《学术研究》也是这样啊！

值得庆贺的是，《学术研究》已经在迈向新世纪了。如近年来对邓小平理论的研讨，对深入进行经济改革的探索，对宏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呼唤，对岭南文化的深入阐释和张扬，等等，可谓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对于正在奔向新世纪的我们，无疑是很好的精神准备。

让我们预祝《学术研究》在新的年代里，奋飞，奋飞，再奋飞！

## 《学术研究》——我的良师益友

□雷健坤

(南开大学博士生)

欣闻《学术研究》创刊即将40周年。40年啊，对于人来说，已是进了不惑之年的中年人了，比它小十几岁的我自然无从想象它

从创刊到如今所经历的岁月沧桑与风雨坎坷。然而今天,从它所独具的办刊风格,从它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从它同类期刊中的突出地位,我分明感到了它那沉甸甸的份量和一种无言的成熟。或许正因为这份量这成熟浓缩了它40年的曲折历程,因此它拥有无数真诚而热心的作者与读者。作为这其中的一分子,在《学术研究》迎来它40岁生日之际,我只想说:“《学术研究》——我的良师益友。”

说起与《学术研究》相识相知时间并不算久。第一次看她纯粹是因她精美的装帧与众不同而吸引了我,那时不过是大一的Freshman,对于学术大抵还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因此对《学术研究》只觉其高深而不解“其中味”。及至大学毕业受了几年系统的哲学思维训练,古今中外的圣人贤哲书读了一些,渐渐不再满足于课堂上听来的,课本上看到的,想为一些“大”问题找答案,想为一些“怪”想法找根据,这时,才真正了解并认识了《学术研究》。记不清有多少次一口气读罢一篇佳作令我拍案叫绝,有多少回被深刻精彩的论述吸引,多少回让我发现了问题,又多少回使我豁然开朗。于是,很快我便成了《学术研究》的忠实读者,每月捧着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新书,就像见到远方的朋友如约而至,那份期待与喜悦自是不用言说的。

而想到往《学术研究》投稿则是最近的事了。那是去年在读博士不久,我对传统一个已成定论的问题产生了怀疑并得出一些与流行观点不同的想法。尽管我时时被自己的这种想法所激动,但我深知自己无论是在学识抑或功底上都是非常浅薄的,要知道我所面对的都是像高山一样的学界前辈啊!我究竟有多大能力达到对一个古老问题的“破”与“立”呢?我犹豫又想退缩,但古今学人首先应有的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如同灵魂的号角激励着我。于是我以最大的热忱,尽可能充分的证据表达了我思我想。尽管我知道这样的文章还很不成熟,还很值得推敲,但我相信至少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我投稿至《学术研究》。她热情地接纳了我这又无名又无关系的无名小辈。当我接到编辑那热情洋溢的信时,我激动地哭了。我为有人能承认自己的价值而感动,我为编辑那份真诚而感动。这是给我所从事的清苦学术生活的最好回报!我再次感到了《学术研究》那如朋友般的情谊,虽远在一方,但心息息相通!或许这也正是《学术研究》创办40年来能越来越吸引读者,能越办越好的根本所在吧!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愿以此与我永远的朋友——《学术研究》共勉!

# “策” “简” 辨

□张 觉

《孟子·尽心下》：“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赵歧注“二三策”为“二三简策”。杨伯峻《孟子译注》则注“策”为“竹简”，其《春秋左传注》第78页亦注云：“策和简‘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单简亦可谓之策。”似从赵注而实为形似神非。

策和简在古代并不相同，其一般区别是数量上的不同。《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贾疏：“方谓木板也。‘简谓据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又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孔疏：“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

当然，《孟子》此例其“策”字并非指编简而言，因为《武成》不过是《尚书》的一篇（一个编简），其中当然不可能有二三个编简。但杨氏把策与简等同起来还是不妥的，因为古人只有把“策”注为“简也”，而不把“简”释为“策也”。故孟子称“简”为“策”，当别有深义，不能以“单简亦可谓之策”一语了之。

杜预《春秋序》云：“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孔疏云：“此言大事小事乃谓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以《隐十一年传》例云：‘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明是大事来告，载之策书也。策书不载，丘明得之，明是小事传闻记于简牍也。以此知仲尼修经皆约策书成文，丘明作传皆博采简牍众记。故《隐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于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也。’又《庄二十六年》经皆无传，传不解经。注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

复申解。’是言经据策书，传冯（凭）简牍。经之所言，其事大；传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简，大事在策也。”由此可知，策与简还有用途上的区别。

《尚书·多士》又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孔颖达疏：“惟汝殷人，往世有策书有典籍。”策书与典籍并称，可见“策”（册）之地位与一般的“简”不同。古有“典册”之称而无“典简”之名，也足见策、简有贵贱之分。孟子称“简”为“策”，是因为其简乃记大事的《尚书》之简，且早已编成典策。其所谓策，仅指记大事之简而已。杨氏以为“散文则通”，完全是误解。

又，杨氏《孟子译注》所附《孟子词典》曰：“策，竹简，即古代的书页。”所以他将此文译为：“所取的不过两三页罢了。”这种发挥，甚有混淆视听之弊。

关于书籍之“页”，叶德辉《书林清话》论之甚详。据叶氏之说，古代书页之本字乃借“簿”义之“槩”，“”、“牒”皆从槩得声而指简策制度时的书页。“槩”是书页之通名，“”指一片竹简，“牒”则指一片木板。它们与册 制度中称一纸为一页是不同的。一仅一简，仅容一行字；一页指一纸，所容字甚多。孟子所谓“二三策”虽非实数，却亦是极言其少，仅指数行字而已。如果我们把这“二三策”解为“两三片简策”或“两三”，是否更好一点呢？

作者张觉，副教授，上海市黄兴路2030弄60号200433)

责任编辑：陶原珂

# 解诗二题

——兼与艾治平先生商榷

□李德辉

## “燕山”不是“燕然”

艾治平先生《历代绝句精华鉴赏》(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释李贺《马诗》之五,以为“燕山月似钩”之燕山是指“燕然”,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之杭爱山,“这一带是历来的古战场……李贺生活的贞元、元和之际,大漠如雪的燕然山,也是国家多事之地。”查唐诗各选本(建国后)亦多同于此说,认为“燕山”指今河北蓟县一带燕山山脉者却为数寥寥。此说盖本于王琦的《李长吉诗歌汇解》。而王注“大漠”句引班固《燕然山铭》“经鹵磧,绝大漠”,以为李贺用典以明志,意欲效法窦宪立功边地。

燕然山一带唐初属燕然都护府,置府始于贞观二十一年,德宗建中时废,唐室对该地的控制并不长。安史乱起,唐军西北精锐内调入援,吐蕃乘虚攻陷河、陇。岑仲勉《隋唐史》详列当时失陷的西北19州及时间,唐室控制的这些州府都陷入了敌手,遑论“去塞三千余里”(《后汉书·窦宪传》)的燕然了。何况,燕然在当时便是处于半独立状态,包括燕然都护府居住之部落多滥葛在内的漠北13部,以后也时叛时附。安史乱后,唐室西方路断,安西、北庭先后失控。《资治通鉴》卷198、201、227、237、238、233)唐与吐蕃、回纥的军事态势与开、天相比,已根本逆转,唐室无力再全部收回失地,遑论取燕然!这些都发生于李贺出生的790年之前。唐于建中元年、二年遣使会谈(《资治通鉴》卷226、227),建中四年,唐蕃之间两度会盟,确定双方边界,规定了缓冲地带,承认既有事实(《资治通鉴》卷228与《文献通考·四裔十一·吐蕃》)。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双方再度会盟于长安城西,次年刘元鼎又入蕃会盟。后建立“唐蕃会盟碑”,用汉藏两种文字纪盟约内容,今见于拉萨大昭寺前,可与《文献通考》相参证(参岑仲勉《隋唐史》)。这些

事实表明,燕然一带在中唐时已非唐土,甚至连羁縻之地也不是,河湟尽失,历来攻伐之路已断,唐国力已衰,焉能打到辽远的漠北去?“燕然”说不切合中唐以安内为主的国策和当时边塞诗创作实际。收复失地才是唐室当务之事,人民强烈要求的也是平定内乱、实现统一。而对燕然山这样遥远之地的开拓,实非国力所及。中唐边塞诗大率也是围绕上述主题,李贺诗也未离此大局。其诗句如《南园》中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和“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颇能反映此时时势和他的理想。

《相逢行》是否径用《西京杂记》之载?

《相逢行》(相逢狭路间)有句:“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艾先生说:这里径用《西京杂记》所载:“霍光园中凿大池,植五色睡莲,养鸳鸯三十六对。”(见三秦出版社《先秦汉魏六朝诗鉴赏词典》)此说似亦有商榷之处。

《西京杂记》乃晋人葛洪(而非汉刘歆)所撰。唐张柬之《洞冥记跋》、刘知几《史通·忤时》、段成式《酉阳杂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旧唐书·艺文志》、《文献通考》等多种古籍均持此说,有的还作了辩证,这个观点已为后人所公认。谓其为刘歆撰者只有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西京杂记”条已从版本、目录、校勘三个角度给以有力驳斥。既然《相逢行》为汉乐府清调曲所存古辞,自然不可能袭用晋人书中之载。即使《西京杂记》真为汉人刘歆所撰,今人又何以能断定是《相逢行》径用了《西京杂记》,而非《西京杂记》附会了《相逢行》的文意呢?故笔者以为,《相逢行》中的有关诗句,只是对汉时贵族家庭状况的描写,并非“径用”《西京杂记》。

作者李德辉,湘潭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责任编辑:陶原珂

# 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如何硬起来

——评《精神文明建设机制论》

□杜新山

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中,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如何使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硬起来”长期困扰着人们的头脑。最近出版的《精神文明建设机制论》(李明华、余少波、叶蓬、周祯祥著,广州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的新成果。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认识和把握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总是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通过规律的作用形式、表现形式来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寻找和发现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作用形式、表现形式是使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硬起来的一个关键。《精神文明建设机制论》一书提出,精神文明建设规律是通过精神文明建设的机制表现出来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机制是“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目标和功能的运行方式和工作方式”。这既标志着人们对精神文明建设认识的深化,更重要是找到了如何使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硬起来的理论根据。

从实践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抛弃小生产和自然经济时期的经验型工作方式,采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范化、制度化的科学型工作方式,否则,精神文明建设就不可能真正硬起来。《精神文明建设机制论》一书

从总结分析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出发,认为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之所以硬不起来,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还未完全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工作方式,精神文明建设缺乏有效的机制保障。这也就从实践上找出了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软”的症结。

可以说,《精神文明建设机制论》一书深化了人们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提高了人们在实践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自觉性。概括起来,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鲜明的理论色彩。精神文明建设的机制问题既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机制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对此作理论上的说明和解释尤为必要。该书对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涵义、机制建设的指导思想、要求以及机制体系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问题,使人们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新境界,上了一个新台阶。

强烈的实践性。《精神文明建设机制论》是广东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或者说是广东近20年精神文明建设的“缩写本”。本书依据中共广东省委提出的“育、导、建、管”的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思路,从理论的角度对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探索和工作经验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本书强烈的实践性还突出表现在可操作性上,它对机制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和要求以及不同层次的机制建设的具体程序、方法途径等具



# 视 阔 论 精

——读《康有为大同思想研究》

□何业光

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世人评说纷纭，有关论文颇多。但以此为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写成专书的尚属罕见。世俊博士的《康有为大同思想研究》一书，可算是国内第一本全面系统论述康氏大同思想的专著（该书最近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有下面几个特色：

其一，对康有为大同思想的研究全面而深入。康氏的大同思想是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以往有些论者，或浅尝即止，妄下结论，或囫囵吞枣，以现成的概念或条条框框去硬套，以致误解或曲解了康氏。本书作者对康氏大同思想作了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的研究，深入探讨了其形成的社会条件、理论来源及发展的过程，分析其具体内容，特别是大同社会的构想及性质，揭示其社会意

义，也指出其内在矛盾，从而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其二，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准确把握康氏大同思想的性质。作者没有把眼光停留在康氏身上，而是放眼古今中外，既以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来观照康氏，又将康氏的大同思想与近代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以及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作比较，辨其异同，以显示康氏大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之独特性。同时，又深刻阐明其中国特色，从而得出康有为大同思想是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结论，颇为精辟。

其三，将康氏的大同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联系起来研究，是本书又一独到之处。作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源头在大同思想，中国大同思想发展到康有为时已

体问题都作了规定，使精神文明机制建设更加“具体化”、“物化”、“可操作化”和“专业化”。

高度的科学性。该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将科学理论贯穿到精神文明建设的机制研究中。例如，该书运用信息论、控制论、管理科学等现代科学成果来分析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机制问题，大大增加它的科学性。该书在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机制问题研究中，不是用科学理论剪接活生生的精神文明建设实践，而是从实践出发去丰富科学理论，这既说明了作者深厚的科学功底，更体现了可贵的科学求

实精神。

当然，缺乏有效的机制是造成“一手硬、一手软”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除机制之外还有哪些原因，这些原因和机制的关系如何，以及机制体系内部关系又是怎样等问题，都需要作进一步的回答，但是，瑕不掩瑜，重要的是本书在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研究上作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在如何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真正落到实处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作者杜新山，广东省委宣传部企业处（510082）

责任编辑：冯 生

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特征,它对近代中国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有很大的影响,许多从事社会主义实践的革命者是从大同思想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后作者还联系到当前中国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探讨20世纪中国人摸索社会发展的思想轨迹,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思想背景,不仅大大拓展了康氏大同思想研究的深度,而且颇具现实意义。

其四,区别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中的康有为,正确评价康氏大同思想的导向。作者自始至终坚持从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两个层面去评价康氏,指出大同思想是其内心理想世界的反映,有其独立性,但又受现实思想的影响。康氏始终坚信三世进化论,主张渐变、进化,反对突变、激进。在现实社会改革中,他主张用改良的方法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但在理想世界中他又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热切希望人类社会能够走向公正、合理、富裕、极乐的大同世界。两个层面相比较,突出康氏大同思想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也廓清了有些论者认为康氏的大同思想是要导向资本主义的说法。

其五,正确对待古人的思想成果,充分肯定康氏大同思想的社会意义。与许多全盘否定康氏大同思想的论者相反,作者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产生于一百年前的康氏大同思想,尽力去发掘其闪光的东西。作者首先指出:“作为一种理想,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反映了人类追求美满的社会生活与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愿望,昭示了未来社会的基本前景,它是一种引导人们不断向前的精神。”然后深入分析康氏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所提出的许多颇有价值的社会思想。诸如,主

张工、商、农各业公有,由政府统一计划和管理,旨在谋求共同福利和整体和谐;主张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对创造发明和无私奉献给予重奖,努力创造充满激励机制的全新社会;主张尊重劳动,又强调加强科技和管理,不像有些空想家只一味强调人人必须劳动;对大同社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设计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社会服务业不断扩大的走向;关于大同社会的教育设计,提出普遍义务教育制,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德、智、体、美为中心,等等。当然,作者没有全盘肯定康氏的大同思想,在肯定其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和消极的因素,还设专章论述其内在矛盾,条分缕析,颇为深入。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有不少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空想社会主义的精彩论述。比如,作者在《关于理想与现实的思考》一节中说:“任何空想、空谈都是无济于事的,而当我们从现实再去反瞻空想的时候,又会觉得不应该放弃人类曾经有过的对完美社会的执着追求,空想家所描绘的未来社会犹如海市蜃楼一般的吸引着许多人,我们不能因为它的无法实现而加以彻底否定,空想家提出的一些社会原则当然是脱离实际的主观愿望,但有些却是合理公正的,不失为追求的目标。”这段话颇能给人以启迪。

综观全书,视野开阔,论述精深,不乏独到见解。美中不足的是,关于康有为大同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关系,论述还不够深入。

作者何业光,广东高教出版社副编审(510076)

责任编辑:郭秀文